

基督的僕人Ⅲ

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耶穌會的秋與冬

(西元1687年至西元1773年至西元1814年)



依納西·艾坎立 著

張 佩 英 譯

基督的僕人Ⅲ

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耶穌會的秋與冬

(西元1687年至西元1773年至西元1814年)



依納西·艾坎立 著

張佩英 譯

Passion and Glory

*A flesh-and-blood history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Volume III

Autumn-Winter 1687-1773-1814

By Ignacio Echániz, S.J.

Translated by Pei-ying Chang

Copyright © 1999 by Ignacio Echániz, S.J. Borgo S. Spirito 4, 00195 Rome

Published by X. Diaz del Rio, S.J., GUJARAT SAHITYA PRAKASH

P. BOX 70, ANAND, GUJARAT, 388 001, INDIA

Chinese Copyright © 2007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錄

秋與冬

解散耶穌會的悲劇	008
----------	-----

I. 秋葉

1. 極具爭議的總會長：	
岡薩雷斯 (Tirso González, 1624-1705)	011
2. 國王的告解神父：	
尼達 (Everard Nidhard, 1607-1681)	017
蔡茲／戴葉	020
(François de La Chaize, 1624-1709) ／	
(Michel Le Tellier, 1643- 1719)	
3. 宣講大師：	
安東尼·維拉 (António Vieira, 1608-1697)	027
保羅·史納利 (Paolo Segneri, 1624-1694)	033
路易·布大魯 (Louis Bourdaloue, 1632-1704)	037
方濟·傑若尼歐 (Francis de Gerónimo, 1642-1716)	040
安道·巴狄努 (Antonio Baldinucci, 1665-1717)	047
伯鐸·卡拉塔尤 (Pedro Calatayud, 1689-1773)	049
4. 西方智者：	
湯若望／南懷仁	053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 ／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貝斯奇 (Constanzo Giuseppe Beschi, 1680-1747)	062
5. 巴拉圭的巴洛克音樂：	
多明哥·齊波禮 (Domenico Zipoli, 1688-1726)	068

6. 開路先鋒：

密西西比河的探險家：

馬奎特（Jacques Marquette, 1637-1675） 074

加利福尼亞三傑：

吉諾／薩爾瓦弟／猶格德 084

（Eusebio Francisco Kino, 1645-1711）／（Juan Maria Salvatierra, 1648-1717）／（Juan Ugarte, 1662-1730）

奧利諾科的探險家：

古米拉（José Gumilla, 1686-1750） 093

7. 在世界屋脊上：

安瑞德（António de Andrade, 1580-1634） 098

白乃心（Johannes Grüber, 1623-1680） 102

德希德里（Ippolito Desideri, 1684-1733） 105

II. 死亡四部曲

1. 里斯本 1759：

倒楣的馬拉格瑞達（Gabriele Malagrida, 1689-1761） 115

2. 巴黎 1762：

拉法葉破產（Antoine Lavalette, 1708-1767） 125

3. 馬德里 1767：

忠貞不二的畢納德利（José Pignatelli, 1737-1811） 138

4. 羅馬 1773：

溫良的利斯（Lorenzo Ricci, 1703-1775） 150

III. 冬眠

1. 寒冬餘生：

契尼維茲（Stanislaw Czerniewicz, 1728-1785） 169

2. 血洗法國

177

3. 義大利插曲：

畢納德利復興耶穌會 185

4. 俄國的春天：

格魯勃（Gabriel Gruber, 1740-1805） 200

基督的僕人Ⅲ

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耶穌會的秋與冬

(西元1687年至西元1773年至西元1814年)



秋與冬

1687-1773-1814

解散耶穌會的悲劇

我們將走進耶穌會被解散的紛擾歷史裡。是的，解散耶穌會的時機漸趨成熟。

耶穌會做了什麼，以致招來如此嚴厲的懲罰？不要說是我們罪有應得。

如果說耶穌會不曾犯半點錯，那太天真。不過，為了那些過錯，我們又該被趕盡殺絕嗎？

一定是一個設計周詳的陰謀，把教會裡反對耶穌會的團體以及與教會勢不兩立的敵人都聯合起來。諷刺的是，他們在耶穌會成就最輝煌、最成功的中國開始發難。傳信部在中國的事務代表潘如（Domenico Perroni）首先吶喊：「必須把他們徹底消滅！」其他的人就負責執行這項死刑。

就像耶穌當年先經歷宗教審判，然後是民事審判；這次解散耶穌會也是教會內先起鬨，接著政治力介入。波旁王室把耶穌會士逐出法國所有領地，而教皇克勉十四世的解散令，是最後一擊。

消滅耶穌會是全面戰爭的第一步。教會一直是歐洲人的導師，剛興起的啟蒙運動則要求人權、提倡理性高於信仰、認為個人自由超越束縛人的義務；兩者的理念發生衝突，兩派相互競爭，互不相讓，直到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才告終止。這就是伏爾泰（Voltaire）所說的——「粉碎那些可恥的惡徒」（意指宗教）（Écrasons l'infâme）。



I.
秋葉

本書第一部分要記錄的是耶穌會的「秋季」，即耶穌會成立後第二個百年所歷經的驚濤駭浪。在這些年裡，反對它的聲音是如此的廣、如此的強，所以到了 1723 年，也就是解散令頒布前五十年，已經沒有多少東西需要解散的了。

儘管如此，耶穌會史學家斑格（Bangert）在為這段時期的歷史做結論時說：「耶穌會在 18 世紀的成就比起 17 世紀毫不遜色。」這真是一個出乎人意料之外的聲明。

現在讓我們看看他所言是否屬實。是怎樣的裂縫開始損壞這個堅固組織？是哪些烏雲遮蔽了天空？下面的幾個故事將反映真相。（註一）

1. 極具爭議的總會長： 岡薩雷斯

(Tirso González, 1624-1705)

聰明卻固執，魯莽卻狡猾，這四個因素使得岡薩雷斯具高度爆炸性。他相信天主召選他為十字軍，去打擊當時一些耶穌會士信從的倫理訓導——他視之為「放縱意見」（laxist opinion）。導火線於是被點燃，那些耶穌會士贊同「或然論」（probabilism），認為同意可能的觀點是合理的。而岡薩雷斯則高舉了「嚴格或然論」（probabiliorism）的旗幟，認為要跟隨更具可能性且更嚴格的觀點。

宣講大師

岡薩雷斯本來在沙拉曼卡（Salamanca）教授哲學，之後教授神學。不過到了 1665 年 9 月，經歷十年的教學生涯後，他離開了學校，與吉倫神父（Fr. Juan Gabriel Guillén）結伴轉進講道臺，從事平民傳教，他的名字才開始大放光芒。

他倆花了八年時光，走遍半個西班牙，試圖激發基督徒的良知，更新他們的信仰生活。1674 年，兩人到了馬德里，進入皇宮宣講。當時只有十三歲的查理二世，「專注又安靜地聽完講道，中間未曾向坐在他腳前地板上的侏儒說半句話，或跟他玩耍。」

岡薩雷斯的辯才無礙，他的講道吸引人又令人感動。「如何對待仇人」更是每次講道的重要部分。有一次他在塞維爾（Seville）教區君士坦丁納（Constantina）地方的一座教堂內，手中拿著十字苦架演出一番後，「教堂內隨即起了一陣騷動，教友們

相互擁抱，彼此請求寬恕。」

十一年的傳教生活後，在 1676 年，岡薩雷斯被任命為沙拉曼卡大學的神學教授。史學家亞斯翠（Astráin）遺憾地說：「作為傳教士，岡薩雷斯的成就在西班牙是無人可及的；作為教授，他帶給我們的傷痛以及為耶穌會製造的問題，我們將有目共睹。」

嚴格或然論信徒

岡薩雷斯從事傳教的那段時間，夏天閒暇時就投身神學論著，他正準備一篇駁斥一般耶穌會士遵循的「或然論」的論文，並打算迎戰特別是楊森學派稱耶穌會是「放縱主義」（laxism）的指控。

不過他的書被禁止出版，於是他向總會長申訴。總會長請岡薩雷斯把草稿給他以便審查。來自不同國家的五個審查員意見一致，認為「該書不宜出版」。總會長把這個結果通知了他。

岡薩雷斯不是一個可以輕易接受拒絕的人。當修會把門關上，拒絕了他，他卻看到通往教宗諾森十一世的門。

在教宗發表譴責「放縱主義」六十五點聲明之前一個月，大概是 1679 年 4 月，透過塞維爾總主教把原文交給岡薩雷斯。岡薩雷斯大喜過望。在經過馬德里的時候，他與羅馬教廷大使作了一番長談。那年的 7 月 9 日，他接受了大使的建議，其實也是他個人的想法，寫信向教宗道賀，敬佩他的小心謹慎；同時呈遞一份他寫的關於「嚴格或然論」的論文給教宗，教廷國務卿親切地收下。岡薩雷斯非常興奮，自願送上更多譴責「或然論」的文章。國務卿寫信告訴他，他們將欣然接受。

教廷的門既然大開，岡薩雷斯便發動大量投書寫信運動。他贏得了第一次勝利，1680 年 6 月 26 日，教廷聖職部公布了一個

法令，包括兩項指示：一是要求岡薩雷斯肩負捍衛「嚴格或然論」並駁斥「或然論」的重任；其次是耶穌會總會長必須容許其他耶穌會士效法跟隨。

翌年春天，馬德里的教廷大使通知岡薩雷斯說，教宗希望看到他的書，不過付印前應讓羅馬當局先過目。我們的十字軍人連忙送了一份過去，並加緊寫信，教廷的人被他弄得頭暈目眩。那時耶穌會的總會長歐里瓦（Giovanni Paolo Oliva）於1681年11月26日去世，他的繼承人諾耶爾（Charles de Noyelle）亦於1686年12月12日離開人間，岡薩雷斯那本亟欲醫治教會百病的書，必須等到另一個新總會長選出來以後，才能討論發行事宜。

新總會長

大大出乎眾人意料，岡薩雷斯被選為新總會長。首先，他被選為他所屬會省的代表，於是他帶著他支持「嚴格或然論」及反對「或然論」的論文來到羅馬。

教宗諾森十一世按慣例接見所有代表，並表達他希望岡薩雷斯被選上的強烈願望。教宗這下可犯了一個不小的錯誤，因為岡薩雷斯沒有半點行政經驗，他的個性也不合適。可是八十六個選舉人中有四十八個認為他們應該順從教宗的心意。1687年6月6日，岡薩雷斯就這樣被選為總會長。這位十字軍人如今真的身陷沙場了。

與教宗第一次相遇使他更確定他的計畫。他回憶說：「教宗把我叫到一邊告訴我，我之所以被選為總會長，是天主的特別安排，祂要藉著我阻止耶穌會採用『可能的觀點是合理』的見解。」

他把教宗的話看作來自天主的命令，其實他所說的與官方版本有一些出入。教宗透過國務卿向代表團表達的願望是：「耶穌

會的神學家應有講授教義的自由，不過，為了維持意見一致，應該採取更安全、更可能的意見，而不是那些比較不安全、不可能的意見。」結果修會大會放任會士護衛「嚴格或然論」，但也不譴責「或然論」。這不是新總會長所期待的。

沒有全盤皆勝更加強了岡薩雷斯的信念，認為他的名著應盡快出版發行。因此，他決定「祕密」付印。他自己是這麼說，其他人卻認為他是「偷偷」付印。岡薩雷斯的書正在迪林根（Dillingen）印刷的消息傳到羅馬，他的參贊們大為震驚，力圖阻止。

以一敵百

岡薩雷斯沒有一絲一毫要讓步的樣子。有人告訴他那是不當的手段；參贊們向他寫了正式的備忘錄；更有人向教宗告狀，那時在位的是諾森十二世（1691-1700）而非諾森十一世（1676-1689）。教宗下令沒收岡薩雷斯的書。

1692年6月，參贊們建議教宗把案子交給次年召開的耶穌會代表大會做議決。教宗接受了他們的建議。

岡薩雷斯採取對抗手段，要出版一本1672年的舊作。教宗同意了他，條件還是要先得到審查員的同意，而且得撤銷迪林根那本書。

1693年11月，代表大會處理岡薩雷斯的書的日期逐漸逼近。岡薩雷斯拖延著，不過跡象顯示他背地裡尋求馬德里和維也納皇室的支持。他宣稱，那實際上是法國與西班牙之間的較勁。岡薩雷斯引起的爭執如此激烈，國務卿出了一個餽主意，請求西班牙國王給岡薩雷斯「一個主教職務」，這樣做既可以賞報他的愛國熱忱，又可以把問題解決。

代表大會不是討論這類事情的場合，所以問題就擱了下來。

他們唯一要做的決定，就是是否要召開耶穌會修會大會，那是唯一可以討論這個問題的場合。岡薩雷斯知道全體一致反對他，明白自己在打一場必敗的仗，於是他死命反對召開修會大會；可是參贊們和許多省會議都贊成。投票結果，因贊成的不過半數，提案被否決。

不過，大會必須在 1696 年定期召開，而且就在 11 月 19 日。每一個人都希望這件事能快快結束，只是沒有人知道要怎樣結束它。

停火休兵

教宗打破了僵局。他接見代表團，請他們和平和睦地商議研究，並建議他們說：「讓以前的種種過去，一切重新開始。」

11 月 23 日以前，一切進行順利。後來選出五位新的參贊，他們直率地向修會提出請求說：他們一直被指控迫害總會長神父，所以希望真相能盡快水落石出。

這就像放置了一枚炸彈，引信必須解除。

炸彈的危險真的解除了。某位省會長提出這樣的建議：「不准再討論過去的紛紛擾擾了。」這樣做或許能如教宗所願把過去抹去。大家接受了這個建議，總會長與參贊之間的不愉快紛爭終告落幕。

這樣做妥當嗎？亞斯翠表示：「也許仍有值得爭論的地方。」不過他又說：「這也許是較好的解決方法，正如參贊們願意接受考驗，總會長也應該如此。」岡薩雷斯卻不夠謙虛，也不夠正直。他繼續抗爭。

這位天生的戰士從不放下他的雙臂，但歲月和病痛奪走了它們。最後，他終於明瞭自己已經沒有能力領導耶穌會，便指派了

一位代理。如果他不曾如此沉迷抗爭，他會是一位優秀的總會長。他很有能力，雖然有不少缺點。亞斯翠表示：「岡薩雷斯最大的缺點是固執到非抗爭到底不可的地步；他聽不進任何修正他想法的意見。這個缺點如此凸顯在一位耶穌會總會長身上，我們只能感到遺憾。」

2. 國王的告解神父：

關於國王的告解神父以及「告解保密」，總是有說不完的故事。告解神父常被指控煽動懺悔者的宗教狂熱，做出不正義的事，所以他們應為此負責。

這樣的指控早在 16 世紀時就開始了，那時國王的告解神父開始兼任國王的宗教事務顧問，新教徒散播這樣的指控。從 18 世紀開始，當聽國王告解的職務從道明會士轉移到耶穌會士身上後，這種想法更深植人心，這種情況在法國比在西班牙嚴重。加利剛學派、楊森學派和基督新教，發現耶穌會士對國王每一個宗教事務的決定都甚感興趣。

這個說法有幾分真實呢？

尼達

(Everard Nidhard, 1607-1681)

耶穌會士尼達是最為聲名狼藉的例子。1649 年奧地利的瑪麗安娜 (Mariana of Austria) 嫁給西班牙的菲利普四世作為他的第二任妻子時，她把告解神父尼達也帶到西班牙去。當時沒有人有任何不滿，因為菲利普在世時，他解除了尼達的職務達十六年之久。不過，國王去世 (1665 年 9 月 17 日) 後，瑪麗安娜以攝政王后的身分掌握了統治權後，一切都改變了。

王室顧問

這位好女人當上攝政王后，一時手足無措，就開始詢問告解神父的意見，更依賴他為所有的國家大事作出決定，於是告解神父成了政治顧問。尼達一次又一次出紕漏，首先，他禁止喜劇演出，說要等到小王子年紀稍長，又喜歡喜劇，或者是王后另有決定時才解禁。「尼達用這種愚蠢的決定開始他的政治生涯。」亞斯翠表示。

私人顧問一變而為正式任用。尼達隨後被指派為政府諮議會的一員，並任總裁判官。諮議會是菲利普四世成立的，任務是給瑪麗安娜王后忠告。西班牙神職界對此非常不悅。王后對尼達的絕對信任使他成了實質上的首相，只差名分罷了。有三年的時光，尼達是西班牙的主要統治者，事無大小都經他的手，一切都依他的意見拍板定案。

當亞斯翠向我們陳述尼達的所作所為時，他仍非常生氣。尼達毫無愧色地接受了「閣下」（*excellency*）的尊稱，那是國家議員才有的稱謂。總會長歐里瓦曾勸他不要接受總裁判官的職務。沒有用！更過分的是，在接受指派後，尼達還要求一份「合乎如此重要職務的薪給」。他得到一萬金幣的教士收入，修會也免除了他的神貧願，那是他厚著臉皮求來的。

尼達對國事是誠信的，從來沒有人抱怨他偏袒。不過，他缺乏經驗，治理能力又是驚人的不足；更糟的是，他缺乏爭取他人好感的技巧。他這樣撐著直到 1669 年 2 月 25 日。那一天他在眾人的噓聲中下了臺，而且被逐出馬德里。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乖張對上愚蠢

奧地利的唐胡安（Don Juan José）是菲利普四世的私生子，十三歲時獲菲利普承認，並被封為「海王子」（Prince of the Sea）。不過，菲利普不准他住在馬德里，也不准他在自己的喪禮中出現。

雖然他極力爭取，瑪麗安娜王后就是不准他住到王宮裡。他想利用王后告解神父的影響力，尼達卻禮貌地打發了他。從此以後，年輕的王子把這位耶穌會士視作主要敵人，對他懷恨在心。

王子常針對尼達貼大字報、發傳單。尼達爬得愈高，王子的動作就愈大。大家也注意到，當王子與某人結成朋友，某人就會把尼達當作陌路人。唐胡安後來獲准進入國家議會，並被任命為法蘭德斯總督，目的是讓他遠離王宮。他便動身前往拉科魯那（La Coruña），假裝要在那裡上船。實際上，他正密謀謀殺尼達，欲藉此作為自己不在場的證明。

1669年初，王子凱旋進入馬德里城門，戲就落幕了。內戰似已不能避免，又必須不計一切來避免，唯一的方法就是把王后那位不受歡迎的告解神父趕走。

王子終於做到了。尼達還想抗拒，但高層施以壓力。教會答應授予他樞機的職位，他才同意退休。托利多（Toledo）的樞機乘坐了一輛豪華的馬車來到尼達居住的宗教裁判所前，尼達夾著他的《每日頌禱》走下來，在羣眾的喧囂咒罵聲中，坐進馬車，向羅馬奔馳而去。他們於5月9日抵達羅馬。

不久後，他晉升為樞機；十二年後，即在1681年2月1日去世。一場不對等的對決——全副裝備的乖張與手無寸鐵的愚蠢間的對決，就此結束。

蔡茲／戴葉

(François de La Chaize, 1624-1709) /
(Michel Le Tellier, 1643-1719)

尼達是可憐的瑪麗安娜王后多年的告解神父，蔡茲則是太陽王法王路易十四長達三十四年的告解神父。如果尼達在短短的時間內就能樹立那麼多敵人，那麼，人們對蔡茲的惡評如潮就不足為奇了。雖然他們還不算是他的敵人。

前輩們

在蔡茲之前有好幾位耶穌會前輩曾當過法國國王的告解神父，他們的處境著實不易。柯通（Pierre Coton）是波旁王朝的第一個告解神父，是亨利四世的告解神父，他對他的懺悔者頗具權威，一如蔡茲對路易十四一樣。有人拿他的姓氏開玩笑說，國王在自己的耳朵裡塞了棉花。不過柯通作了不少事，其中之一是阻止國王搞婚外情，還把國王「否認天主」的褻瀆說法變成「否認柯通」，最後更使國王成為耶穌會最有力的守護者。

路易十三曾經有過幾個他不滿意的告解神父，直到聽從最有權力的黎希留（Richelieu）的建議找到高杉（Nicholas Caussin），才算稱心合意。這位正直又勇敢的神父忠於職責，如果他必須高聲反對他的懺悔者出兵，他是絕對不會退縮的。他會告訴國王戰爭會帶來痛苦：「所有的眼睛會流淚，所有的心要滴血。」高杉與黎希留樞機之間的關係緊繃；高杉不但反對黎希留，甚至想把黎希留換掉。可是他太單純了，不但沒把黎希留換掉，自己反而被換了下來。

路易十四（1638-1715）從青少年時期就選耶穌會士當自己的告解神父。1675年2月12日，他在聖日爾曼堡（Saint-Germain Castle）與蔡茲親自面談後，就選定了他。總會長歐里瓦毫不掩飾他的滿意，他說：「沒有比這更令人滿意的結果了。我預見柯通神父將在他外甥身上復活。」

蔡茲從1674年9月起擔任省會長，隨即於1675年1月派遣高隆汴（Claude La Colombière）到巴萊毛尼（Paray-le-Monial）。這無疑是他短短的省會長任內最有意義的一次派任。（按：高隆汴在巴萊毛尼與聖女瑪加利大全力倡導恭敬耶穌聖心的敬禮。）

艱鉅的職務

一輛由四匹馬拉著的馬車，三十四年來，每週一次風雨無阻地來到聖安東尼街聖保祿聖路易耶穌會士的住宅，接一位身材高挑、相貌高貴的耶穌會士，然後沿著塞納河朝凡爾賽宮揚長而去。這位神父要去聽當時最重要也最難纏的懺悔者——國王路易十四的告解。路易最依賴天主教會，卻又最不聽教宗的話。「要當集權力傲慢、國家暴力、漠視道德和高唱限制教皇權力於一身的人的告解神父，真不是一般人做得來的。」拉古特（Lacouture）表示。

那時是耶穌會的巔峰時期。音樂大師夏邦第耶（Marc-Antoine Charpentier）是聖保祿聖路易教堂合唱團團長，他也為克萊蒙學院（Clermont College）學生編的劇本寫配樂。

國王告解神父的身分雖然顯赫，處境卻也非常危險。他在為國王分辨是非時，往往必須在一些平常相當棘手的問題上給予忠告。談楊森學派——該學派已經滲入主教階層；談加利剛主義——法國傳統上有介入教會某些事務的權力；然後就是排解由此

而引起的法國國王與羅馬教宗之間的衝突。還不說國王的那些女人，那也是告解的內容。

那麼，這位可敬的神父是怎樣辦到的呢？

首先，絕對謹慎！蔡茲傳記的作者吉頓（Georges Guitton）說：「他對分內的事絕對謹慎，並約束自己守口如瓶。」不過，他的嚴守本分卻讓許多人認為他行事拐彎抹角，令人摸不著頭腦，十足耶穌會士作風。

蔡茲一定曾好好勸告他的懺悔者，才會擁有像批評者那樣多的崇拜者。我們得到的印象是：他對國王有一定的影響力。就法國人所謂的優點而言，蔡茲就像最堅定的法國人一般堅定。

說到國王的個人行為，最難解的就是他與蒙泰斯潘侯爵夫人（Marchioness of Montespan）的曖昧關係，皇室的人對此事都很反感。蔡茲以耐心、機智，設法讓路易斷絕這個關係。

這下可讓侯爵夫人恨得牙癢癢，等待時機出口怨氣。一天，有朝臣向她表示同情，她忍不住爆發說：「都是那個臭東西惹的禍！」

她說的「臭東西」就是蔡茲。這個說法就這樣流行開來。另外有一個比較厚道的笑話：

天主造了偉大的路易，

不過，

祂並未就此打住，

祂又造了蔡茲，

這才高枕無憂。

國王愛蔡茲

聖西滿公爵（Duke of Saint-Simon）自稱是耶穌會的敵人，他

酸溜溜地承認：「國王是愛蔡茲的。」不過吉頓注意到，國王並不是因為蔡茲縱容他而愛蔡茲，反倒是因為蔡茲幫他斷絕了許多朝臣的阿諛諂媚。

蔡茲去世後，國王含淚告訴大家一個故事，道出告解神父對他的坦誠：一次蔡茲為某人說情，路易就對他說：「你真是個好人！」蔡茲回答說：「不是的，陛下。不是我好，而是你嚴厲。」

蔡茲八十歲了，他希望退休，不再當國王的告解神父；因為他的記憶力衰退，雙腿又潰爛。不過，國王不以為意，堅持還要聽取他的勸諫。

1709年1月，蔡茲最後一次到凡爾賽宮的兩天後，覺得自己病得很厲害，便要求領臨終聖事，並親自寫了一封長信給國王，而國王也馬上親自回他一封長信，信中充滿了情感。蔡茲此後專心事主。

農夫的兒子

戴葉繼續蔡茲的工作，成為最後一位偉大的國王告解神父。

戴葉與蔡茲，兩人的作風南轅北轍。訓練有素的貴族換成粗獷的農夫之子，個性率直、強硬，說話直爽，對宮廷禮儀一竅不通，尤其是其醜無比。

1709年2月21日，蔡茲去世後一個月，國王從委員會提供的一張名單裡挑選了戴葉。消息發布時，宮中的人都大吃一驚。

路易並不認識戴葉。他與戴葉第一次會面時，問他與有名的戴葉家族是否有親戚關係。

「我跟戴葉爵爺有親戚關係？差得遠哪！陛下。我只不過是下諾曼第的一個窮鄉下人，我的父親是農夫。」

聖西滿公爵親眼目睹整個過程。當時他嚇壞了，對戴葉的魯

莽很不諒解。不過國王倒是喜歡上這個魯莽的農夫之子，並且很有風度地讓自己適應他的粗野。於是國王重新開始每週五與告解神父會面，有時延到週六早上。根據目擊者描述，戴葉是唯一敢與國王討論他不喜歡的題目的人。

反對楊森主義的十字軍

以下是戴葉的一般表現。沒有人能說他干預政治，只是當被問及有關宗教事務的意見時，他絕對直言不諱。楊森學派是他主要敵人，他全力反對它。例如，他會阻撓任命同情楊森學派的主教；他也主張把波羅耶爾（Port-Royal-des-Champs）夷平，那裡是楊森學派的聖殿和巢穴，這樣，楊森主義信徒就沒有了朝聖中心。

他最有名的戰役是對抗巴黎總主教諾亞葉（Noailles）樞機。這戰役源自凱內耳（Quesnel）的《倫理反省》（*Réflexions morales*）一書。諾亞葉是大眾公認的楊森信徒，他毫不在乎別人的眼光，大力稱揚這本書。許多人認為這是一本論述聖奧斯定成就非凡的書，蔡茲神父也肯定它的價值。戴葉則把它看成如假包換的毒藥，而且從未改變這個想法。及至教宗克勉十一世在 1713 年頒布的《天主的獨生子》憲章中譴責它，而法國主教們和國會也接受憲章的說法後，他便開始全力備戰。

《天主的獨生子》憲章的頒布，隨之而來教會人士和政府機關對憲章的認同，對楊森信徒都是致命打擊。楊森信徒認為那是戴葉與耶穌會在背後搞鬼，所以絕對不能原諒。他們找出能寫的人，發動一場無遠弗屆、遍及每個階層、每個角落的誹謗運動。他們點燃的仇恨為五十年後耶穌會被驅逐埋下種子。

路易十四的最後一次告解

1715 年 9 月 1 日，國王駕崩讓楊森主義的爭辯暫時落幕。8 月 23 日那天，國王與告解神父作了一次長談。翌日，辦過告解後，他心靈覺得非常平安，對王后說：

「我辦了一個妥當的告解。我的神師告訴我，要對天主更有信心。我現在信心滿滿，不過，我曾冒犯祂，這令我難過。」

接下來幾天，他恭領臨終聖體，並與戴葉多次交談；他希望戴葉常常留在他身邊。

26 日，他召見皇太子，給他最後的忠告：

「要與鄰邦和平相處。我太好戰了，千萬不要學我！也不要像我一樣不知節制，揮霍無度；要盡量減輕人民的稅負，我不幸做不到這一點。」

「戰爭，只會勞民傷財，是人民的大不幸。路易十四的公開痛悔堪與他中世紀祖先的痛悔一樣受人尊敬。如果戴葉與路易的痛悔有關，那麼，他算得上是一個最稱職的告解神父。」米諾（George Minois）表示。

太陽王去世後，戴葉準備當小路易十五的告解神父。不過當他前往王宮想從攝政王那裡接受任命時，對耶穌會不友善的攝政王奧爾良公爵（Duke of Orléans）阻止他說：

「神父，是你的長上而不是我該給你任務。」

戴葉於是被放逐到亞眠（Amiens），後來又到拉佛雷契（La Flèche），終老於斯。他於 1719 年 9 月 2 日去世，享年七十六。

米諾為他的生平做了總結如下：

「戴葉是法國帝王史上最被人痛恨的告解神父；他不幸在路易十四統治時，法國最黑暗的時代擔任了這個職務。波羅耶爾被

毀、被驅散，《天主的獨生子》憲章的頒布，過度忠於自己的職責，都成了他的過失。其實，他只不過是老國王及國王諮議的代罪羔羊罷了。他沒有參與決策，若真要負責任，恐怕也只是執行決策的部分。」

無論如何，他是最後一位能喚起熱情的告解神父。他的後繼者的角色已被貶低至可有可無。時代變了，政治與宗教已經脫勾了。

3. 宣講大師：

這段時間裡，雖然聖教會危機重重，但偉大的宣道人輩出，平民傳教成效卓著。

安東尼·維拉

(António Vieira, 1608-1697)

維拉是口才最好的宣道人，也具有許多別的才幹。他有用不完的精力，可以像變色龍一樣，隨著環境轉換而變換不同的角色。傳教士、本地人或猶太人的護衛者、愛國者、政治家、國王的朋友、外交家、媒人、理想主義者，樣樣皆能。他嫻熟依納爵神操，也擅長計算東印度羣島某商業公司的可能利潤。他與各色人等打交道：白人國王或黑奴、苦行僧或商人、樞機主教或猶太拉比、猶太智者默納西（Mannasseh ben Israel）、瑞典女王克里斯蒂納（Christine）、印第安塔普厄（Tapuia）族或納依卡西巴（Nhacengahiba）族，他和這些人都交過手。他躲過宗教裁判所的火刑、荷蘭海盜、黃熱病、鯊魚和海盜。

生於里斯本，四歲便隨雙親移居巴西，十五歲（1623年）加入耶穌會。初學第二年開始時，荷蘭軍隊入侵他居住的城市，他隨老百姓往內地逃難，這個經驗讓他永誌難忘。

宣道人

1634 年 12 月 10 日，維拉被祝聖成為神父。不過現存的講稿卻顯示他的第一次講道可以追溯到前一年，即 1633 年 3 月 6 日，當時他是副執事。那次的主題，一如後來他一貫採用的，是全力攻擊荷蘭。他把聖經中的一些事件，勉強與當時的一些形勢相類比。在他的講道和他的整個思維裡，還經常出現另一個特色：以色列人的福地將在葡萄牙重現，葡萄牙人將是新的選民。

他還有其他題材。他公開向天主挑釁：「把巴西交給荷蘭吧！把西印度羣島也交給他們吧！把我們所有的一切都給他們好了；把世界也放在他們手中呀！至於我們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祢就撇下吧！祢拋棄我們，與我們斷絕關係，終結我們好了！」

有時因為沒有聽眾，他甚至會向魚兒講道，不過他攻擊的目標依舊不變。請看一則他最有名的講道詞，既有趣又生動，也更古怪。

「魚兒啊！你們互相吃來吃去，真把我打倒。你們的做法真是醜惡極了！最糟的是，你們不但相互吞食，更是大吃小。如果換一種情況，事情可能還不致這樣糟：如果是小魚吃大魚，那麼一條大魚就能餵飽許多小魚。如今卻是大魚吃小魚，沒有成千上萬的小魚又怎能餵飽那大魚呀！」

維拉的辯才強而堅定。他像 4 世紀的金口·若望在君士坦丁堡時一樣，致力打擊惡人、保護窮人。不過處身一個講求表現的時代，維拉也要為時尚付出；他唱作俱佳，堪稱為一流大師。

1641 年 1 月 1 日，殖民地政府派遣了代表團到里斯本向新國王約翰四世宣誓效忠，維拉是其中一員。

維拉正開始一個新生涯。

國王的朋友

4月30日，國王與維拉第一次見面，便被他的才能深深吸引，從此二人之間的堅固友誼，未曾稍減。1642年1月1日，維拉第一次登上皇家教堂講道臺，從此成為王室的正式講道神父。

當他抵達葡萄牙時，葡萄牙國內充斥著國王塞巴斯坦（Sebastian）將要回來統治的說法（註二）。那只不過是借塞巴斯坦的名，將約翰王視為塞巴斯坦罷了。維拉對葡萄牙人的歷史角色很有信心，自己發展了一套國家信仰的版本。他從不同的文獻與預言，特別是依據賓達拉（Bandarra）的預言，推論葡萄牙將會建立一個世界帝國。

他的救世論——把這個世界轉化為天上的國——需要人的合作，需要政治、軍事與財政等手段；例如，恢復巴西的伯爾南布科（Pernambuco）地區、籌募所需款項、設立商務公司、利用海外猶太移民的基金以及復興葡萄牙境內新基督信徒。

國王派他去荷蘭，他懷著這樣的雄心壯志去了，結果他失敗了。他也沒有完成為德都西奧王子（Prince Dom Teodósio）物色王妃的任務。他先去看奧爾良公爵的女兒蒙龐西小姐（Mademoiselle de Montpensier），再去看菲利普四世的獨生女德勒撒公主（Prince Maria Teresa），都沒有結果。他為他的救世理論與一個名叫默納西的猶太智者作了一次有趣的接觸；默納西賣了一個點子給維拉，他說，默西亞將第二次降臨，把祂從前安置在美洲的十個遺失的支派，帶回巴勒斯坦。維拉把這個買來的奇想變成自己的想法，成了他的塞巴斯坦救世說的一部分。

他在宮廷裡的權威逐漸下降，他也變得不那麼樂觀。國王還是很欣賞他，對他也非常尊敬。耶穌會決定恢復在巴西的馬蘭約

（Maranhão）傳教區，國王的朋友維拉，就成了這個計畫的執行人。歸化印第安人是他早就有的想法。這一回，外交家和國王告解神父變身成為傳教士。

印第安人的「老爸」

1652 年末，維拉離開葡萄牙到巴西管理馬蘭約傳教區。他大力支持印第安人，贏得了「老爸」（Paiaç）的稱號。他學了好幾種印第安語言，用其中六種寫教理書；他為傳教區募得大筆捐款及救濟品；他更不眠不休地為印第安人爭取權益。當時雖然有保護印第安人的法律，不過並沒有人認真執行。他認為把印第安人從殖民者利爪下搶救出來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他們聚集在村莊，實行自治。維拉寫了許多信給國王，建議他採取激烈的手段，也打了半個勝仗。為了取得全面勝利，他決定回到葡萄牙，親自向國王說明原委。

他達成了全部目的，凱旋回到巴西。他大力推動建立由耶穌會領導的村莊，達五十一個。這種情況讓殖民者抓狂，他們要的是廉價勞工，於是要求神父們只能從事關心村民精神生活的工作。反對維拉的聲音愈來愈多，維拉的最大靠山——約翰四世於 1656 年去世。三年後，德都西奧繼位，他的妻子露易莎（Luísa de Guzmán）攝政，卻未能有效管理殖民地。1661 年 9 月，維拉被迫再一次航向葡萄牙，實際上是被驅逐。

兩年之前，即在 1659 年 4 月 29 日，維拉犯了一個平生最大的錯誤。他寫信給他的朋友——日本主教佛南德斯（André Fernandes），向他保證，根據賓達拉的預言，約翰四世將要復活。這封信傳遍葡萄牙，成了敵友雙方的話題。

反抗宗教裁判所

維拉堅持他的救世論和復活預言，雖然大家都半信半疑。現在情勢轉變了，一度被視為民族英雄的賓達拉，開始被染上異端的色彩。維拉驚慌地發現，以前的相識，不是假裝沒看見他，就是根本不理睬他，他將面臨宗教裁判所的審判。

維拉把他的理論再作系統性的檢視，他的時間不多了，因為決定命運的一年，就是葡萄牙要建立完美的基督王國的 1666 年逼近了。

1663 年，宗教裁判所開始頻頻偵訊維拉，兩度問及關於他寫給佛南德斯主教的信。10 月 3 日維拉被判有罪，他要求申辯。一個又一個備忘錄，一次又一次偵訊，到 1665 年 10 月 1 日，事情發展到最高峰：維拉被捕下獄。

1666 年過去了，他預言的奇蹟並未出現，可是不承認失敗。他瘋狂地重寫、再詮釋他的理論，並保證會給大家一份最後的、確定的報告。這份報告從未出現。1667 年 12 月 23 日，他被判監禁在耶穌會的一所會院裡，並要保持緘默。

九條命

不過我們的變色龍就像貓一樣有九條命。翌年維拉獲釋，被送到羅馬，負責耶穌會殉道者依納爵·雅茲維多（Inácio de Azevedo）列真福品事宜。

維拉在羅馬的假期有六年之久（1669-1675）。他仍然宣講，不過已經不如從前成功。他拚命工作，揭露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不當方法，在這方面倒是有一些成果。1674 年，教宗克勉十世頒布文告，中止懸而未決的信仰審判（autos-da-fé）。宗教裁判所

只服從了部分：它取消了死刑，以焚燒肖像代替，不過審判依舊繼續。

里斯本當局知道維拉背地裡支持猶太人，反對他的伯多祿二世，找到把他趕出羅馬的方法。離開羅馬前，他接到教宗的書簡，豁免了他被葡萄牙宗教法庭所定的罪。帶著這份珍貴的文件，他來到里斯本，時為 1675 年 8 月。當他發現那裡的形勢對他並不友善時，遂於 1681 年，第四度啟程前往巴西。

他到達巴西後得到的第一個從祖國來的消息，就是宗教裁判所復活了。孔布拉（Coimbra）的學生為了討好民眾，焚燒了他的肖像。他悲痛地評論說：「一個曾為國家冒了如此多次生命危險的人，不應得到這樣的葬禮。」

他退休住在巴亞（Bahia）近郊一個名叫騰格（Quinta do Tanque）的農莊裡，在那裡他繼續寫作與作夢。出人意料地，我們的朋友岡薩雷斯再次肯定他，任命他為巴西巡察。從 1688 年到 1692 年，他謹守崗位。1694 年，他從石梯上摔下來，傷勢嚴重；兩年後，他再次在同一地點跌倒，便被送到位於首都的耶穌會院，在那裡度過餘年。他於 1697 年 7 月 18 日安息主懷，享年八十九。

1997 年慶祝維拉百歲冥誕時，他被尊稱為「葡萄牙之王」，這是他活著時從未有過的榮譽。

保羅·史納利
(Paolo Segneri, 1624-1694)

史納利一如維拉，是偉大的宣道人，但行事為人卻與維拉相反。如果我們說維拉勇於冒險犯難，那麼，史納利就是那種不願偏離既定道路一步的人。維拉是天生的鬥士，樂於為維護自己的理想，挺身而出對抗宗教裁判所。如果史納利企圖阻撓岡薩雷斯，那只是出於服從。維拉起伏的一生，可說的太多了；史納利的生平大概只有短短幾行。

兩人脾氣的差異可以從他們的講道內容一窺端倪。兩人都歌頌當時的流行風尚，維拉像狂暴洪流，一瀉千里；史納利則像一座莊嚴堅固的建築，線條古典，經過仔細琢磨且施工精良。

平民傳教士

史納利一踏進講道生涯就大獲成功，他的名聲很快達到巔峰。他的四旬期道理被收集在他最有名的著作《四旬期》（*Quaresimale*）裡。因為他每年四旬期都要到不同城市宣講，所以他都會再三琢磨這些道理，務求盡善盡美。

史納利在 1660 年作神操時，得到很大的神恩，決定要從此度一個更聖善的生活，多多懺悔自己的罪。因為不能如願到印度去，他便請求長上派他到民間傳教；於是，從 1665 年到 1692 年，史納利獻身這個工作二十七年。

四旬期的講道告一段落後，從復活節到秋天這段時間，史納利每年都會辦二十到二十二個培靈會，冬天則是他寫作的日子。他跑遍義大利的北半，跑完十六個教區，也跑了另外七個教區的

部分地方。史納利到過的地方共兩千一百六十處。

史納利每到一處都吸引許多羣眾，特別在領聖體的日子，常常超過兩萬人，有時達到兩萬五千甚至三萬人，在一些特殊場合，還會超過七萬人。為了和好聖事，史納利要請四十到五十位神父，日以繼夜不眠不休地聆聽信徒的告解。

大家注意到聖體聖事與和好聖事對家庭治癒、解決紛爭和寬恕仇人，都極有幫助。在四十起暗殺事件引起的騷動後，史納利帶給熱那亞地區的和平，更是令人最難忘懷。

每個步驟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從講道神父莊嚴地進入聖堂開始講道，到道理結束；每天的禮儀與悔罪遊行；團隊的組合——不超過兩個傳道員，以及司鐸與信友的合作，都天衣無縫。

教宗的講道神父

1691年冬天，本名畢納德利（Antonio Pignatelli）的新任教宗諾森十二世，召見史納利，想指派他當自己的講道神父。史納利向總會長岡薩雷斯請願，求岡薩雷斯替他拒絕這項指派，因為他不可能接受。

史納利寫信給他的密友佛羅倫斯大公爵，向他解釋自己不勝任的理由，並揭露一些不容置疑的事實：「我從來不曾即興講道；每次宣講我都要事先準備，並且需要一個月的時間。現在我六十九歲了，我的記憶力開始衰退。我哪有足夠的時間為即將來臨的四旬期準備道理呢？」

教宗在1692年2月19日的傍晚召見了史納利，作了一些讓步：不勉強他從這個四旬期開始，或者先只講一個或兩個道理；如果這樣還不成，也可以從將臨期開始。教宗切切請求，他實在不能理解為何史納利自認為沒有能力上講道臺，他說：「這個人

到底在想什麼呀！」

教宗的努力有了結果；他很高興地稱史納利為聖赦院的神學家。

但是，史納利內心的傳教士卻催逼著他在講道中去探討那些真正棘手的問題：處處用人唯親，國家主義分裂教廷，虛偽賣弄，教會財產的管理等等。教宗對此感到滿意，但是教廷內的人士卻大表不滿，並表現出來讓史納利知道。

與岡薩雷斯衝突

傷腦筋的岡薩雷斯事件正好在這時刻爆發：嚴格或然論的戰士出擊了。史納利是第一個反對岡薩雷斯的人，兩人年歲相若，學資歷相等，都是經驗豐富、受大眾歡迎的宣道人，也都是神學家，兩人理應像孿生兄弟般非常了解彼此。事實卻相反，史納利站在岡薩雷斯參贊們的一邊，且是他們與教宗的中間人。本著忠誠與正直的個性，史納利跟岡薩雷斯長談，謙虛又坦白地告訴對方自己的想法，不過沒有結果。1692年6月8日，他又給岡薩雷斯寫了一封信，仍然不發生作用。

只剩最後一招了，就是訴諸修會大會，耶穌會的最高立法機構。需要召開耶穌會修會大會嗎？

史納利堅持應該召開修會大會，於是逐層遊說。他先成為省會議的一員，再以省代表身分出席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上經過對有效票的討論後，大家認為，在某方面來說，應該召開修會大會。

再見

他無緣看到這齣戲的結局。幾個月後，就在1694年6月，

羅馬夏季最炎熱的時分，他病倒了，經診斷是消化不良及急性腸胃炎。人們把他送到底佛利（Tivoli），那邊的氣候比較溫和，可是他的情況並沒有改善。於是人們又把他送回他的故鄉，他的病情只是愈來愈壞。他的朋友佛羅倫斯大公爵科士姆四世（Cosimo IV）送來的好酒也幫不上忙。到了 12 月，他的病情已經十分嚴重，當時的亞班尼樞機（Cardinal Albani），也是後來的教宗克勉十一世，前來探望他。

「最可敬的樞機，我們說過要一起到亞班奴（Albano）和聶督奴（Nettuno）一趟，現在我要離開人世了，您有什麼要求嗎？」

「可敬的神父，請您為我轉求，求天主寬恕我的罪，賜我恩寵忠於我的職責。」

12 月 9 日，史納利領了臨終聖事，總會長岡薩雷斯為他唸了最後禱文。天色漸暗，史納利安息主懷。

路易·布大魯

(Louis Bourdaloue, 1632-1704)

「宣講之王，眾王的宣講人！他把傳統的宣講提升到盡善盡美的高峰；他連續宣講了三十四年，而且愈來愈成功。」、「在路易十四統治最輝煌的時期，他是眾多有格調的大師中的一位。」、「法國的聖德和口才，都集中在他身上了。」

以上是傳記作者與評論家對耶穌會士布大魯的評語。

從鄉下到首都

他出生於法國波吉斯（Bourges），就讀於耶穌會在鎮上辦的學校。一天他忽然失蹤了。原來他離開家鄉跑到巴黎，加入位於聖日爾曼區聖緒爾比斯鐵甕（Pot-de-Fer-Saint-Sulpice）街上的耶穌會初學院。但他沒有料到父親會反對。這位父親趕到巴黎把他帶回家，但是這個男孩的意志比他父親的還要堅決，他有自己的路。

布大魯在耶穌會受訓練多年後所獲得的評語是：「各方面皆表現優異」。當發現自己具有演說的特殊天分時，他便專注發展自己的演講才能。先在各省會，如亞眠、魯昂（Rouen）、雷恩斯（Rennes）等地牛刀小試；一俟打出了名氣，便站上巴黎的講道臺，向要求甚高的巴黎市民宣講。

他的第一次宣講就征服了巴黎，那一天是 1669 年諸聖瞻禮日。這不是一個只有一天的成功——雖然俗語說：得來容易的名聲往往轉瞬即逝，但他的聲望卻是隨他講道的次數增加而升高；人們聽他講道的次數愈多，就愈喜歡他。

布大魯在 1670 年四旬期的講道獲得一連串的成功，他也成為流行對句的主題。在 4 月 7 日，復活節慶期第二日那天，他講最後一個道理，當時國王的弟弟，奧爾良的菲利普親王（Highness Philip of Orléans），英國的安妮公主（Henriette-Anne）都在場。從此以後，他在皇宮裡講了五次四旬期道理、七次將臨期道理。

布大魯在巴黎連續宣講了三十四年（1669-1703），一年比一年成功，直到去世為止。

內容與形式

布大魯宣講的教義是教會的傳統教義。他用傳統教義清晰地駁斥新教徒、楊森學派人士和虔信派信徒（Pietist）。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針對加利剛條文的辯論，他並不認同王室的立場。他認為，基督徒的道德規範應該既不過度嚴厲也不過度放縱。對聖佩韋（Sainte-Beuve）來說，布大魯的宣講是對巴斯噶（Pascal）的《給一位省會長的信》（*Provincial Letters*）一書的最佳駁斥。

布大魯的論點是嚴謹的，這應該是他成功的關鍵。在當時那個無視於其他人想法的輕浮社會裡，大眾對理性仍是敏感的。

布大魯的講道大概有兩種形式：一是一般的，以聖母經作結束；另一種則是運用更具體且精確的方式。至於道理的內容，則分為三個部分：引述教義，從教義延伸出來的道德教訓，以及描繪基督徒按照這個規範生活所呈現的畫像。那可能是一個極度嚴格的區分，不過布大魯很有技巧地做到了。這是他成功的另一個原因。

一位使徒

布大魯的聖德與個人魅力，使得他極具影響力。他尊重權

貴，但不卑不亢；對貧窮卑微的人總是單純又可親。他從不疏忽去探訪病人或囚犯；對臨終的人，更展現非凡的扶助能力，尤其是罪惡深重者。

他也關心心靈脆弱的人，像英國廢后瑪莉·貝翠絲（**Marie Beatrice of Modena**），高隆汴也曾是她的神師。她常常提及布大魯：「他是了不起的導師。他不在乎世俗事物，也是個沒有架子的人。」

六十八歲那年（1700），布大魯表示想退休的願望，卻未獲允許。一位本篤會士在 1704 年 3 月拜訪他，那位會士是楊森學派信徒，被軟禁在文生（**Vincennes**）。他跟布大魯會面後，被他的愛心完全征服了。同年 5 月 10 日星期六，聖神降臨瞻禮前夕，布大魯探訪臥病中的傑佛公爵（**Duke of Gesvres**）；11 日的主日彌撒讓他筋疲力竭。星期二，他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

方濟·傑若尼歐

(Francis de Gerónimo, 1642-1716)

上面提到的維拉、史納利和布大魯等宣講大師都講究修辭，在意自己的風格。下面我們將提到的大師，則不在乎自己的言詞是否典雅，只在乎言詞是否夠力。

那不勒斯使徒

傑若尼歐神父在那不勒斯活躍了整整四十二年（1674-1716）。他唯一的活動就是宣講，特別是所謂的「那不勒斯佈道大會」。

平民佈道大會一般是連續好幾天，而那不勒斯的佈道大會則涵蓋主日，全年每個主日都有，而且每年都辦。佈道地點優先選擇具戰略地位的地方，其中卡斯特羅廣場（Piazza del Castello）最受青睞。每個月的第三個主日則在耶穌會的新耶穌堂（Gesù Nuovo Church）舉行盛大的領聖體禮儀，那是佈道大會達到最高峰的時刻。

那時候，那不勒斯約有二十萬居民，他們住在街上，為生活奔波。他們在那裡做買賣，燒煮進食，享受黃昏的清涼。小酒館是人們聚集的中心，約有五百家。

卡斯特羅廣場被公認為是龍蛇混雜的地方，傑若尼歐神父則認為這是最理想的宣講地點。每個主日傍晚，他都會來到這裡。他的基督生活團的成員們走在前頭，先把羣眾聚集起來。那時，變戲法的、走鋼索的、耍雜技的、插科打諢的、甚至跳毒蜘蛛舞的，全都停止活動，神父開始說話了。他首先說一小段關於童貞

聖母的道理，接著大肆抨擊罪惡深重的人。

他每次宣講都有固定的結束儀式：他高舉十字架並告訴聽眾，基督為眾人流了血，接著告訴眾人，為了他們的悔改，他也要這樣做；這時，他取出一條鐵鍊，在眾人面前開始鞭打自己，直到流血；最後，在羣眾的跟隨下，回到新耶穌堂。羣眾準備辦告解。傑若尼歐神父坐進告解亭裡開始聽告解，並赦免他們的罪過。

十年內，他歸化了 3,674 人。罪犯會把他們殺人的武器交給他。現在這些武器放在一個特別的展覽櫃裡，與聖人的紀念品一起展示。

最熱鬧的地區

在週內慶節的日子里，他多半到市內小酒館林立的地區，向那些苦悶的民眾傳教。他的方式一成不變：遊行、宣講，然後回程。

公開的抗拒與反對也不是沒有，往往來自不知羞恥的妓女。她們靠在窗戶上，大聲嘲笑神父。不過，傑若尼歐神父並不曾因此而膽怯。他每一次宣講似乎是衝著某幾個妓女而來。開始時，她們或許會捉弄他，但是最後總是會跪在他的十字架下，請求寬恕。

傑若尼歐神父好像有特殊能力，能洞悉人內心深處的祕密。這種事情就發生在艾薇娜（Alvina）身上。艾薇娜多年來女扮男裝，以軍人的身分出現。她以假名卡羅·皮門特爾（Carlo Pimentel）投軍攻打阿布魯佐（Abruzzo）的強盜。她既勇敢又堅強，一點不輸男性夥伴。後來她來到那不勒斯，被分發到新堡（Castello Nuovo）服役。

1688 年狂歡節的一個晚上，遊行隊伍來到卡羅站崗的大門前，傑若尼歐神父就在附近站住，開始宣講。換班的時間到了，卡羅的小隊正準備離開，傑若尼歐神父停止宣講，走到卡羅面前，請他留步。

「幹什麼？」

「你不要來告罪嗎？我的孩子。」

「我沒有罪。」

「你怎麼會沒有罪呢？」

「最少我不需要辦告解，我還不至於要被吊死。」

「你叫什麼名字？」

「二等兵卡羅·皮門特爾，來自西班牙。」

「不要說謊。」

「神父！」

「你的名字是艾薇娜，你是法國人法蘭·卡西爾（François Cassier）的女兒。」

卡羅還要否認，傑若尼歐神父打斷了她：

「我還要告訴你更多的事情。你和你的妹妹殺死了父親，並把他的屍體埋在樹林裡。」

「你胡說！我不知道你從哪裡聽來這一派胡言。」

「我的十字架苦像告訴我的，祂總是告訴我實情。」

事實確是如此。艾薇娜的父親是巴黎富商，一個路德教派信徒，他希望妻子瑪德蓮（Madeleine）和兩個女兒艾薇娜與露易絲也信奉路德教派，可是瑪德蓮不肯，他就把她給殺了，而他也被關進牢裡。不過，他買通了法官，因此獲釋。法國不能再留，他打算帶兩個女兒逃到瑞士。穿過森林時，三人停下來進餐，他多喝了一點酒，睡著了，兩個女孩決定殺了他以絕後患。她們拿他

隨身攜帶的手槍，朝他開了兩槍，然後挖了一個坑，把他埋了，再以樹葉覆蓋。之後二人動身前往米蘭，不去日內瓦，她們在米蘭投軍。艾薇娜緊守祕密，直到 1688 年的一個主日下午被傑若尼歐神父揭露出來。

第二天，這位傳教士到新堡找她，把她帶到新耶穌堂。從此她離開了軍隊，靠著神父為她向政府爭取到的津貼度過餘生。那年她三十歲，在軍中服役了十四年。

每月的第三個主日

主日宣講在每個月第三主日的領聖體禮達到最高峰。九天前，傑若尼歐神父便走遍那不勒斯，邀請教友於此日前來領聖體。到了那天，羣眾從那不勒斯的四面八方蜂擁而來，不但有來自市內，也有來自市區周圍較遠的鄉鎮，如阿儂齊亞塔（Torre Anunziata）的。

從清晨開始，人羣就像潮水般湧向新耶穌堂。大街小巷都是人，有全家出動的，也有全鎮出動的。

那麼多的人，當然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進入教堂，他們得排隊等候，不過傑若尼歐神父總是在那裡歡迎他們。當其他司鐸在聽教友告解時，傑若尼歐則在領聖體禮前講一篇道理，禮後他又講一篇，分別為準備領聖體及謝聖體。

前一批人離開後，後一批人才得進入，整個程序不斷重複。傑若尼歐整個上午都在講道，而且是跪著講的。他估計領聖體的人有一萬一千到一萬三千人，有人甚至認為有兩萬。有人估計，傑若尼歐在四十年的使徒生涯中，講了五千次的準備領聖體道理，送了十五萬次聖體。

傑若尼歐神父不出去講道或拜訪窮人時，他就待在聖堂裡，

天主的家就是他的家。他總是跪著，宣講時也不例外。當他在告解亭內碰到沒有人來告解時，就會走出來，然後面向祭臺跪在地上，等候下一個懺悔者前來。

天主的施賑吏

在那不勒斯窮苦大眾的眼中，傑若尼歐神父就是「天主照顧」的同義詞。窮人總是圍繞著他，他們在街上把他攔下；在告解室以種種問題困擾他；等著他從傳教工作回來；打斷他在教堂裡的祈禱。也有人毫無節制地、像水蛭般一點也不放鬆地吸取他，他體會到他們是他最重的十字架。不過，他總是面帶微笑，溫和地幫助所有人：有人按時收到房租；有人每週得到一筆固定數目的款項；一位母親，得到一份嫁女兒所需要的嫁妝。

這些財物都是傑若尼歐乞求得來的。他向富人求，幾乎都會得到所求的。一天一個婦人把他攔下來，說她需要一筆旅費返鄉。傑若尼歐告訴她，他手邊一毛錢也沒有，不過一等到他有錢，一定會幫助她。婦人不理會，堅持說：

「不，不，我馬上要！除非你現在把錢給我，否則我是不會放你走的。」

傑若尼歐耐心地把她帶到市場那邊，然後一個攤位又一個攤位地向人乞討，直到湊足那筆錢為止。

求乞不是傑若尼歐獲得行愛德所需物資的唯一方法。他節衣縮食，他收集桌上的殘餘，用來餵養飢餓的人。他會繫上圍裙，極為和氣地為在大門前排隊的窮人服務。

他對病人的態度也一樣，特別是那些又病又窮的。他會放下其他一切事情，跑去探問他們、陪伴他們。在醫院裡，他會逐個病床走過去，一一安慰病患，並聽他們告解。有時他甚至會停下

來幫他們梳洗，或者給他們一點錢。每個人都想把他留在身邊。

有一個名叫喬凡尼（Giovanni）的土耳其奴隸，皈依了基督。他的主人在他病倒時，狠心地把他拋棄了。他得了嚴重的疝氣，腸子糜爛，臭氣熏天。他躺在教堂門口行乞。他的情況愈來愈嚴重，發出的臭氣令人越發不能忍受。那時，傑若尼歐神父與他最親近，不但心靈相契，也不怕肉體接觸，與他臉貼臉長談，好似臭味根本不存在。後來，傑若尼歐租了一副擔架，把喬凡尼送到收留不可治者的病院去。神父一路上握著他的手，就像喬凡尼是他的兒子似的，及至把喬凡尼安頓妥當，神父仍然陪著他，直到他去世。

最後的旅程

1713 年夏天，傑若尼歐神父問熱羅來莫·薩維諾（Girolamo Savino）：「熱羅來莫先生，我們多久沒見面了？」

「三年了，神父。」

「那麼，我們還會再見面，因為我們還有三年的日子。」

兩年後，兩位朋友又碰面了。

「兩年過去啦，只剩下一年啦！最後的日子不遠了。」

不過，他到底是指誰的最後日子呢？熱羅來莫先生以為是在說自己，一直等到傑若尼歐神父臨終時，他才明瞭神父說的是他本人。

1716 年 3 月，傑若尼歐神父得了感冒，之後演變成肺炎，情況愈來愈糟。到了 5 月 3 日，他要求領臨終聖體；他跪在地上恭領了聖體。9 日傍晚，他領了臨終聖事。他病得很厲害，人們聽到他祈求天主賜給他忍受痛苦的力量。當他覺得稍微舒服一點的時候，他就誦唸〈謝主曲〉（Magnificat），或與看護他的修士一

起唸〈感謝天主〉（Te Deum）。

5月11日是他在人世的最後一天。他已不太能說話，不過雙眼仍能訴說內心的熱情。他努力完成他必須做的最後幾件事：謝謝耶穌會容忍他疏於學習、虔誠不足；他請求天主以及會裡弟兄原諒他的過失；他祈求耶穌賜給會裡兄弟「拯救人靈的心火」；他獻上他的生命與苦痛。如今剩下的就是獻上他的死亡了。那天接近中午時，他的死亡時刻來到了。

教堂的鐘聲並沒有因此而敲響，因為害怕羣眾會蜂擁而至。不過，傑若尼歐神父去世的消息還是很快就傳遍整個那不勒斯，教堂及更衣所瞬間擠滿了等待瞻仰神父遺容的人羣。長上為了慎重起見，特地請總督幫忙；總督派了一些武裝士兵來站崗。日落後，傑若尼歐神父的遺體被抬了下來。大批羣眾推擠著；有人擠向前，想抓下一些遺鬚，被派來的士兵根本不足以保護它。遺體放在那裡實在很不安全，他們只好把神父的遺體放在裝設圍欄的小堂裡，才能勉強維持秩序。

殯葬禮儀在第二天舉行。一切進行順利，除了有幾個人大聲呼喊，請已去世的神父為他們治病。

安道·巴狄努 (Antonio Baldinucci, 1665-1717)

傑若尼歐神父一生未曾踏出那不勒斯；史納利都在義大利北半宣講；巴狄努則向中部進軍，以弗拉斯卡蒂鎮（Frascati）為基地，在羅馬四周的鄉鎮傳教。

意外獻身

巴狄努出生於文風鼎盛、學術氣氛濃厚的佛羅倫斯，並在那裡接受教育。他原本非常渴望進入道明會，不過父親卻深受一位有聖德的修女的話影響；修女預言巴狄努會進耶穌會，而且會成為聖人，於是老先生想盡辦法不讓修女失望。年輕的巴狄努為此去做避靜，結果更堅定他的想法，立志要成為道明會士。未料，一個突如其來的清晰意念，讓他再不懷疑自己的聖召是成為耶穌會士。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他選擇為平民傳教一事上。他本來渴望到國外傳教，只是健康欠佳去不了。本來排斥平民傳教的他，長上卻在他學業結束時，派他向平民佈道。

他於 1697 年在維特保城（Viterbo）開始工作，二十年的傳教生涯從此展開，直到 1717 年去世為止。因他使用史納利的方法而被認為屬於史納利學派，其實他有自己的方式。例如，他不像史納利那樣以很有派頭的方式進入教堂，而是靜靜地走進教堂，在長長的祈禱後，再站起來鏗鏘有力地向羣眾宣講。

行動多於語言

他成功的祕訣是這樣的：他生活非常儉樸，吃得很少，晚上大概睡三個小時，而且睡在地板上，其他時間都在祈禱；出外傳教時都赤腳而行，把少得可憐的行李綁在手杖上，或是揹在背上。

他和藹溫柔，言詞卻像火。他口中的天主，既仁慈可愛也公正嚴明；他的言詞很有說服力。

到了今天，雖然兩個多世紀過去了，當年他曾傳教的地方的的人仍然記得他。

傳教士之后（Missionary Madonna）

他隨身攜帶著一幅「罪人之託」聖母的畫像，他相信是聖母讓罪人改過回頭，是聖母聚集了一批又一批的羣眾前來領聖體，經常有三萬人，一次甚至達六萬人。在一處地方的佈道結束後，傳教士之后和傳教神父便帶領著五千信眾，到下一個目的地去。

巴狄努神父的「傳教士之后」愈來愈有名氣了。神父覺得應該為她正式加冕。可是有一個困難，所有受加冕的聖母都需要先有一個固定供奉的地方，可是他的聖母沒有。一個明白神父心意的人說：「只要巴狄努神父想要，那一定會成功。」

事情果真如此，為聖母加冕的難題解決了。教宗克勉十一世批准了加冕典禮；阿爾巴尼樞機於 1717 年 7 月 7 日隆重地為巴狄努神父的傳教士之后加冕。

這位可敬的傳教士也在同年 11 月 7 日領受了自己的冠冕。他把他的聖母畫像帶到臨終床邊，雙目緊盯著畫像，安然去世。

伯鐸·卡拉塔尤
(Pedro Calatayud, 1689-1773)

這個出身納瓦拉（Navarre）的少年，從歷史悠久的維拉加西亞（Villagarcía de Campos）初學院被放逐到義大利；從榮耀的日子走到受迫害的悲慘日子。

除了宣講，卡拉塔尤另外還做了一件事：經過他個人及霍約斯（Bernardo de Hoyos, 1711-1735）、嘉達維拉（Cardaveraz）等人的努力，成功地把耶穌聖心敬禮引進西班牙，那實在是當時耶穌會所做的最好的一件事。

宣講四十九年

卡拉塔尤是這樣與眾不同，理所當然成為當時最了不起的平民傳教士。在 1718 年到 1767 年的四十九年傳教生涯裡，他擊敗所有其他傳教士。他無遠弗屆，除加泰羅尼亞省（Catalonia）外，全西班牙都有他的蹤跡；他也沒有遺漏葡萄牙。最後，他以為神職人員講避靜及寫作，為他的傳教生涯畫下句點。

他出生於塔法拉（Tafalla），先後在潘普洛納（Pamplona）和亞卡拉（Alcalá）求學，1710 年 10 月 31 日進入維拉加西亞初學院，1718 年 2 月晉鐸，9 月開始傳教工作。他本來打算只從事傳教工作，可是長上賦予他別的職責，只容許他夏天去傳教；直到 1728 年，他才獲准得以自由自在地宣講。他一生最輝煌的時期從此展開。

他來來回回走遍整個西班牙：阿斯托加（Astorga）、萊昂（León）、塞哥維亞（Segovia）、帕倫西亞（Palencia）、加利西

亞（Galicia）、納瓦拉、畢爾包（Bilbao）、安德露西亞（Andalusía）、默沙（Murcia）、阿利坎特（Alicante）、阿斯圖里亞斯（Asturias）、桑坦德（Santander）、布爾戈斯（Burgos）、薩莫拉（Zamora）、沙拉曼卡、葡萄牙、卡拉塔尤、盧戈（Lugo）、奧倫賽（Orense）、法來多利、卡斯蒂利亞、亞拉岡、托利多、亞味拉、塞維爾（Sevilla），及維爾瓦（Huelva）等地。在他被逐（1767）前的最後五年，他都待在西班牙北部。

他仔細研究過自己傳教的方法，並在他的著作《講道與傳教》的第一冊裡，經常提到並描述這些方法。裡面有一些是史納利的東西，其餘的都是他融合了西班牙民情的構想。

1739 年開始，他也帶領一般信眾做原為神職人員量身訂做的避靜。來參與的人很多：1743 年在葡萄牙布拉卡（Braga）有六百人；1749 年羅格洛諾（Logroño）一百六十人；1750 年 1 月卡拉歐拉（Calahorra）五百五十人；1750 年 2 月納赫拉（Nájera）六百七十九人；1750 年 4 月卡撒達（Calzada）七百五十人；1753 年托利多八百人；1765 年阿斯托加四百人；1766 年 5 月哈洛（Haro）四百三十人；1766 年 7 月羅格洛諾五百七十人。

主內朋友

卡拉塔尤的聖德和他活潑的使徒活動，使得他成為全西班牙最有名望的耶穌會士，因此，擁有一羣追隨者和愛慕者就不足為奇了。這羣人當中有一小部分是耶穌會士，他們把耶穌聖心敬禮引進西班牙。卡拉塔尤事實上也是其中一個。

這個運動約始於 1726 年。當時還是法來多利大學神學系的學生嘉達維拉（Austín de Cardaveraz, 1721-1770），讀到賈利費特（Gallifet）談到敬禮耶穌聖心的書，引發他敬禮的心火，並把這

個心火傳給了霍約斯。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嘉達維拉在畢爾包工作，他希望給民眾講述耶穌聖心的事蹟，他需要再次閱讀賈利費特的作品，可是在畢爾包找不到，於是請他的朋友霍約斯為他抄寫一些篇章，兩人從此開始通信。霍約斯第一次讀到耶穌聖心的事蹟，便被這新興的敬禮深深吸引住。

嘉達維拉於 1733 年 6 月 11 日，在畢爾包的聖若望堂講了多篇有關敬禮耶穌聖心的道理，第一篇還被刊登在西班牙的《聖心雜誌》上。霍約斯則開始推動兩件事：一是尋找熟練之能手，一是出版有關敬禮的專書。他認為以卡拉塔尤的名望，如果他肯在宣講時推崇這個敬禮，並且推動建立聖心善會，那麼，敬禮聖心運動一定會大有進展。卡拉塔尤接受了霍約斯的邀請，並於 1733 年 10 月建立第一個聖心善會。

至於出書，已有人正在翻譯賈利費特的書，不過充滿青春熱情的霍約斯和嘉達維拉嫌他太慢。他們便請若望·羅耀拉神父（Fr. Juan de Loyola）寫一本。這一次，卡拉塔尤又拔得頭籌，書名為《熊熊愛火》（*Fires of Love*）；羅耀拉神父的《隱密的寶藏》（*Hidden Treasure*）也跟著問世。

嘉達維拉傳教三十一年，足跡遍及全巴斯克（Basque）各鄉鎮。他於 1767 年遭流放，1770 年在波隆納附近去世。他的朋友霍約斯於 1735 年 1 月晉鐸，並於同年 11 月 29 日去世。

迫害與放逐

查理三世在位時，國家經濟無疑有很大的改善，不過，反對教會，特別是反對耶穌會的聲音也很強。在這段風雨飄搖的時期，卡拉塔尤被禁止進入巴斯克的任何地區。

1766 年 9 月，教區主教邀請卡拉塔尤為畢爾包的神職人員講

避靜。在城裡代理主教以及司鐸的強烈反對下，卡拉塔尤仍講了這個避靜。

以後發生了什麼事情，沒有人知道，只知道有人向首相阿蘭達伯爵（Count of Aranda）提出抗議，卡拉塔尤因此被禁止在巴斯克各鄉鎮活動。不僅如此，耶穌會各會院也被禁止講道或講避靜；卡拉塔尤的一本書亦被禁止出售甚至閱讀。

卡拉塔尤要求有答辯的機會。跟宮廷關係良好的依迪亞機神父（Fr. Idiáquez）運用影響力，好像在 1767 年 3 月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依迪亞機神父寫信給他的姪子安東尼說：「我唯一的煩惱是痛風。」情勢看似平靜，事實卻不然。有人故意不作聲色，只等一切就緒。是年 4 月 2 日大清早，伊巴沙布神父（Fr. Manuel Ibarzábal）走進法來多利聖安博書院卡拉塔尤的房間，對他說：

「神父，書院四周被軍隊包圍了。」

這支軍隊包含騎兵五十人，步兵一百人；而書院內，耶穌會會士只有三十九人，政府把他們視作危險罪犯。

那一天，這位七十八歲的老人開始他漫長的旅程，終於在 1769 年 9 月抵達波隆納。四年之後，他走完塵世的旅程，正確時刻是 1773 年 2 月 27 日下午四時三十分，耶穌會受迫害前的六個月。

4. 西方智者： 湯若望／南懷仁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 /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利瑪竇的遺產

「我替你們打開了門！」這是利瑪竇神父給同伴們的遺言。

他的同伴並沒有讓他失望。世界各地的耶穌會士爭著繼續他的工作，他們有瑞士、義大利、法國、德國和比利時神父，但能經過這扇門進入中國的，正確地說，只有德國的湯若望及比利時的南懷仁兩人。

湯若望被任命為欽天監正，他修正曆法，預測日月蝕。由於他似乎無所不能，於是朝廷要他建造大砲，防衛滿州人入侵；又要他修理古琴，以及譜寫古琴演奏用的樂曲。

1644年滿清入關後，下令撤銷太監的官職，可是湯若望並沒有丟官。相反地，年輕的順治皇帝非常喜愛他，就像孫子愛祖父一般。湯若望也回應順治的好意，不過並不犧牲自己的原則。順治是一個迷人、有天分、衝動、遇到漂亮女子就昏了頭的傢伙。於是大衛王與烏黎雅妻子的故事重演了（按：參閱撒下十一）。他愛上了一名武官的妻子；這位武官突然死了，他的妻子卻進了後宮；她生下一名皇子，但不久嬰兒死了，母親也活不成；年輕的皇帝也跟著撒手塵寰。

受審與定罪

此刻湯若望的對頭露臉了。由楊光先領頭，誣告湯若望種種罪名：叛國、散播假宗教、使用錯誤天文資料等；當年就是湯若望取代他成為欽天監正的。

楊光先於 1664 年正式告到官府。湯若望、南懷仁、利類思（Buglio）和安文思（Magalhães）等耶穌會士，被關在一個骯髒的地牢裡。開庭了，起訴人於 12 月 27 日提出指控，1665 年 1 月 4 日宣判：主謀湯若望被判吊死；餘三人，鞭打後驅逐出境。

然而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插曲：官府決定審查第三項偽造天文數據的罪名。

機會來了。不久之後將會有一次日蝕，三組天文學家——中國、回教和基督宗教的——分別預測該次日蝕發生的正確時間。耶穌會士認為應在下午三點發生，回教徒認為應該早半個小時，而中國人則認為早三刻鐘。

傳令員宣布：「楊光先預測的時間到了！」

但太陽仍然照耀著；回教徒預測的時間到了，太陽也依舊明亮；及至南懷仁預測的時間來到，一道陰影開始覆蓋太陽。

可是這件事仍救不了他，中國官府仍判他有罪，並於 2 月初再度將我們的人關進牢裡，而且提出了更多新的、更嚴重的、完全荒謬的指控，結果湯若望被判斬首之刑。

最後，他被太皇太后救了出來；她不願見到兒子最好的朋友被判刑，所以釋放了他。

當他被釋放時，已經被折磨得不成人形。1666 年 8 月，他走完了高貴又豐富的一生，享年七十三。

當然接班人

湯若望的衣鉢當然由南懷仁繼承。其實南懷仁已經替代他，他於 1660 年抵達北京，代表西方天文學家參與與楊光先的辯論。

1667 年底，年輕的康熙親政。他有感於楊光先任職期間，曆書多有錯誤，需要重新修訂。耶穌會士注意到 1669 年足足多了一個月，楊光先為此惡意攻擊傳教士和他們的天文學者。康熙不准他們再爭執，下令雙方作一次測試競賽，他派人拿了一個球來，要雙方算出次日中午球的影子會落在何處。楊派的人不知從何著手，而南懷仁他們則按著一般計算程序算出來了。結果，楊光先被逐，南懷仁受命為欽天監正。

他一上任，便馬上下令修正曆書中錯誤的部分。官員們嚇壞了，因為這是由皇帝頒布的重要文件，隨意修改會讓皇帝丟臉。不過，南懷仁並不屈服。他說：

「我也沒有權力要求天上星辰按照你們的曆書運轉呀！多出來的一個月一定要修正過來。」

他們做到了。南懷仁贏了第一場大勝仗。

皇帝的寵臣

南懷仁的任務包括教授觀象臺的學生數學和天文學，有不少熱愛西方科學的官員也來上課。為了滿足這些學生，南懷仁寫了很多本有關科學問題的書，光是有關天文的就有三十三冊。

皇帝本人渴求新知，自己也去當耶穌會士的門生。南懷仁教他幾何，然後哲學，甚至音樂。康熙為了表達他的謝意，讓他入籍為滿州人，並賜他多個頭銜，如：通政使、工部右侍郎等等；康熙也廢除了迫害基督徒的敕命。

康熙與南懷仁的關係，不似他父親順治與湯若望般親密；開始時冷漠、猜疑，有了信心後，才逐漸跟他接近的。南懷仁在他最後幾年享有的地位，一定讓其他朝臣眼紅不已；許多朝臣難得見上皇帝一面，而南懷仁卻整天跟他在一起。

工程師

獲得這個名望的代價是很高的，因為康熙皇帝的期望好似永無止境。不過南懷仁從不讓他失望。他會製造鐘錶、水力機械、蒸氣馬達——可以把空氣打進管風琴模仿鐘聲和夜鶯的歌聲。他更新了觀象臺的設備，原來的設備又老又舊，已不堪使用了。他又設計了「地平儀」、「六分儀」、「象限儀」、「天體儀」和「赤道經緯儀」。這些儀器現在仍安放在北京觀象臺的平臺上。

一次突發的叛亂促使康熙命令南懷仁製造新的大炮，因為湯若望當年建造的太重了，在野外搬運不便。南懷仁不慌不忙，但為避免被懷疑同情敵軍，他賣力工作。第一次嘗試成功，皇帝要他再做二十座。後來需求倍增，南懷仁的鑄造廠受託製造三百門火炮。當這些大炮試射成功時，皇帝把自己的黃馬褂披在他身上，以表示對南懷仁的寵愛，這是極為難得的。

另有一次，一批巨大的花岡石需要從京城唯一聯外橋梁通過，大家很擔心該橋承受不了。這顯然是一個應用物理學的問題，當然得向我們的西方智者請教了。南懷仁神父設計了一組滑輪，利用滑輪把大石塊慢慢地、輕輕地拉了過去，而橋梁絲毫無損。

外交

滿清與俄國接壤，兩國之間的領土紛爭由來已久。俄國人一

直覬覦中國與西伯利亞相接的肥沃平原，已在黑龍江最北端的雅克薩（Albazin）及尼布楚（Nerchinsk）建築要塞，作為劫掠中國邊疆市鎮的基地。1656年至1676年間，滿清多次征服這些要塞，也多次失去它們，因此雙方都希望找出和平共處之道。

這是俄國使團前來的目的。該團由史巴利（Nikolai Govrilovich Miliescu Spathary）帶領，於1676年5月15日抵達北京。史巴利是一位有學問的希臘裔紳士，通多國語言，包括拉丁文。康熙派了一個代表團接待他們，南懷仁是當時的翻譯官，協調會以拉丁語進行。

南懷仁不知不覺地從單純的翻譯官身分，慢慢地成為調停人。這位調停人會告訴俄國人滿清談判人員企圖掩蓋的事實。例如，清廷大臣說不敢向皇帝轉達俄國人想覲見的要求；那不是真話，因為康熙常常垂詢有關俄國使團的事。中國官員以為俄人的防禦力極差，於是提出一些俄人絕不會接受的要求，好能維持戰爭狀態。

這一回，史巴利空手而回。不過，另一位耶穌會士張誠（Jean François Gerbillon）在1689年8月的談判中，成功地扮演了翻譯兼調停人的角色。

最後的服務

康熙常到滿清帝國的發源地滿州巡視，南懷仁多半同行。1682年3月又去了一次，據說是為了滿州幾個最重要城鎮間的整合作。但那只是官方理由，其實康熙想讓同胞看一看自己的西方智者。康熙也喜歡邀南懷仁陪他觀看天象，指認星辰、星座，並由它們出現的位置說出當時的時間。

這樣的場景比任何其他事物更能顯出大清皇帝與這位耶穌會

士之間的友誼，也凸顯康熙企圖在他子民前塑造的形象。他希望他的人民認為他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君王：勇敢善戰，有學問，知進取。皇帝每次出巡，既是打獵，也為展示軍力；隨行的人個個盔甲鮮明、強壯勇敢。每次出巡常常花上二至三個月的時間。

不過，根據南懷仁和張誠的描述，這樣的出巡實在很累人。據他們說，皇帝一天通常要換騎八到十匹馬；中途歇息時，他會把耶穌會士召來，和他們討論哲學或科學問題。

康熙當時三十歲，正是精力旺盛的時候。可是南懷仁已經六十歲了，體力當然比不上；一次又一次的長途跋涉讓他吃不消，終於在 1688 年 1 月 29 日得病後，不久便溘然長逝。

禮儀之爭

君王的支持對傳教工作當然有利。1633 年受洗入教者超過四萬人，五年後達到七萬；十一年後超過十五萬，每年皈依的平均人數約一萬人。

不過，天主教當時在中國的實際情況與合法性都處於不確定狀態。皇帝的友誼不能保證教會能生存、有自由，即使皇帝有絕對的權力。1692 年 3 月 22 日，康熙頒布中止對天主教迫害的命令，但內容語意不清；執行命令時，亦視天主教徒與「國家」的認同程度，即教徒的禮儀呈現是否合乎「中國」的傳統，而有鬆緊的差異。耶穌會士能毫無困難地接受「中國」禮儀，因為他們覺得這與基督信仰並不相衝突。這樣做能讓信仰天主教的老百姓保有國民的權利，雖然仍躲避不了別人疑慮的眼光。情勢總是不穩定，教徒往往生活在官方保護與鄉黨的猛力迫害間。

我們必須正視「禮儀之爭」，因為它扼殺了傳教生機。這個爭論始自另外一批觀念相異的傳教士，他們喜歡用更直接、更積

極的手段要求當地的信徒，像在其他地方一樣；他們認為，中國人奉行的禮儀是一種崇拜偶像的行為，而向羅馬教廷提出指控，而教廷當局也認同他們的指控。

跟著是一段非常混亂的時期。反對耶穌會的聲浪一時遍及全世界，都把中國禮儀看作是耶穌會的陰謀，裡面隱藏了極大的惡。抗議聲浪愈來愈大，教廷終於採取行動。1704 年 11 月 13 日，九位樞機聚集討論這個有名的「禮儀之爭」，並裁定中國教徒不得祭祖祀孔，同月 20 日獲得教宗克勉十一世認可。判決終結，不得上訴。

颱風

教宗並沒有在歐洲公布這項裁決，卻派遣了特使到中國去執行這項任務。特使的名字叫鐸羅蒙席（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是皮德蒙特省（Piedmont）教士，年僅三十三歲。表面上他是來調停爭議，實際上是執行命令。他的權力遍及「東印度羣島、大清帝國和周圍的島嶼及國家」。他的特殊任務就是解決整個東方的禮儀問題。他的來臨像颱風過境，留下滿目瘡痍。

他先在印度彭地治利（Pondicherry）停留八個月，處理馬拉巴爾禮儀（Malabar Rites）之爭。馬拉巴爾禮儀之爭與中國禮儀之爭相似。在出發航向中國的前兩天，他宣布了十六個要受到教廷最嚴厲懲罰的地區，耶穌會士嚇壞了。鐸羅對中國的風土民情一點都不清楚，就像他也不了解印度一樣；他甚至不辦公聽會，單單聽信一方的指控，就輕率地處理極為複雜的問題。相關的主教們提出抗議，兩位最有名的耶穌會傳教士，布謝（Venance Bouchet）與林斯（Francisco Laines）還專程趕到羅馬，企圖阻止。只是教宗克勉十一世堅持特使的決定。

特使「颱風」於 1704 年 6 月離開彭地治利，前往中國，於 1705 年 12 月 4 日抵達北京，31 日受到皇帝（仍然是我們的朋友康熙）隆重且盛大的接見。從未有顯要人物曾受到如此待遇的。

不過，當教廷特使開始採取行動時，情況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他的任務本需要靈活的手段，並對中國更徹底的了解——比處理印度問題時更需要，可是他卻大大疏忽了。他只聽信一方之言，而忽略了另一方的意見。他使人覺得他鄙視中華文化。

老實說，耶穌會士也沒有盡到迎合的努力，正面衝突於是發生。特使斥責他們不服從、故意阻撓。1707 年 1 月 25 日那天，他警告耶穌會士：如果政府問及他們，他們應該回答說，中國的許多禮儀與規矩是違反天主的法律，特別是「祀孔與祭祖」；如果他們不這樣回答，他們將被逐出教會。

爆發敵對

康熙皇帝聲明：「祀孔與祭祖是孝道的表示，並非祈求幫助。我們也不是相信死人的靈魂住在神主牌位裡；神主牌位只不過是一個象徵，用來紀念先人罷了。」說什麼都沒有用。此時又發生了一件在外交交涉時不該發生的事：鐸羅居然在眾人面前大發脾氣。康熙深受他的狂妄自大傷害，下令將他逮捕，並將他遞解到澳門，移送給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對鐸羅也不見得更友善。

教宗克勉十一世從頭到尾都支持他的特使，他一再重複禁止天主教徒參與有爭議性的禮儀的命令，又要求在中國的全體傳教士必須遵守服從的誓言：「完全地、忠實地遵守教廷對中國禮儀與慶典所採取的態度。」

教宗諾森十三世的態度就更強烈了。他於 1723 年譴責耶穌會士不服從教宗，並嚴厲斥責總會長坦布瑞尼神父（Tamburini），

因為他沒能有效地執行教宗的指示。教宗對耶穌會作了這樣的處罰：不能再接受初學生；不可再派遣傳教士到遠東去。這對充斥全歐的反耶穌會聲浪更是雪上加霜，而這一切就像掃除耶穌會的先頭部隊，解散耶穌會的腳步近了。

中國天主教徒從此必須遵守這項關於禮儀的規定。中國政府一次又一次向教廷解釋：中國人的祀孔祭祖不是一個宗教儀式，而是風俗習慣；兩個世紀前康熙皇帝就這麼說了。不過，直到1939年12月8日，傳信部才宣布這些儀式合法；多年禁令從此取消。加在利瑪竇及他的追隨者身上兩百五十年的污名，至此才得以洗刷。

貝斯奇

(Constanzo Giuseppe Beschi, 1680-1747)

文學家傳教士

貝斯奇只是一個單純的傳教士，一位不太出名的耶穌會士。他的創舉在於他成為泰米爾古典文學大師，散文與詩的成就斐然。

要找到為他定位的點不難。他出生於卡斯提利歐（Castiglione delle Stiviere），與聖磊思（Aloysius Gonzaga）是同鄉；出於聖召與選擇，他步武諾比理（Roberto de Nobili）和布理道（John de Brito）去了印度；他對東方文化感受敏銳，這一點跟鐸羅正好相反。

似乎是林斯徵召他到馬度雷（Madurai）傳教區去的；當時林斯在義大利（1704-1710），正在設法擺平鐸羅的報告和建議。

貝斯奇於 1710 年 5 月從里斯本啟航，於 9 月或 10 月抵達臥亞（Goa）。抵埠後，他馬上動身前往印度南部學習泰米爾語。

馬度雷傳教區包括印度的最南端，現在的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高娃里河（Cauvery）或稱科勒隆河（Coleroon River）把南印分為大小幾乎相等的兩部分，南北各有五個中心。這個教區的最大特色是天主教很容易與本地文化相融；傳教士都像潘達拉師父（pandaraswamis）一樣，講純正的泰米爾語。他們避免與海岸的葡萄牙人（所謂的 paranghis）接觸。貝斯奇抵達馬度雷傳教區後，該地的傳教士數目增加為十人，包括葡萄牙人、義大利人和一個法國人。

那時，蘭納德（Ramnad）的老國王勒瓦（Ranganatha Thevar）

剛去世，他就是使布理道殉教的始作俑者。他享年八十，有四十七個妻子。根據「薩蒂」（Sati）習俗，活著的要與丈夫的遺體同時火化。

沙吉（Shaji）亦於翌年（1711年）去世。他在世時迫害基督徒，有「譚亞伏（Thanjavur）的尼祿」之稱。傳教士們在河的左岸蓋了一座小小的教堂，地點正好在他王國邊界的外邊。除了雨季，渡河不是難事。小教堂滿足了住在右岸的基督徒的需要，右岸是譚亞伏的領土。情況就像布理道生前一般。

迫害總是會突然來到，像當年一樣；一件無足輕重的事，當權者的一個怪念頭，就會把傳教士逼得走投無路。

1711年5月8日晚上

就在晚上時分吧！貝斯奇脫下黑色教士長袍，換上潘達拉師父穿的外衣，佩戴上他們的標誌，然後從圖地可倫（Tuticorin）步行前往卡曼納亞肯帕提（Kamanayakanpatti），開始傳教工作。他在11月4日寫信給總會長坦布瑞尼神父說：「天主知道我在這裡有多快樂。我很適應這裡的生活，雖然它與歐洲的生活方式很不一樣。在這裡的六個月，我的健康狀況都很好。」

在頭六年，這位新鮮人在高娃里河的南北兩岸來回跑，他的泰米爾語及文學修養顯示驚人的快速進步。

有一次，他在威提斯瓦蘭可威（Vaithiswarancovil）村作短暫停留，該村村民都崇拜印度教女神。他看到廟前聚集了一大羣人，便向人打聽該寺廟供奉的是什麼樣的神祇。

有人告訴他：「我們拜的是藥神（Vinaythirtan），一個能治百病的神醫。瞎眼的、跛腳的、駝背的……總之，所有來求他的病人都會被治好。」

他們還告訴他：藥神或稱菲魯郎（Vellooran），用一隻腳跳舞；恆河則是從他的連襟維錫奴（Vishnu）的雙腳流出；他的兒子格尼需（Ganesh）就是象神。貝斯奇聽了，就當場嘲諷了一番：「這位菲魯郎自己有痛風，他的連襟則有糖尿病，兒子嘛，又有個大肚臍；他既治不好自己，也治不好別人，他到底曾經治好過誰啊？」

與殉教擦身而過

傳教進展時而令人滿意，時而面臨迫害的危險。迫害終於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刻發生。事情發生在 1714 年 12 月，貝斯奇在古魯蓋帕提（Gurukelpatti）傳教的時候。引起事件發生的因素有多個：鎮裡有兩個重要人物皈依了，大家擔心如果全邦的人都信奉了天主教，印度的廟宇便會荒廢下來；出身卑微的盧根納坦（Loganathan）晉升為該邦總督，他企圖阻止天主教在印度發展；正當此時，有一個惡劣的賤民，一度是基督徒卻變了節成為托鉢僧，繼又成為虔誠的印度教徒，再假裝悔改回頭，想要恢復基督徒身分，但貝斯奇不受騙，於是他老羞成怒，向駐守該地部隊的將軍誣告貝斯奇在教堂藏有許多黃金，以報復貝斯奇。

12 月 21 日星期五，貝斯奇被捕。兵士們在教堂裡搜尋所謂的黃金，找到一袋閃閃發亮的勳章，以為就是所謂的黃金。將軍審訊了貝斯奇，判他死刑。

他們請來一個金匠鑑別這些勳章，金匠宣布那些東西不是黃金製成，而是一些銅製品。將軍馬上把東西歸還貝斯奇，並釋放了他。

但盧根納坦的做法就很不一樣。他帶了手下到教堂和貝斯奇的住所，大肆破壞；然後請來一位公證人，當面下令禁止重建這

些房屋，且不准任何傳教士再踏進該鎮一步，違者將受到嚴重的處分。不過，沒有一個基督徒在此情況下背教。

1715 年 1 月 12 日，貝斯奇寫信給總會長坦布瑞尼神父說：「在使徒聖多默瞻禮那天，也就是去年的 12 月 21 日，我被關進牢裡並被審判，但為了基督的名我當受這些苦。他們已經判了我死刑，斷頭臺已經架起來了，我是多麼高興我即將接受殉道的冠冕，我從不曾這樣快活過。可是，天呀！我要含淚告訴您，我的罪讓我不配得到這樣大的歡樂。」

接著是印度內戰，社會不安逼使貝斯奇停止傳教活動。他就利用這段時間研究泰米爾複雜的詩歌，這些詩歌讓愛詩的人著迷不已。

傳教士兼作家

這是他整個傳教生活的寫照：到鄉下拜訪；照顧信徒的靈修（帶領他們做神操，他很成功地把神操介紹給信徒）；用泰米爾文寫作，而且花在這上面的時間愈來愈多。這種模式的生活在戰爭與和平、迫害與興盛的交替中進行。

貝斯奇常常在傳教時講述他作品中的人物及主題。為了要跟專克巴（Tranquebar）的荷蘭路德教派辯論，他寫了多本護教學；他很注重教理傳授，所以為傳道員寫了多本教科書；他對語文很有興趣，於是寫了文法書，又編了字典。他為傳道員建了一所泰米爾語文及文學學校，貝斯奇的著作占了索瑪弗高（Sommervogel）圖書館滿滿六長排書架。他最卓越的著作是《永不凋謝的花冠》（*Thembavani*），是第一本以泰米爾文寫成的史詩，內容描述大聖若瑟的一生，共三十六章，三千六百一十五節。

巴瑞（S. S. Bharai）這樣評論貝斯奇：「他多才多藝，天賦

極高又博學。他在泰米爾文學的不同領域，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他不似前輩諾比理要把泰米爾語梵文化。他應被稱為泰米爾散文之父，是泰米爾小說和辭典編纂的先驅。」

特質與限度

如果我們把貝斯奇的人格特色描繪出來，他的畫像就更完整了。了解他的性格後，我們會更接近他。

當戰火燃起，貝斯奇毫不遲疑地站出來，勇敢保衛自己。1733年時，至少有五個部隊在貝斯奇的教區所在地紮營，教區靠近提魯契拉帕里（Tiruchirapalli）。毫無紀律的軍人任意搶劫，一次，蒙兀兒人氣瘋了，因為他們的牛被搶走，於是決定要把村子摧毀。像平常一樣，貝斯奇出來會見這些人，他們就把他抓起來當人質。不過當他被帶到他們的營地時，他們的首領常達·沙西（Chanda Sahib）卻下令釋放他。貝斯奇請求士兵帶他去見沙西，好當面謝他。沙西當場擁抱了貝斯奇，並讓他坐在自己身旁，再三聲稱對貝斯奇被捕一事，事前一點也不知情。他們交談了好一會兒，從此二人成為好朋友。

如果不是因為這份誠摯的友誼，以及這位蒙兀兒將軍後來大力支持傳教工作等事實，我們大概會認為這是誇大其詞，只是一則傳說。五年後，1738年12月，沙西占領了提魯契拉帕里，成了該市的行政官。據說，貝斯奇只花了短短三個月的時間就學會印度斯坦語及波斯語，準備向他的第一批聽眾宣講。沙西對這位朋友的傑出才華佩服得五體投地，授與他「無瑕懺悔師」（Ismati Sannyasi）的頭銜，又送他一頂鑲有象牙的轎子，那是他祖父撒度拉可汗（Sadoolah Khan）的所有物。沙西又賞他四個鄉村的收入，供他使用；並派他官職，是一個高等職位，擁有騎馬隨扈三

十人。

在一份耶穌會涵蓋 1737 年的三年一次的正式報告裡，記載著貝斯奇生活奢華，喜歡與權貴來往，並批評他不合適當長上。

後來沙西失勢，似乎也決定了貝斯奇的命運。貝斯奇的長上一定以為他在提魯契拉帕里待不下去，便把他派到費希利海岸（Fihseri Coast）的圖地可倫（1742-1745），然後又派他到安巴拉卡特（Ambalakat）書院。貝斯奇在那裡度過餘年，於 1747 年 2 月 4 日去世。享年六十七。

5. 巴拉圭的巴洛克音樂：

多明哥·齊波禮

(Domenico Zipoli, 1688-1726)

音樂之國

米勒 (Fülop Miller) 在他的著作《耶穌會士的能力與祕密》(*The power and secrets of the Jesuits*) 一書中，稱「巴拉圭隔離村」(Paraguay Reductions) 為「音樂之國」。有那麼一點公開挖苦的味道，不過，他強調音樂對隔離村人民的生活及組織非常重要，卻是正確的。

本來為輔助教理講授，以及提升禮儀莊嚴的音樂，為何會變成這個小小共和國裡，三十個小村鎮的基本文化要素呢？

首先，這是瓜拉尼人 (Guarani) 的天性。他們的血液裡流動著音樂的因子：「他們就像鳥一樣，是天生的歌唱家」；「他們的歌聲如此美妙，讓人以為置身在天堂裡」；「他們好像是為音樂而活」；「任何樂器他們都能一學即會，而且彈奏技術如此靈巧，連大師都會驚嘆不已」。以下是流傳下來的證言，塞普 (Anton Sepp) 是一個了不起的音樂家，他說：「我這裡有一個十二歲的男孩，他可以像技巧純熟的專業人士般，輕鬆且完美地彈奏最難的吉他樂曲。」一個參觀者則說：「他們的歌聲高雅又充滿藝術氣氛，如果你不看演唱者，你會以為正置身歐洲最有名的大教堂裡。」

以上說明設立隔離村的耶穌會士，充分利用了瓜拉尼人的音樂天分。每個小鎮或「教區」都設有歌唱學校，裡面最少有四個

風琴手，以及幾個很棒的獨唱者。在亞培由（Yapeyú）聖雷易思（Santos Reyes）隔離村的音樂學校是「中央音樂學校」，有來自三十個村鎮的三千個學生。管風琴及其他樂器都是自製的，包括中提琴、小提琴、雙簧管、長笛、豎琴、吉他、魯特琴、喇叭、號角和鼓。塞普還曾告訴我們，兩個當地人，貝卡（Ignatius Paica）與桂利（Gabriel Quiri）成為偉大管風琴製作大師的故事。

還要更多的證明嗎？仔細看看千里達（Trinidad）隔離村建築物的柱頭裝飾，你就明白了。柱頭上天使手中的樂器，都是瓜拉尼人所熟悉的。

耶穌會士傳授的是巴洛克音樂，與歐洲的巴洛克建築、雕刻與繪畫同時傳過來，並自然地融合在一起。這是殖民主義者的過失嗎？是對本土文化的不當斷傷嗎？

今天我們可能會這樣想。不過，一個更正面的說法是：「雖然用外來的技巧教授音樂和製造樂器，但大部分音樂創作是當地音樂家及耶穌會士合作的成果。我們必須聲明，所有的演唱者和彈奏者都是印第安人，而且使用的樂器往往出自本土。所以，不論是新的或是舊的，是學來的或是吸收進來的，都應看作是教會普世性的表示，而不是把一種風格強迫置入另一種風格。」那洛特（Nawrot）表示。

兩個發現

1767 年，西班牙查理三世把耶穌會士從所有西班牙領地驅離，「音樂之國」從此沒落。雕像與樂器、禮服與樂譜，一切的一切都被掠奪一空，所有榮耀不再。

剩下的只有這令人驚嘆的輝煌文化成就的歷史記載，不過這些史冊都被塵封在檔案館裡，被世人遺忘；但正是這樣，它們幸

運地得以保存下來，當年那批推動音樂運動的耶穌會士的名字因而得以重見天日，如非格（Louis Verger）、貝爾托（Noël Berthod）和威索（Jean Vaisseau），威索是查理五世的宮廷樂師，隔離村成立後的第一代。緊接著是兩個偉大的人物：塞普與齊波禮。

塞普（1655-1733）曾經是維也納宮廷兒童合唱團的一員，是很有前途的音樂專才。他於 1674 年加入耶穌會，不過並沒有中斷音樂學習。1689 年他被派往巴拉圭隔離村，在乘船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時，攜帶了大批樂器，其中包括一具管風琴。

當塞普著手製作一座管風琴時，同伴都十分驚訝。因為打造琴管的錫不夠，只好用打磨過的木條代替大根的管。他也發明了雙弦豎琴，那可能就是巴拉圭豎琴的始祖。那時他是亞培由「中央音樂學校」的校長。

可惜的是，最有名氣的齊波禮卻被遺忘了。在某些百科全書裡有一些關於他的記載，可是既貧乏又失真。這種情況持續到 1941 年，才由烏拉圭樂理學家亞耶士塔蘭（Lauro Ayestarán）把他從歷史裡解救出來，只是後人仍然沒有福氣認識齊波禮在美洲的作品。亞耶士塔蘭承認：「很不幸，我們找不到這方面的東西。」

不過，很幸運的，德國建築師兼修復專家羅斯（Hans Roth）於 1972 年在玻利維亞的奇基托斯（Chiquitos）隔離村發現超過一萬件的手稿，那裡的檔案沒有被掠奪，這個發現大大豐富我們的收藏。1986 年 5 月 25 日，在千里達隔離村的廢墟上，再次響起齊波禮的樂章。

前羅馬音樂家

齊波禮於 1688 年 10 月 16 日下午七點，生於托斯卡尼公國（Duchy of Toscana）的柏拉圖（Prato），它距離佛羅倫斯約十七公里。1700 年前後，有名的音樂大師如韋瓦第（Vivaldi, 1678-1741）、柯瑞里（Corelli, 1653-1713）、史卡拉第（Alessandro Scarlatti, 1660-1725）和巴桂尼（Pasquini, 1637-1719）才初露頭角。齊波禮當時從佛羅倫斯大教堂合唱團指揮那裡開始他的音樂課程。大公爵後來把他送到那不勒斯跟史卡拉第學習，不過根據當時一本傳記的記載，齊波禮跟那位音樂大師發生爭執，憤而離開：「因嚴重意見分歧而離開史卡拉第。」他跑到波隆納，師從凡諾奇（Vanucci）。凡諾奇是〈歌唱·創作·忘我〉（to sing, compose and transport）的作者，該論文當時很受歡迎。齊波禮後來（大概是 1710 年）遷到羅馬去，在巴桂尼門下完成音樂訓練。

巴桂尼對齊波禮的風格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這個影響清楚地反映在他初期的作品上。雖然他的大部分作品已失傳，不過仍有一部兩冊的《奏鳴曲》（*Sonate d'involatura per organo e cimbalo*）流傳下來，1716 年在羅馬出版。他也寫了一篇有關〈彈奏管風琴與大鍵琴的原則與概念〉的論文，可惜沒有出版。

他大概在羅馬四年。有一陣子他被指派為耶穌堂合唱團指揮和羅馬學院的音樂導師。與他同期的貝拉瑪斯（José Manuel Peramás）稱他為「前羅馬音樂家」；以他在羅馬的經驗，堪當此頭銜。

當他的前途在基督宗教中心羅馬一片光明時，當巴洛克風潮到達巔峰、而他又獨領風騷時，他卻讓自己去追逐巴拉圭隔離村的夢。

齊波禮修士

巴拉圭會省代表希梅尼茲（Jiménez）神父，於 1710 年來羅馬，並利用這次拜訪機會，徵召一些志願者到巴拉圭服務，他找到十三人。1716 年 12 月，一行人在塞維爾等船。在五十三名等待前往阿根廷拉巴拉他河（Rio de la Plata）的乘客名單中，第二十六名登記著：「多明哥·齊波禮修士，哲學家；來自佛羅倫斯教區柏拉圖市；二十八歲。」

根據耶穌會 1720 年的登記簿記載，齊波禮是在 1716 年 7 月 1 日於塞維爾進入耶穌會的，正好是他啟航到南美之前九個月。

貝拉瑪斯告訴我們：在那九個月裡，「齊波禮在塞維爾大教堂彈奏管風琴，聲名大噪」；又有消息說：「有人要請他當合唱團指揮。」只是齊波禮才在羅馬放棄了同樣的職位，現在又怎會接受這個邀請呢！

這五十四個耶穌會士在 1717 年 4 月啟航，7 月抵達拉巴拉他河口。橫渡大西洋的經驗是美妙的，除了曾遇到暴風雨，三艘船在巨浪中被拋來拋去，船桅斷了，船帆破裂了，五個水手被捲到海浪中。

齊波禮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逗留十五天後，便前往哥多巴（Córdoba）：當時巴拉圭會省及傳教區的中心，大學及書院的所在地。他要在那裡完成學業：三年哲學，四年神學。他晉鐸的日期應該在 1724 年，只是沒有紀錄可尋。也許他根本沒有被祝聖為神父，因為主教不在，也可能是沒有主教。

我們所知的是他展露了極大的音樂才華。他成了學院合唱團指揮，要做三個工作：作曲、指揮和彈奏風琴。在他停留在哥多巴期間，耶穌會教堂有一段非常光輝的日子。貝拉瑪斯在齊波禮

死後數年來到哥多巴，仍然聽到民眾談論他。瞻禮日的禮儀是非常莊嚴肅穆的，尤其是依納爵瞻禮。晚禱會延續整個晚上，而且大家都覺得「很愉快。沒有人會認為自己比齊波禮更出色，也沒有人會認為自己比齊波禮——這位前羅馬音樂家——成就更大。他的音樂完美和諧，既甜美又細緻，沒有任何樂章可以超越。」

他的名聲直達利馬，利馬總督要求為他寫樂曲。周圍的隔離村，特別是亞培由隔離村也想得到這些作品。齊波禮死後多年，這些作品仍為大眾所使用。1728年3月20日，瑞羅神父（Lorenzo Rillo）在結束訪視伊達普安（Itapúa）隔離村時，下了一道命令：「讓在哥多巴接受教育的印第安人荷西（José）來管風琴的事吧！讓他來教年輕人。如果他沒有齊波禮修士的樂譜，就派人到亞培由製作新的抄本吧！」

1732年2月20日，賀蘭神父（Jerónimo Herrán）指示聖地牙哥隔離村的教士：「這些樂曲應該改善。曲中缺乏歌唱，尤其缺乏女高音；也沒有使用好的演奏樂器。他們要用心學習並練習齊波禮修士的樂曲，那是最好的音樂。」

1725年12月中旬，耶穌會學生像往常一樣在離哥多巴市約五十公里的聖卡塔麗娜（Santa Catalina）農場度假，學生可以在那裡騎馬或游泳。1726年1月2日，齊波禮逝世時，學生們仍在農場享受他們的假期。

貝拉瑪斯在《放逐日記：忍耐的年代》（*Diary of the expulsion or Annus patiens*）中這樣寫著：「英年早逝，莫能多言。」他又加上一句，就像在齊波禮墳前獻上一束鮮花：「凡聽過齊波禮作品一次的人，大概不會再喜歡其他人的音樂了。」

6. 開路先鋒 密西西比河的探險家：馬奎特 (Jacques Marquette, 1637-1675)

流傳在新法蘭西（New France）有關法國耶穌會士的英雄傳說，並不因卜瑞伯（John de Brébeuf, 1593-1649）及他同伴的殉道而沉寂，這些人的榜樣激起大眾的熱情，並吸引數不清的跟隨者。當時的法國年輕人因而找到生命的意義。

馬奎特可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像大多數人一樣，他是自願到傳教區去。他的意願如此明確，總會長歐里瓦神父建議法國會省派他到新法蘭西去。兩年後，總會長接到傳教區長上墨西埃（François Le Mercier）的報告，他寫著：

「我們派馬奎特神父到阿盧埃（Claude Allouez）神父那邊。阿盧埃神父主管渥太華傳教區，那邊的土人野蠻頑固，傳教工作極難推展。馬奎特神父很能約束阿爾岡昆人（Algonquin）。他健康強壯，品格優異、德行無瑕。因為他行事和善，土著都很能接受他。」

歐里瓦神父當時力薦馬奎特，實在做得很對。

最初經驗

馬奎特於 1666 年 9 月 20 日抵達魁北克。數天後即到三河地區（Trois-Rivières）學習阿爾岡昆語。歐圖瓦斯（Ojibwa）傳教士阿盧埃神父於翌年 9 月經過那邊，與大家分享他在歐圖瓦斯的傳教工作，大家都被他弄得熱血沸騰。鄰近的印第安人絡繹不絕，提到更南方的許多部落，如伊利諾，還有一條他們稱為密西

比（Mississippi）的大河。

馬奎特在 1668 年 4 月 21 日接到指派令，接著阿盧埃神父把他介紹給一批歐圖瓦斯來的印第安人，他們帶了皮毛來換取歐洲物品。這些人仔細打量這位身穿黑袍的人物後，便喜歡上他；因為馬奎特能說流利的阿爾岡昆語，強壯又友善。他這樣對他們說：「能認識你們，太陽好像都變亮了。」

上溯渥太華河前往蘇聖瑪利（Sault-Sainte-Marie）的二千四百公里的危險旅程，給馬奎特展現魅力及證明他的精力一個大好機會。

阿盧埃在蘇必略湖南岸的聖神市（Saint-Esprit）建立了另一個中心，該地離西方更遠，卻離其他印第安部族較近，這些部族看來都是傳福音的好對象。在蘇聖瑪利年餘，馬奎特顯得更成熟、更富經驗、更自信了。

他於 1669 年 8 月中旬離開蘇聖瑪利。經過八百公里渡湖溯河的艱困旅程，終於 9 月 13 日抵達目的地聖神市。那裡當時已經是冬天了。

他的新本堂區住的是歐圖瓦斯人，包括三個族羣：辛那高（Sinagaux），凱諾契（Keinouché），和基斯嘎貢（Kiskakon）。辛那高是最難搞定的一族；凱諾契人好一點，不過他們說，接受基督信仰的時間還未到；只有基斯嘎貢人表示有意願。於是，馬奎特把全部時間都放在他們的身上。他選擇住在一個窮苦人家裡，與他們的狗、他們的孩子作伴。他們的親戚不分晝夜，川流不息地來到這戶人家中，聽神父講道。

計畫與耽延

歐圖瓦斯人提及的南部其他部落和那條大河，仍時刻縈繞馬

奎特心頭。那時，一個基斯嘎貢戰士病倒了，馬奎特像母親一樣照顧他，戰士後來把一個從伊利諾買來的年輕奴隸送給他。馬奎特的長上曾告訴他，要他翌年（1670）秋天在伊利諾開闢一個新傳教區，所以他竭盡所能從那男孩身上採取情報，還學習他的語言。

實際上，馬奎特在 1670 年夏天回到蘇聖瑪利，準備日後的遠征。安德利神父（Louis André）繼承他在聖神市的職位。

但是困難來了。歐圖瓦斯人恃著法國人的保護，魯莽地向蘇族人（Sioux）挑釁。神父們竭力勸阻，因為戰爭會帶來悲慘的後果，其中一個後果可能是他們將被迫遷移到一個比較安全卻更偏僻的地方。

一切正如所料。蘇族人如果不是受到外來侵略，是不會先攻擊別人的，這一點和伊洛郭亦人（Iroquois）很不一樣。不過，如果別人侵略他們，他們會強力反擊。歐圖瓦斯人輕率地向蘇族人發動攻擊，現在可嚇壞了，他們只好到蘇聖瑪利尋求庇護，那裡正歸馬奎特管。

神父們預料這樣的事情早晚會發生，已找妥一塊地，就是連接休倫湖（Lake Huron）與密西根湖（Michigan）的峽地。歐圖瓦斯人在不甘不願的情形下，於 1671 年 4 月遷到那裡。新教區定名為聖依納爵（Saint-Ignace），該鎮到現在仍沿用此名。馬奎特仍然是他們的牧者，分擔他們的疑慮，在信仰上引導他們。在聖神市表現頑強的辛那高人，也漸漸軟化，想要成為基督徒。

終於到達南方

1672 年 12 月 8 日下午，一隻輕便的獨木舟碇泊在聖依納爵傳教區岸邊，祖依（Louis Jolliet）從舟上走下來。他資助探險隊

前往密西西比探險，並將親自帶隊。他捎來了傳教區長上達布隆（Claude Dablon）的信，信中指派馬奎特隨探險隊同行。

馬奎特除了是他們的隨隊神師外，更是他們的領隊；祖依也事事與馬奎特商量，公開把他當作領隊。1673年5月17日星期三，一切準備妥當，祖依、馬奎特和另外五人從聖依納爵出發。他們分乘兩艘不甚堅固的、單薄的獨木舟，繞過告羅士喀（Gros-cap），進入密西根湖，然後沿著湖岸，進入綠灣（Green Bay），向著聖薩威（Saint-François-Xavier）傳教區前進。抵達那裡時，已經是5月27日。

他們於6月7日到達法國拓荒者所知道的最遠地點，被稱為「馬斯古頓（Mascouten）大村」的地方。村民知道一條通往某河的路，而他們相信這河是流入密西西比河的。祖依以提供禮物為條件，徵求兩個人領探險隊到那裡去，他們「很禮貌地同意了」。休息三天後，於6月10日星期六那天，探險隊又開始他們的旅程。全村的人都出來歡送，並祝他們一路平安，另方面也為他們膽敢進行如此危險的探險感到驚異不已。離開了村落，就表示他們跟熟知的人和地斷了最後的聯繫。馬奎特寫道：「我們即將離開流向魁北克的水道，向著帶領我們往陌生土地的水道航去。」

很幸運地，他們很快便進入威斯康辛河，繼續順流而下走了一星期，約一百一十八哩的路，於1673年6月17日，「在緯度四十二度半的地方，我們平安進入密西西比河。我實在無法形容我們的興奮。」馬奎特指出。

大河

密西西比是歐吉布瓦族（Ojibwa）印第安人給大河的名字，*Mis* 是大，*Sipi* 是河。威斯康辛河口的對面，只見山巒起伏，但

是河的左岸則是一片開闊的、令人心曠神怡的大草原，向南望去，更是一望無際。旅人們在靜靜的河上划槳前進，默默觀賞岸上的野鹿與牛羣，還有一羣羣的野鴨，然後是火雞，就是不見半個人影。河裡的魚非常多，一條花身雞魚猛撞馬奎特乘坐的獨木舟，牠用力之猛，讓馬奎特以為這單薄的工藝品撞到大樹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動物要數水牛羣了，有一羣足足有四百多隻，是經他們仔細算過的。馬奎特是目睹這種龐大、笨拙而又喧鬧的動物的第一個歐洲人。

沿著河往下划三百哩，仍不見人跡，這讓他們忐忑不安，更提高警戒。離開威斯康辛河口八天後，他們注意到在河的右岸有人類的腳印，一條小徑直通草原。

他們應當靜靜地繼續前行，以免被人發現；還是與當地人接觸，冒著可能被他們隨手殺了的危險？

馬奎特總是以傳教為首要，有機會以生命賺得這些陌生人的救贖他最歡喜。祖依也不是怕死的人，何況要使這個河谷成為法國人的屬地，要緊的第一步當然是與當地的印第安人公開接觸。

在同伴們的戒備下，兩人離開了獨木舟，踏上通往村莊的小路。他們走了約六哩的路程，聽到有人交談的聲音，便停住腳步，大聲呼喊以引起對方的注意。

土著們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和平的菸斗

一聽到呼喊聲，全村的人都從他們的小屋衝出來，卻看到兩個陌生人，雙方遲疑著、靜待著，互相打量著。印第安人終於率先採取行動，四個長者莊嚴地走向訪客，其中兩個帶著菸斗——經過精心雕刻、普世認同象徵和平與友誼的菸斗。

馬奎特用伊利諾語請問他們是哪裡人，他們答說是伊利諾人，並請馬奎特及祖依抽菸斗。馬、祖二人抽了菸，表示法國人是帶著和平來的。然後土著們護送他們進到村子裡去。在那裡，馬奎特發表了談話，雙方交換了禮物。跟著就是訪問的高峰，主人設了盛宴，他們把尊貴的客人當作孩童，用湯匙把蒸玉米及烤魚餵到客人口裡。

六月底，探險隊又開始他們的旅程。穿過另一個杳無人煙的區域，他們通過伊利諾河、密蘇里河以及俄亥俄河等河口。時序進入盛夏，他們沿密西西比河順流而下，途中遇到一些印第安人，告訴他們離大海大概只有十天的航程了。法國探險家馬上相信了他們的話，因為他們已經看到亞熱帶植物，揮之不去的擾人蚊蟲也說明了這個事實。

他們通過一片很可能成為法國的一部分的土地，聽到樹林後有牛羣的鳴叫聲。不過，怡人的田園景象突然變色，當他們偵察一個村落時，帶著敵意的印第安人圍著他們打轉。在河上，多艘載著勇士的堅固小帆船，把法國人的獨木舟團團圍住；在岸上，戰士們來來回回走著示威。馬奎特從獨木舟上站起來，把菸斗高高舉起；在此同時，一個年輕的勇士向他丟了一根戰鬥用棍棒，差一點打中他。當獨木舟逐漸靠近岸邊，長老們能夠辨認出這根菸斗時，其中兩個便靠近他們，並把武器放進法國人的獨木舟裡，表示願意和平共處的誠意。

法國人上了岸。馬奎特嘗試用他所知的六種印第安語言與對方溝通，但顯然無效。最後，他們帶來一個老人，他懂得一點點伊利諾語，雙方才算講通了。當地人告訴他們，往下約二十四到三十哩的地方，是一個叫阿肯西亞（Arkamsea）的大村落，他們可以在那裡獲得可靠的資訊。印第安人曾到過那邊，離大海真的

也不過是十天的航程。不過，他們並沒有跟住在下游的人接觸，因為對方阻止他們與歐洲人做生意，是他們的敵人。

馬奎特和祖依必須決定在這種情勢下該何去何從。他們發現密西西比河既不在維吉尼亞附近流入大西洋，也沒有流入中國海，而是流入墨西哥灣，到墨西哥灣大概有兩、三天的航程。他們如果繼續南下，就有落入西班牙人手中的危險。那樣做太輕率了，於是他們決定回航。

1673 年 7 月 17 日星期一，在距離當初出發地點兩千七百公里的地方，他們將獨木舟掉頭北上。

喜樂與困難

回程時他們溯伊利諾河而上，因為馬奎特希望與未來教區的人們接觸。他們來到伊利諾一個叫做卡司卡西亞（Kaskaskia）的村莊，當地居民親切地接待他們，並要馬奎特答應再回來指導他們。該傳教區將被稱為「聖母無原罪」，這是當初馬奎特得知要陪伴祖依去探險時，對聖母的許諾。

年輕的戰士護送著訪客來到密西根湖。離開卡司卡西亞的得力嚮導後，馬奎特與同伴們沿著密西根湖西岸往北走，最後到達鱒魚灣（Sturgeon Bay）。是年 9 月底，他們回到聖薩威傳教區，「我們是在六月初從這裡出發的。」

馬奎特沒有回到聖依納爵；他留在聖薩威向住在附近的印第安人傳教。閒暇時，他就把那歷史性的旅程紀錄下來，還畫了地圖。這些地圖到現在還保存著。

春天的腳步近了，他該出發到新的教區去了，可是他病倒了。身體忽冷忽熱，令他痛苦不堪，會是得了瘧疾嗎？消息傳到住在蘇聖瑪利的傳教區長上那裡，他指示馬奎特延後出發，一切

等病痊癒、恢復健康強壯的身體後再說。

1674 年夏天對馬奎特來說，真是受盡煎熬。綠灣的冰溶化了，本來可以快快活活地在水上泛舟的，但如今他只能在聖薩威躺著，發著高燒，不能進食，還受盡腹瀉的折磨，會是痢疾嗎？到了 9 月，他的體力終於恢復了。1674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四，他們進入下福斯河（Fox River），前往伊利諾大村落。陪同前行的是兩位在俗自願者：拉吉利（Jacques Largillir），他原是密西西比探險隊一員，另一位是波特烈（Pierre Porteret）。

不可能的任務

冬天的刺骨寒風颳個不停，令人寸步難行。當他們到達密西根湖南端（今日的芝加哥）時，更是被迫停止前進。由於在旅途上費盡了力氣，他們打算在當地停留八天，等元氣恢復後再上路。儘管已經休息了一個星期，馬奎特的身體狀況還是不容許他完成最後六十哩的路程，到目的地伊利諾村去。12 月 14 日那天，他們的隊伍決定留在原地過冬。

馬奎特處境堪憐，身體忽冷忽熱加上教人難為情的腹瀉，有時甚至拉血水；但他仍利用時間來祈禱、做退省、接待訪客和寫作。

1675 年 2 月初，他的健康漸有起色；到了 3 月 30 日，冬天不再掌管大地，馬奎特和他的兩位助手便動身前往伊利諾村。他們划入流動緩慢而曲折的底斯普蘭河（Des Plaines River），十一日後，於 1675 年 4 月 10 日，聖週的星期三，終於抵達目的地，受到村民熱烈的歡迎。

馬奎特開始逐戶拜訪，卻發現此法行不通，因為他每到一處，都會有一大羣人圍攏過來。他只得改變方式：把大家聚集到

離村子不遠處的一片草原上，這樣大家都很高興。他嫻熟他們的母語，又有九年與印第安人接觸的經驗，使得他成為原住民宣講大師。他選擇以肉眼可見的「現在」，向他的淳樸聽眾準確地傳達他希望傳達的抽象觀念。向全體聽眾致意後，他開始向他們解釋天主教的中心奧秘；他把這些奧蹟總結為十項，然後給他們舉許多實例。結束精采的宣講後，便舉行聖週四的感恩祭。

受難日及聖週六，他繼續向羣眾宣講。復活主日的清晨，他奉獻了他所謂的最後感恩祭。當波特烈和拉吉利收拾行李並把行李放在那艘破爛的獨木舟時，馬奎特則參加了伊利諾酋長們的最後聚會。他告訴他們，他必須到密其里麥克依諾（Michilimackinac）參加一個重要的會議，不過，他答應他們他會回來，不然也會派別人替代他。

全村的人陪著他走到河岸邊，有一羣人更划著船跟著他的獨木舟走了一百二十哩後，才依依不捨地離開。

一如上川島上的薩威

馬奎特的健康愈來愈糟糕。鑒於在旅途中不可能給他必須的照護，兩位同伴認為只有盡快趕回聖依納爵才是上策。他們決定走最近的路回去，就是沿密西根湖的東岸走。

雖然他們拚命地划，但前面還有一半的路。馬奎特的情況每個小時都在變壞。這個一度非常強壯的人，現在一動也不能動，像嬰兒般任人擺布。他有預感——不，這是事實——他的死期近了。天主賞賜他經常祈求的恩寵：讓他在傳教途中回到父家，而且得不到任何人的幫助。

1675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五，馬奎特死亡前夕，他興高采烈地告訴同伴說，他明天就要死了。在去世前三個小時，他交代同伴

如何埋葬他；要如何安放他的手、腳和臉；要在他的墳上豎立一個十字架；當他入土時，要搖響他彌撒裝備中那個小小的手搖鈴。

風在吹著。馬奎特的同伴為他用樹皮搭了一個簡陋的遮棚，把他放在地上，四肢張開，像薩威死時那樣，這是他一直期盼的。同伴們都悲不自勝，他反而安慰並感謝他們。他請他們去休息一下，因為他的時候還未到；他說那一刻到來時，他會呼喚他們。事實上，過了兩、三個小時後，他真的呼喚他們了。

他們跑近他。馬奎特擁抱了他們，他們哭倒在他腳邊。他請他們在他面前舉著十字架；他發了信德誓詞，感謝天主讓他能以耶穌會士、傳教士的身分死去，而且如他一直祈求的，死在杳無人煙的叢林裡，得不到任何幫助。

他不停呼喚耶穌與瑪利亞的聖名，並多次有意識地抬起他的眼睛，望著十字架的上方，好像有顯現似的。他終於在5月18日星期六，十一點到午夜時分，帶著發光的面容，安然去世。當時他只有三十八歲。

馬奎特，生前寂寂無聞，今天的美國人則尊他為國家英雄。在國會大廈、村鎮、大學及書院裡，都豎立著他的雕像。

加利福尼亞三傑： 吉諾／薩爾瓦弟／猶格德

(Eusebio Francisco Kino, 1645-1711) / (Juan Maria Salvatierra, 1648-1717) / (Juan Ugarte, 1662-1730)

吉諾、薩爾瓦弟和猶格德都是聰明、活力充沛、堅持團隊合作的人。

吉諾來自義大利提洛爾 (Tyrol)，講德語，原名肯恩 (Kühn)，義大利文為欽諾 (Chino)；薩爾瓦弟來自米蘭，父親是西班牙南部安德露西亞人 (Andalusian)，母親是義大利人；猶格德則來自宏都拉斯的德古斯加巴 (Tegucigalpa)。兩位義大利人都是多產作家，而那有著巴斯克人姓氏的猶格德，則沒有給後人留下任何文字。

皇家繪圖師

吉諾先後在茵格斯達 (Ingolstadt) 及弗萊堡 (Freiburg) 大學攻讀數學，學有專精，本來可以在科學界大大出名，但是他寧願把製圖技術與傳教工作結合起來。

1681 年吉諾抵達墨西哥，海軍上將阿東都 (Isidro Atondo) 正準備到加利福尼亞探險，那是一塊仍待征服的土地。他命吉諾為皇家繪圖師，授權吉諾可以閱覽一切官方地圖，研究將前往探險地區的地理。1683 年 4 月 1 日，探險隊在一個他們稱為拉巴斯 (La Paz) 的港灣停泊，此地名至今仍沿用著。不過，那裡的土地貧瘠，居民既粗暴又充滿敵意；兩年後，探險隊無功而返。

吉諾沒有浪費這兩年的時間。除了詳細觀察，並把觀察所得

記錄在他的地圖上以外，他還善意地與土著交朋友，送他們禮物。他收集了近五百個當地的字彙，十年後證明對他們很有幫助。

那時，到加利福尼亞福傳的念頭算是打消了。吉諾被派到比摩利亞（Pimería Alta），那是包括墨西哥索娜拉（Sonora）北部，及今天美國亞利桑那州（Arizona）南部的一大片土地。

加利福尼亞之旅讓吉諾學會不要被官僚所牽制，要獨自行動。他於是帶著官方批准「跟隨他的印第安人不必為西班牙殖民者服務」的特許，朝北行進三個月，到達離土孫（Tucson）兩百三十公里一個名叫古古貝（Cucurpe）的市鎮——古古貝的意思是「鴿子唱歌的地方」。他在古古貝北邊二十四公里的可蘇里（Cosari），成立了一個教區，取名為「憂苦之慰」傳教區。

可蘇里風景美麗，位置又適中，這個傳教區成了吉諾以後二十五年運籌帷幄的中心。在前十二年（1687-1698），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比摩利亞；以後的十三年（1698-1711），他移師北上。

傳教及教化

吉諾在可蘇里的第一段時期，全力投在傳教及教化工作上。他是傳教士、牧場工人、開墾者、建築工人。有人說：「有了吉諾，沙漠也會開花。」

他聰明、觀察敏銳、也是天生的外交家。他先向酋長科西（Coxi）表示敬意，因此贏得科西對福傳工作的支持。才一個月就有三十人領洗入教，其中兩個是酋長的兒子；兩年後，有六百人領洗。他在 1689 年 6 月 15 日這樣記載著：「愈來愈多的原住民要求領受洗禮。」

憂苦之慰傳教區逐漸發展成為模範中心。印第安人自己建了一座教堂，安裝多個能發出洪亮聲音的鐘，印第安人喜愛鐘聲；

他們蓋了個牧場，畜養牛、馬、綿羊、山羊和豬；他們也開墾土地，除了種植麥子和玉米外，還種各種果樹；還有打鐵鋪、木工店、磨坊。總而言之，一切務求自給自足，包括「所有家庭用品，以及開闢新傳教區的必需品」。

另有一小隊全是印第安人的軍隊協助他，他們負責行政、訓練，甚至司法。

傳教區又派來生力軍，一個串連二十二個傳教區的廣大網絡也建立起來了。

吉諾也不是沒有招致非議，尤其一些西班牙籍神父常批評他，說他是德國人，西班牙話說得不好；說他沒有為新教友作正確的準備，也沒有教導印第安人尊敬西班牙國王等等。

障礙重重

麻煩還不止於此。1690 年時，一些敵視天主教的部落攻擊葉普美勒（Yepomera）傳教區，兩個神父被殺。這次攻擊事件被認為是比馬斯（Pimas）人幹的，而吉諾正在跟比馬斯人合作。這個指控發生效力，給吉諾的補給中斷了。

薩爾瓦弟神父助了他一臂之力。薩爾瓦弟神父是傳教區巡察。1690 年及 1691 年間，他在比馬斯訪問，親眼目睹比馬斯及其他部落的進步。他和吉諾兩人一見如故，很可能從那時開始，兩人就為這個幅員遼闊的傳教區的未來，有了一致的藍圖。

吉諾的苦難並沒有因此過去。西班牙軍隊的隊長們認為比馬斯印第安人是懷著敵意襲擊葉普美勒，要比馬斯人為付出代價，西班牙政府方面傾向關閉傳教區，比馬斯人也被惹火了，不公平的懲罰更令人生氣。吉諾急忙趕到墨西哥解釋，他深信總督會了解他是對的。

創意領袖

就在 1696 年，這三傑：吉諾、薩爾瓦弟和猶格德第一次碰面了。薩爾瓦弟在比摩利亞傳教區巡察（1690-1691）、瓜達拉哈拉（Guadalajara）學院院長（1693-1696）及初學導師（1696）的職務任期滿了後，終於如願獲派到加利福尼亞傳教區。他們商談的主題是如何使這個新傳教區成長茁壯。

其中有一個看似無法突破的根本困難。加利福尼亞傳教區具有官方特性，是公開以西班牙國王名義占領該地，並設有護衛隊的，這裡的一切開銷由國家負擔。可是分離戰爭（War of Secession）導致國庫空虛，政府於 1696 年 6 月 18 日頒布了一個命令：沒有經過馬德里政府的正式允許，任何人不得從國庫裡領取任何款項。

薩爾瓦弟想出一個頗為新穎的辦法：由耶穌會支付傳教區的一般費用，國庫只須負擔護衛隊薪水，不過，傳教士可以管轄軍隊，有任命及解除隊長的權力。這真是一個革命性的想法。

總督接受了這個建議。吉諾回到他的傳教區比摩利亞，猶格德仍留在墨西哥募款，薩爾瓦弟則動身往加利福尼亞南部。他在 1697 年 10 月 19 日來到一個當地人稱為康秋（Conchó）的地方。薩爾瓦弟後來為它改了一個富含基督教味道的名字，叫洛雷托（Loreto）。此名沿用至今。

原住民當時對他一點也不友善。不過，薩爾瓦弟設法讓對方了解他。這時多虧了吉諾十年前收集的五百詞彙，讓原住民漸趨冷靜，變得更易溝通。於是，等到另一位義大利神父畢科洛（Piccolo）抵達後，傳教工作隨即展開。

他們的工作困難重重，因為一切物資都得從美洲大陸運送過

來，費用實在驚人。他們有一隻小船。不過，他們想找出一條陸路。他們懷疑他們所在的地方是一個半島，而不是別人所說的海島。吉諾是這方面的探險專家，薩爾瓦弟便決定找他陪同前往，於是有了了一個歷史性的偉大發現。

1701 年 1 月他再次橫渡加利福尼亞海灣，向憂苦之慰傳教區前進。

探險家

吉諾在憂苦之慰傳教區二十四年（1687-1711），期間曾到內陸旅行五十多次，平均每年多於兩次。旅程遠近不一，從一百哩到將近一千哩都有；或步行或騎馬，而以騎馬居多。

這一次，兩人經歸托巴（Quitobac）穿過索娜拉沙漠，過聖塔卡拉拉（Santa Clara）和崔斯歐吉托斯（Tres Ojitos）到達加利福尼亞灣頭。

為了確認路程無誤，吉諾又走了兩次。第一次，他沿著科羅拉多河往下游走，然後乘船到對岸的加利福尼亞。第二次，他到達基拉（Gila）河與科羅拉多河交匯處，超過一千五百人前來看他，向他指證歷歷周圍沒有任何湖海了；他登上一座小山，用雙筒望遠鏡向四周遠眺，發現科羅拉多河注入加利福尼亞灣。

他構想著一個非常大膽的、對這片土地有決定性的、極具重要影響的計畫。他打算在科羅拉多河岸上建立一個城市，或者開闢墾殖區，把亞利桑那及加利福尼亞兩地連接起來。

可惜他沒法實現這個夢想。更糟的是，有人在 1710 年 2 月告訴他——消息來源不詳——杜蘭戈（Durango）主教和西班牙國王決定要壓制這裡的傳教區。

1711 年 3 月 15 日，馬格達雷那（Magdalena）有一座小聖堂

要舉行落成禮，小堂敬禮聖方濟·薩威。該地傳教士邀請吉諾共祭；吉諾在彌撒進行中突然昏倒，午夜過後便與世長辭。

波頓（Herbert Eugene Bolton）為吉諾的著作寫序時說：「吉諾是北美傳教士先驅中最為多采多姿的一位。他是探險家、天文學家、地圖繪製專家、牧場經營人、牧牛大王、邊境守護神。他的一生不光是不平凡，更在西半球拓荒史上大放光芒。」

在土孫，人們為他立了一座紀念碑，一個港灣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巨人

在此同時，南加利福尼亞傳教區正急切需要援助。一條偏遠的路不能解決問題，傳教區的財務狀況也十分糟糕。

巨人及時來了。墨西哥傳教區代表猶格德，決定親自上戰場。他於1701年3月23日到達，薩爾瓦弟跟著也回到傳教區，召集他的人共同研究當時的情勢。

物質是如此缺乏，傳教士和軍人過著野人般的生活。他們靠著嚴格配給的玉米、野果和從海邊撿來的貝類支撐著。薩爾瓦弟想要放棄這個傳教區，因為連生活的基本需要都滿足不了。

猶格德卻不同意，他為同伴們加油打氣；多少人曾為開闢這個傳教區而犧牲，所以他們不能半途而廢。

這個曾經是哲學教授的神父，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傳教士。除了做好牧職本分外，他引導印第安人從事一切有關建設與耕作的事。他興建水壩以利灌溉；挖洞種果樹；犁田播種。他移走了十八萬五千車的土，整出一塊農地。他是建築師、泥水工、木工、平易的工人。他總是第一個搬石頭、踩泥巴、拌沙、砍木、運送木頭、刨平木頭、挖土、把材料放在該放的地方。他揮汗如

雨，用斧頭砍伐雜木林、用鏟挖土、用棍碎石；他領牛羣到草原或水邊。他以身作則，教導印第安人做每一件工作。

晚上則是猶格德教育印第安人及傳授教理的時間；那是他最受罪的時刻，因為那些生長在叢林裡的土人會嘲笑作弄他。

有一段時間他跟一個印第安人很要好，那人比其他的人更敢嘲笑他。又強又壯的猶格德會抓住他的長髮，把他高舉到半空中，甩他個三、四回後，才把他放下來。

猶格德也會製造機會讓大家歡笑。例如故意用錯字啦、發錯音啦，都會讓大家樂上一陣子。大人們明顯地是為了好玩而捉弄他，他也樂得學小孩，裝出天真的模樣。

慢慢地，印第安人逐漸適應了規律的、勤奮的生活。至於那裡的土地，本來跟它上面的居民一樣，粗野又貧瘠，現在也開始長出橄欖、檸檬、柳橙、梨子、石榴、無花果、蘋果和番石榴等果樹，此外還有西瓜、棗椰、小麥、玉米、稻子、山藜豆、扁豆和蠶豆。他們更釀造了上等的酒送給恩人，或送到新西班牙的首府賣個好價錢。

造船人

猶格德也幫忙解決到海灣對岸的運輸及交通問題。

神父們買了兩條船：聖荷西（San José）號和聖佛明（San Fermín）號，不過他們被騙得很慘，因為兩條船在首航時都帶著整船貨物沉沒了。

猶格德想在原地造船，可是什麼都欠缺。沒有材料，也沒有技術。不過，對巨人來說，只要有加利福尼亞傳教區的支援，沒有事情是不可能的。

他聽說在傳教區北方九十公里的地方，有許多大樹。他便從

墨西哥帶了個造船師傅和幾個工匠來。他先跟師傅去看樹，樹找到了，可是離最近的河岸有六十七公里。造船師傅考察了地勢後，宣稱根本不可能把那些大樹運到河邊去；猶格德說他會負責這個工作。

他們回到傳教區。猶格德聚集了一大批印第安人、公牛和驢子，然後帶著三個工匠，大夥出發到發現大樹的樹林裡去。他們砍樹、刨平，又開了一條六十七公里的路通往岸邊，再把所有砍下來、刨平的木材運過去。前後總共花了四個月的時間。

船造好了，命名為「十字架的勝利」。這位傳教士、農夫、畜牧業者、泥水匠、內科醫生、開路者、外科醫生，又再證明自己同時也是造船人。

「沒有征服這回事」

亞伯科基（Alburquerque）公爵當時為新西班牙總督，一直到 1710 年。當他回到馬德里，有人向他問及傳教區種種，以及征服加利福尼亞的事。他的回答是：「沒有征服這回事。不過，由於耶穌會士的溫和攻勢，那裡的人逐漸『降服』了。」他跟著解釋說：「政治與軍事都操在耶穌會神父手裡。軍事管理與士兵的薪水都由他們經手，也在他們領導下。整地與耕種，其他一切與經濟或加利福尼亞印第安人發展扯上關係的大小事務，都歸神父們管。不是靠軍隊的力量，而是透過技巧讓他們臣服聽命。傳教士們的良善、審慎與溫和，是和平與信德能廣為傳播的關鍵。」

這是十字架與刀劍相輔相成的不可思議的個案。

後續發展

我們已經看到，並不一切都是完美的，特別是外來的困

難、原住民難以接受基督喜訊的特質，都增加福傳的難度。不過，薩爾瓦弟和同伴及後繼者絕不輕言放棄，那些看似充滿敵意的印第安人終於打開了心胸，信仰終於在他們中間生根、開花結果，就像猶格德種下的果樹一樣。

薩爾瓦弟後來被任命為墨西哥省會長。不過，只有兩年（1704-1706）的時間，之後他便設法辭掉這項職務，回到他心愛的傳教區去。1717 年新的總督銜命促進加利福尼亞傳教區的發展，他表示想跟開創人聊聊。又老又病的薩爾瓦弟神父於是出發前往。他沒有到達墨西哥，卻在半途，於 7 月 17 日那天，在瓜達拉哈拉逝世。

那時在南加利福尼亞傳教的耶穌會士有五十四人；1767 年被驅逐時，則有十七人。方濟會士於 7 月 14 日取代了他們，由偉大的賽拉（Junípero Serra, 1713-1784）領導。賽拉主管南加利福尼亞傳教區只有兩年（1768-1769）時間。

奧利諾科的探險家：
古米拉
(José Gumilla, 1686-1750)

第三十號

1705 年 3 月 12 日，塞維爾副市長加士伯（Don Gaspar de la Cueva y Davila）在查看剛送過來的名單，上面列了將要出發到新格瑞那達（New Granada）——今日的哥倫比亞——的耶穌會士的名字。總共四十三人。第三十號上寫著：「古米拉修士，哲學一年級，生於卡塞（Cárcer），奧爾威拉（Orihuela）教區，年十八，中等身材，麻臉，右眼邊上有一顆小黑痣。」

這位麻臉的學生就學期間一直沒沒無聞。在 1713 年的紀錄冊裡，有一段對他毫不客氣的描述：「能力，良；判斷力，良；謹慎程度，良；經驗，無；學習進度，良；表情，有節制；技能，迄今尚無。」

雖然，他「迄今」尚未展現他的才能，不過兩年後，當省會長米貝拉（Mateo Mimbela）神父要派一個耶穌會士去重振古老的奧利諾科（Orinoco）傳教區的時候，他毫不遲疑地選了古米拉。古米拉亦於 1714 年晉鐸，是出去見世面的時候了。

這是耶穌會士第三次企圖在大河邊建立傳教區。

以前的嘗試

橫跨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的蘭洛（Los Llanos and Casanare）傳教區，成立於 1625 年，屬於新格瑞那達王國會省，總部在波

哥大（Santa Fe de Bogota）。

1662 年來了一個落單的耶穌會士，很可能是個法蘭德斯人。他自稱蒙特威爾（Antonio Monteverde），可能是他的卡斯蒂利亞名字。當年他與一隊前往圭亞那的法國探險隊來到美洲，探險隊無功而返，他個人決定留下來加入西班牙耶穌會。他沿奧利諾科河上溯，經過一段驚險旅程後，到達蘭洛傳教區。

蒙特威爾於 1664 年成為蘭洛傳教區長上。根據以前溯河的經歷，他提出一個計畫。既然全部補給都來自西班牙，那麼到蘭洛最直接的路徑就是經過千里達、奧利諾科河和美達（Meta），而不是經過卡塔赫納（Cartagena）、馬格達雷那和波哥大。這個計畫讓所有的人都振奮不已。征服奧利諾科河的念頭從此縈繞在蘭洛傳教士的腦海裡。

1664 年到 1695 年間，十七位耶穌會士做過種種嘗試：有人沿奧利諾科河而下到達位於河口的西班牙瓜亞那（Guayana）要塞；其他人則溯河而上。那些想要在瓜亞那安頓者卻被告知必須折返，因為瓜亞那要塞嚴重饑荒，連士兵都奄奄一息，一副支持不下去的模樣。「我們幾乎衣不蔽體，只剩從蘭洛帶來的衣物。」加勒比（Carib）族印第安人破壞了其他神父建立起來的傳教區，並造成四位殉道者。加勒比族世居瓜亞那，對外人充滿敵意。

加雷密酋長

此時，來自譚美（Tame）隔離村的印第安人加雷密（Antonio Calaimí），讓他們有機會進行另一個決定性的嘗試。加雷密是個多采多姿的人物，他是基督徒又是音樂家。1701 那年，除了掛在腰帶上的號角外，他身無長物越過安地斯山脈，來到委內瑞拉，與貝優地（Beyote）印第安人搭上了線。他們的語言相似，他的

號角既吸引人，也教人害怕，不敢攻擊他。

視加雷密為首領的貝優地人，於 1715 年來到省會長米貝拉處，要求米貝拉幫他們成立隔離村，並給他們一個傳教士。米貝拉答應派遣年輕的古米拉神父到他們那邊去。

古米拉為傳教區帶來活力，一掃昔日的死氣沉沉。他多次進入內陸，吸引那些尚未開化的印第安人。他會徒步十五至十六天，穿過雜木林和灌木叢、走過河川或濕地、越過危險的峽谷。

他成立了五個隔離村，全都面對奧利諾科河岸。他做各樣的工作，他是木工、泥水匠、油漆工、雕刻師傅。每換一個工作，他都能操作不同的工具，好像這是他幹了一輩子的活。「他總是第一個來到工地，而且永不會感到疲倦。」

他也是內外科專家；這是他成功的祕密，也是印第安人愈來愈喜歡他的原因。省會長在一次例行巡視時，印第安人以為他要把古米拉調到波哥大，便去找古米拉神父，要他把省會長誘到埋伏之地，然後就地用弓箭把省會長給殺了。古米拉發現要勸阻他們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奧利諾科人

1731 年 11 月，古米拉當長上的任期滿了之後，隨即投入復興老奧利諾科傳教區的工作。他開始追隨前輩們曾經從事的冒險，動身前往瓜亞那和千里達。

他的遭遇跟前輩們經歷過的沒有什麼兩樣，於是他深信，他不可能從那個西班牙要塞的一小撮駐軍那裡得到任何保護。他想到另一個解決辦法：由於隔離村正在發展，本來只有三十六人的護衛隊，現在可以擴充為四十八人。

他回到美達河口。到了 1732 年，自治鎮的數目增加為四個，

分別是：馬保葉（Mapoyes）的聖若瑟、天神之后、聖德蘭和聖依納爵。加勒比人那時還沒有騷擾他們，但到了 1733 年，他們開始感受到加勒比人的攪擾。不過，那不是加勒比人的本意，而是荷蘭海盜的煽動；荷蘭海盜把印第安人抓去當奴隸，又覬覦奧利諾科盆地的豐富作物。3 月 30 日那天，加勒比人放火燒了一個墾殖區，還打算次日再燒另一個，只因遭到抵抗而作罷。多次嘗試失敗後，他們終於放棄，古米拉才得以鞏固奧利諾科傳教區。

1734 年，古米拉集中注意力去解決與方濟會士及嘉布遣會士間的法律糾紛。那時，兩會會士同時在委內瑞拉的瓜亞那傳教，從前訂立的所謂政教協定，不足以解決現在發生的問題，因為當年的條款根本無法預知後來會碰到的困難。

到了 1737 年底，因為許多印第安人逃離嘉布遣會傳教區，選擇在森林裡住下來，羅泰拉（Bernardo Rotella）神父便在奧利諾科河北岸建立了加布魯達（Cabruta）隔離村收留他們。嘉布遣會士非常忿怒，加布魯達與瓜利科（Guárico）間的衝突升高。古米拉前往卡拉卡斯（Caracas）會見嘉布遣會會長，試圖解決這個棘手問題；他們達成協議：不必按照法律協定，而是尊重印第安人遷徙的自由。

《圖解奧利諾科》

古米拉於 1738 年以會省代表的身分，被派到歐洲訪問羅馬和馬德里；就在那段期間，他完成那本偉大著作《圖解奧利諾科》。該書於 1741 年在馬德里出版。1743 年 1 月 19 日，他帶了七位耶穌會士坐船前往卡塔赫納，4 月 16 日到達波哥大。這時他的雙目突然失明，我們所知的是他回到蘭洛傳教區，並於 1750 年 7 月 16 日在那裡逝世。

古米拉受眾人愛戴。他異於常人之處，在於敢面對不可知的叢林以及善變的原住民而不退縮；還有他那無限的、完全相信他人的慈善心腸。他對原住民的愛是出於良知，對原住民的心理及文化認識深刻，並真心尊重。他勸告傳教區候補者：「不要急著主動去拜訪部落，要等他們來邀請你，並注意言行裡不可有半絲自私成分。要嚴格遵守他們為訪問制定的儀式，保持長時間緘默，知道什麼食品或飲料必須接受或可以接受。」由此可證明古米拉實在了解原住民。

雷荷西（José del Rey）稱古米拉為大奧利諾基亞（Orinoquia）森林自然保護區的先知與先鋒，是第一個發現奧利諾科的科學意義的人，他也為由森多瓦（Sandóval）和格肋凡（Claver）在新格瑞那達激發的社會精神樹立了新形象。

古米拉神父還堪得另一項榮譽。他把咖啡引進委內瑞拉：「咖啡是珍貴的果實。我做了一個種植咖啡的實驗，它長得很好，證明這塊土地很適合大量種植咖啡。」他很可能在 1732 年就試種了。1731 年他從瓜亞那和千里達回委內瑞拉的時候，帶了一些咖啡種子；那些種子一定是來自馬丁尼克（Martinique），大概是從衣索匹亞經巴黎再傳到馬丁尼克的。咖啡於 1771 年被引進巴西，很可能是從委內瑞拉傳教區引進。

7. 在世界屋脊上：

安瑞德

(António de Andrade, 1580-1634)

葡萄牙籍傳教士鄂本篤（Bento de Goes）經過一次歷史性的旅程後，證明馬可亨羅口中的國泰（Cathay）就是中國，而歐洲人幻想的中亞基督王國只不過是一場夢。不過，神話並未因此而幻滅。很多探險隊開始組織起來，企圖尋找一條跨越亞洲大陸的陸路，還有那「失去」的基督王國。他們不畏路途艱難，越過壯麗的喜馬拉雅山脈，來到西藏，於是有後來古格（Gu-ge）王國（西西藏）傳教區的建立，也促成德希德里（Ippolito Desideri）在西藏的中心拉薩留下來。

尋找失去的基督王國

安瑞德打從 1621 年起，就在印度阿格拉（Agra）負責蒙兀兒皇宮裡的傳教工作。回教商人很不了解基督宗教，所以常常帶著迷惑講述他們旅行時所經過的基督教國家。安瑞德想找出他們報告裡的真相，因此在 1624 年 3 月 30 日，離開了阿格拉，陪著蒙兀兒皇帝前往喀什米爾。

到達德里後，他獲知有一羣印度人正要出發到喜馬拉雅山上一處有名的神廟朝聖，便打扮成印度朝聖者，加入他們的行伍，並有瑪可斯（Manoel Marques）修士及兩個僕人同行。

旅行隊登上險峻的山嶺，到達斯里那加廟（Srinagar），然後到巴垂那特廟（Badrinath），那是印度香火最盛的神廟之一。安瑞德一路上麻煩不斷：先是身分很快被發現，接著兩次被逮捕、

搶劫、又被釋放。不過，他奇特的身分讓他後來獲得親切的待遇。

山勢愈來愈陡峭，旅途愈來愈艱鉅、危險。當他們抵達海拔五千六百公尺的馬那（Mana）隘口時，真的只剩半條命了。安瑞德是從這個高度遠眺廣闊的西藏高原的第一個歐洲人，在他腳下是耀眼的白色平原。

他們於 8 月初抵達位於甘巴（Langtschen-Kamba）山谷的古格王國首都札布蘭（Tsaparang）。甘巴位於西藏西面的邊境上。

國王韃嘎（Tsi-Tashi-Dagga）開始時非常生氣，他不相信有人會單純地為了宗教動機，而敢冒這許多危險。不過，經過數次交談後，他和王后都甚感滿意，還把安瑞德封為西方大喇嘛。安瑞德終於發現，那裡根本沒有所謂被遺忘的基督徒，不過，倒是可以建立一個傳教區。按照慣例交換禮物後，國王准許他在國內傳教，並答應給他一塊地興建教堂。

過了幾個星期，安瑞德請求國王准許他在馬那隘口封閉前離開；國王准了他，但要他答應以後再來。11 月初，他回到阿格拉。安瑞德復於 1625 年 6 月 13 日，在瑪可斯修士和蘇薩（Gonçalves de Souza）神父陪同下，回到札布蘭，履行對古格國王的諾言。

沒有完成的心願

國王也遵守諾言，在皇宮附近為安瑞德建了一所房子和一座教堂。安瑞德對新傳教區的未來充滿希望，自己也開始全心全意地學習當地語言。他很快就能跟喇嘛們討論，但小心翼翼務求不傷害他們，並盡量嘗試調整自己以適應他們的想法。

翌年 1626 年 6 月，有三位傳教士來協助他，於是安瑞德有餘力在距離札布蘭兩百公里的魯多克（Rudok）建立另一個傳教

中心。出現外國喇嘛的消息傳到鄰近國家，拉達克（Ladakh）的國王表達想跟安瑞德見面的意願，北西藏烏盛（Utsang）的國王也邀請他去訪問。札布蘭國王繼續培養與安瑞德的友誼，帶他參觀擁有五百個喇嘛的頭靈（Totling）僧院。安瑞德著手研究他們的組織和宗教禮儀。

他不隨便要求別人皈依，也不急著要別人馬上皈依，因為前景看來一片大好，他寧願先把基礎打好。他曾對一個同伴保證說：「這裡將來一定會成為耶穌會最興旺的一個傳教區。」

不過，當韃靼被他弟弟篡了位，情況就完全改觀。新國王是大喇嘛，並不認同哥哥對外國傳教士的友善態度。原來的國王向拉達克國王求助；拉達克國王來了，卻奪取了王位。

這都是發生在 1630 年的事。當時安瑞德神父被指派為省會長，正在臥亞。他得知這個消息後，就派阿澤維多（Francisco de Azevedo）前去處理。阿澤維多辦事有效率又富技巧。他於 1631 年 8 月 25 日到達札布蘭，馬上體認到他根本無法插手，因為拉達克國王任命的首長很不友善。於是他跑到首都列城（Leh），與國王詳談後，獲准——或者他以為已經得到允許——繼續在古格、魯多克和首都列城傳教。

任務顯然已經完成，他於 1632 年 1 月 3 日回到離開半年的阿格拉。

札布蘭的情勢其實並不妙，首長敵意依舊，五位神父被軟禁在家裡。安瑞德不承認失敗，計畫帶六個耶穌會士回到那裡。不過，行程仍在籌備中，他卻於 1634 年 3 月 19 日逝世。

這隊人馬到 1635 年初才啟程。這是一場徹底的災難，六個神父中只有兩個到達札布蘭，就是長上寇列斯馬（Coresma）與一個同伴。在當時那種困難情勢下，要維持傳教區存活，需要一

個才幹出色的領導人。寇列斯馬沒有這份才幹，甚至不認為要操那份心。執政當局對天主教充滿敵意，居民向神父住處丟石頭而不會受到懲罰；教友數目持續下降，剩下的也四分五散。總之，努力與成果不成比例。到了 1635 年 12 月，曾被保證將是耶穌會最興旺的傳教區，面臨必須放棄的命運。

白乃心

(Johannes Grüber, 1623-1680)

經驗豐富的旅行家

白乃心生於多瑙河畔林茲城（Linz），是一位學識豐富的耶穌會士、不畏艱難的旅行家。歐洲人想找尋一條到中國的陸路，就把白乃心送去了。他於 1656 年從羅馬出發，先走一段陸路——從斯密納（Smirna）到歐姆茲——然後走海路到印度的蘇拉特（Surat）。由於荷蘭人阻斷了前往臥亞的通道，白乃心接受了一位英國船長把他載到澳門的建議，而於 1658 年 7 月底抵達澳門。

他曾是北京湯若望科學團隊的一員，只是為期不長。那時荷蘭水手搶奪了葡萄牙在海上的霸權。就在白乃心來華之前不久，荷蘭人劫持了兩條運送物資到急待發展的中國傳教區的船，傳教區的資源因而極為短缺，打開一條陸路便成了當務之急，有了通道就能獲得物資並跟羅馬聯繫。找路，沒有比白乃心更佳的人選了，他是經驗豐富的旅行家。湯若望為他拿到中國皇帝的准許，一張通行證和一筆可觀的款項作為旅費。

他們還給白乃心找到一個伴：比利時人吳爾鐸（Albert d'Orville）。兩人於 1661 年 4 月 13 日動身。他們有三條路線可以選擇：一是走絲路往西；一是經東京（Tonkin）（按：今之越南）和暹羅，再往南走；一是採中間路線，經西藏往西南走。他們選了第三條路，從西藏的東邊進入世界屋脊。

前進世界屋脊

六月底，他們已身在靠近長城的西寧（Hsining）。7月13日他們重新踏上旅途，三天後到達寇寇諾爾（Koko-nor）或稱青海湖（Blue Sea）的地方，那是中亞最大的湖，然後越過一片溪流交錯的富饒地區（也有許多強盜），然後是沙漠，然後來到烏拉山脈（Ula mountains）的第一座大山。如果他們想要去西藏，就得攀登烏拉山脈一座比一座高的山，也一座比一座難攀越：不兒罕（Burkhan）山、秀佳（Shuga）山、拜安卡拉（Baian-kara）山，再渡過木烏薩（Mur-Ussa）河或稱青河（Blue River）後，就到達騰格拉（Tangla）山脈。

越往上爬，寒氣越刺骨，空氣愈來愈稀薄，山勢也愈來愈陡峭，馬和駱駝在這樣的高度都無法運載重物。越過騰格拉山脈，到了黑河（Nag-chu），他們就必須用「最強壯的犛牛：牠們的尾巴像馬尾，有個毛茸茸的肚子，全身黑色」。

他們終於進入西藏王國，下一個目標是離拉薩八十公里的熱振寺（Jan Reting Gompa）；再爬過海拔五千四百公尺的潘菩拉隘口（pass of Penpo-la），就可以看到拉薩，「中國人稱之為Cam，韃靼人稱Barantola，外國人稱Lass」。當他們逐漸走近拉薩，只見黑色帳篷星羅棋布，一列又一列的朝聖者朝著市區走去。再走近一點，只見路兩旁是一行行沒有盡頭的碑文。

他們於1661年10月8日抵達拉薩。一路上曾多次被盤問，但未被騷擾。國王召見了他們，也仁慈地對待他們。基於宗教上的顧忌，他們沒有拜訪被尊為神的大喇嘛。

旅行隊到此解散，他們必須等到11月才能繼續旅程。這次他們選擇人們最常走的，卻是最艱困的路線前往尼泊爾首都加德

滿都。這趟路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

他們在 1662 年 1 月初抵達烽火中的加德滿都，還好沒有遇到困難。他們送給國王一副雙筒望遠鏡及一些數學儀器，國王很開心。「離開加德滿都，在可怕的重山中轉了三十三天後」，他們抵達目蓮王國（Kingdom of Muring）；十天後到達蒙兀兒帝國，在恆河的另一邊，他們已經到達印度了。1662 年 3 月下旬，他們平安抵達阿格拉。這趟歷史性的旅程花了不到一年的時間。

德希德里

(Ippolito Desideri, 1684-1733)

安瑞德和白乃心是西藏探險的先驅：安瑞德熟悉廣袤西藏高原的外圍，白乃心則在路經西藏時訪問了拉薩。一位義大利耶穌會士德希德里，雖然不如他的同鄉利瑪竇和諾比理出名，名氣卻與安、白兩人不相上下。他在西藏的中心拉薩落腳。可惜的是，教會管轄權又一次出現爭論，使得他在西藏的工作短命而終。

德希德里還有另一個貢獻。他的四卷本的《西藏紀事》使他成為第一位而且是第一流的西藏專家。當時他說：「寫此書純屬個人興趣，無意出版。」瑞典探險家赫定（Sven Hedin）則說：「德希德里是有史以來到過西藏的旅行家中最了不起的一位。」

立志去西藏

德希德里年輕時就嚮往西藏。他這樣記述：「終於終於，我在 1712 年 8 月 15 日獲得總會長坦布瑞尼神父的准許去東印度，在那邊接受到西藏王國建立傳教區的命令。9 月時我最後一次親吻了教宗克勉十一世足下，領受了他的宗座祝福，接著在 27 日開始我漫長的旅程。那時我的年紀是二十七歲又九個月。」

他於 1712 年 9 月 27 日開始漫長的旅程，經過里斯本、臥亞、蘇拉特、坎貝（Cambay）、德里、拉哈爾（Lahore）、喀什米爾和列城，於 1716 年 3 月 18 日到達拉薩。

他到拉薩不久，就被傳喚進宮。首相思齡東勒（Zze-ring-tong-drup）詢問他此行有何目的。德希德里坦白告訴他：自己是一個神職人員，一個喇嘛，來這裡是要教導人們基督的法律，並打算

在西藏長留下來。首相似乎很滿意他的回答，告訴他儘管留下來自由傳教，並相信國王和其他官員會樂意聽他講道。

過了不久，首相又召見他，告訴他不但要保護他，還要做他真誠忠心的朋友。最後，國王也親自表示想見他。德希德里並不急，因為他不能空著手去。兩人終於 5 月 1 日相見，這次會面十分成功。國王星格斯汗（Cinghes Khan）是沽芝汗（Guchi khan）的孫子，沽芝汗是寇寇諾爾韃靼人的首領，於 1641 年征服西藏。國王是名義上的治理者，實權則握在達賴喇嘛手中。達賴喇嘛與國王對德希德里讚譽有加，准許他傳教，甚至可以在城裡買房子。這是非比尋常的事，因為一般外國人只能住在租界裡。

國王和宮裡的人都把德希德里奉為行基督律法的大喇嘛。他們常常對他說：「如果我們懂得你的語言，或者你通曉我們的，我們就會要求你向我們解釋你的宗教了。」

基督教的喇嘛

德希德里在科勒（Khorap）城裡大街上買了一間屋子。「從那天開始直到我在西藏王國最後的一天為止，近六年的時間，我每天從早到晚不停地學習藏語。每天除了喝茶外，我不吃半點其他的東西，只有節慶日或某些特殊場合例外。」

在此期間，國王每天派人去探望德希德里，想知道他學藏語的進度。有一天，使者告訴他國王與總督都得了重病，相信是遭人下毒。德希德里有一瓶從羅馬帶來叫 *teriaca* 的藥，便送了過去，並保證藥到病除。藥物真的發生了作用，當晚兩個病人都睡得安穩，次日起床時病已痊癒。

國王衷心感激德希德里，從此非常喜愛他。1716 年 8 月初某一天，總督召他相見，告訴他國王有多喜愛他，還說：

「這是為什麼我們沒有繁文縟節、沒有隨扈就相見，並講一些王上委託我講的重要事情。你知道王上愛你。就像父親整天想著能為兒子做些什麼，他也在想如何向你和全國人民表示他尊重你；他很想送你一些你喜歡的東西。因此，看在他愛護你的份上，請你本著一貫真誠的態度，向他求任何你希望得到的東西。王上實在非常欣賞你的誠懇。」

德希德里愣住了。他設法得體地回答。於是，他以最尊敬的態度告訴總督，他只希望國王和其他的人願意聽他講基督信仰的真理，並思考這些重要的真理。

大官們堅持要送東西，德希德里也不放棄要傳福音。國王得悉後，甚為驚訝。德希德里記載說：「國王送口信來說，他很感激我，因為我還未了解他們就仁慈對待他們；其次，他很高興我是為了他王國的好處而到來；第三，他答應聽道理，如果經過深刻成熟的反省，發現自己以前的信仰是謬誤的話，那麼，他們全家、他的文武百官以及全國人民都要領洗進教，成為基督聖言的跟隨者。」

在西藏的中心

1716 年 12 月，在他抵達西藏九個月後，德希德里完成了一份簡短的關於基督教在西藏的書面報告。一個月後他把這份報告呈遞給國王，國王建議他也去研究一下喇嘛教的經典。於是德希德里開始每天去小昭寺（Ramo-cce）。他「研讀」，更好說是「狼吞虎嚥」大藏經（Kaa-n-ghiur）裡最重要的卷冊。大藏經是從超過一千篇的梵文和中文作品翻譯過來的全集，是重要的經典。

1717 年 8 月，他又接受了國王的勸告，搬到離拉薩不遠的薩拉（Sara）學院。薩拉學院是全西藏和中國的喇嘛進修的地方，

本來只接受西藏人及蒙古人，德希德里是一個例外。

他在學校裡學習幾種主要的西藏方言，也跟喇嘛們討論宗教事務。「我想搞懂那些最深奧的訓導，那些名為空性（Tongbagni）的經典。」閱讀與學習比討論更有幫助，直到「我不但了解而且已經能掌握那些不可思議的論題，那些題目都是我很想知道的。」

他的學習不幸因境內發生戰爭而中斷，更別提開始寫作。西藏周圍的各韃靼部落最初只是不停地騷擾商隊，現在開始入侵藏國。他們於 1717 年 12 月 3 日攻下拉薩。國王帶著太子和朝臣倉皇出逃，不幸被截獲並殺害；達賴喇嘛的宮殿被掠奪一空；德希德里的房子也難逃一劫。

德希德里到塔高黑（Tapko-Khier）省的隆基逆（Trong-g-gnee）村避難，該村子離拉薩有八天的路程。從 1717 年底或 1718 年初，到 1721 年 4 月，他都住在隆基逆村，直到被逼離開為止。不過，不是韃靼人逼他離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嘉布遣會士來到

1716 年 10 月 1 日，大概在德希德里抵達拉薩之後半年，三個嘉布遣會士去找他；他們是法諾（Domenico da Fano）、賓納（Orazio della Penna）和霍松布洛（Francesco Fossobrone）。十年前曾有幾位嘉布遣會士來到西藏，很快因失望而離開。這三位會士聲稱，新成立的傳信部指定他們來西藏傳教，別的修會不得介入，他們已向羅馬報告德希德里在西藏一事，並聲明他們不能容許其他修會在西藏傳教。

「我回答他們說：他們寫信到羅馬要求傳信部下令是對的。」

只要命令一到，我一定馬上順從。」在此期間，德希德里熱誠地招待他們住在家裡，並幫助他們學習藏語。

1721 年 4 月 16 日，嘉布遣會士給他看傳信部頒布的命令，命令中說明只有嘉布遣會士能在西藏建立傳教區。教廷也向耶穌會總會長知會了這個命令，總會長把它轉到臥亞會省，再送到德希德里手裡。

「我馬上遵命，28 日便離開拉薩。」

這事發生在耶穌會被解散之前。耶穌會已處處受打壓，被指控妄自尊大；可憐的總會長坦布瑞尼被指責管不住他的人，致使他們不懂得應遵守羅馬教廷的命令。不過，謹慎才是最勇敢的表現。

這就是一個很有前途的傳教區的夭折經過。德希德里當年的努力已無跡可尋。在嘉布遣傳教區的一個遺址之上，一個銅鈴仍懸掛在大昭寺（Jo-khang）裡。大昭寺就是至上菩薩廟之意，位於拉薩中心，是全西藏最神聖的所在。它寧靜無聲，但上面所刻著的：「讚美天主」（Te Deum laudamus），就足以說明它的來源了。

註一：我會偶爾超越我設定的秋季開端 1681 年，以便把國王告解神父、平民宣講人、傳教士和探險家等不同身分的人一併介紹。

註二：塞巴斯坦國王統治的期間非常短（1578-1579）。他繼續祖父約翰的遺志加緊對抗摩洛哥，但在一次十字軍東征時，在阿

爾嘎撒基比（Alcararquivir）喪生，並埋葬在那裡。不過，葡萄牙人謠傳他仍活著。菲利普二世於 1580 年取得王位後，重金贖回他的遺體；可是塞巴斯坦運動——宣揚塞巴斯坦將以葡萄牙救贖君王的身分回來的信念——卻持續不墜。

參考資料：

ASTRAIN, A.: *Historia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la Asistencia de España*, vol. VI y VII (Madrid, 1920 and 1925) .

GUTIERREZ SEMPRUN, M.: *Confesores jesuitas de los reyes de España* (en AL-DEA, Q. and others: *Diccionario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 de España* 1, Madrid, 1972) .

GUITTON, Georges: *Le Père de la Chaize, Confesseur de Louis XIV* (Paris, 1959) .

LACOUTURE, Jean: *L'art de confesser nos rois* (en "Jésuites, Vol. 11 Les conquérants". Paris, 1991) .

MINOIS, Georges: *Le confesseur du roi* (Paris, 1988) .

VAN DEN BESSELAAR, José: *António Vieira: o homem, a obra, as idéias* (Lisbon, 1981) .

MINOZZI, Giovanni: *Paolo Segneri* (Amatrice, 1949) .

CORCIONE, Michele: *La storia e la città di Francesco de Geronimo* (Naples, 1982) .

GUIDETTI, Armando: *Le missioni popolari. I grandi Gesuiti italiani* (Milan, 1988) .

D'HEROUVILLE: *Bourdaloue* (Paris, 1947) .

MEAGHER, R.B.: *Bourdaloue, Louis*, in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New York, 1966) .

GOMEZ RODELES, Cecilio: *Vida del célebre misionero P. Pedro Calatayud* (Madrid, 1882) .

ROWBOTHAM, Arnold H.: *Missionary and Mandarin* (Berkeley, 1942) .

WITEK, John W. (Ed.) : *Ferdinand Verbiest Jesuit Missionary, Scientist, Engin-*

cer and Diplomat (Louvain, 1994) .

BESSE, L.: *Father Beschi. His Times and his Writings* (Trichinopoly, 1918) .

FURLONG, Guillermo: *Domenico Zipoli, Músico eximio en Europa y América*
(Archivum Historicum S.I. 24 [1955] 418-426) .

CARAMAN, Philip: *The Lost Paradise* (London, 1975) .

SZARAN, Luis-VON THÜMEN, Gisela: *Música de las Reducciones jesuíticas del Paraguay* (Asunción, 1992) .

NAWROT, Piotr: *Música de vísperas en las reducciones de Chiquitos Bolivia (1691-1767) : Obras de Domenico Zipoli y maestros jesuitas e indígenas anónimos (Concepción-Bolivia, 1994)* .

DONNELLY, Joseph P.: *Jacques Marquette* (Chicago, 1968) .

BOLOGNANI, Bonifacio: *Un grande pioniere trentino. P. Eusebio F. Chini S.J.*
(Trento, 1964) .

BOLTON, Herbert Eugene: *The Padre on Horseback* (San Francisco, 1932) .

BURRUS, Ernest J.: *Juan María de Salvatierra S.J. Selected Letters about Lower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71) .

AGUIRRE ELORRIAGA, Manuel: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Venezuela* (Caracas, 1941) .

DEL REY, José: *P. José Gumilla. Escritos Varios* (Caracas, 1970) .FACCHIN, Paola: *Padre José Gumilla* (SIC 600, Diciembre 1997) .

DIDIER, Hugues: *Les Portugais au Tibet. Les premières relations jésuites (1624-1635)* .

DE FILIPPI, Filippo: *An Account of Tibet. The Travels of Ippolito Desideri, 1712-1727* (London, 1932) .

CARAMAN, Philip: *Tibet—The Jesuit Century* (Devon, 1997) .



II
死亡四部曲

解散耶穌會的行動以四個完全不同的階段進行，但都有一個可以引起骨牌效應的動能，和一個相同的分母，就是形式上合法、骨子裡不合正義、執行效率奇佳。涉及的人形形色色，且為數眾多。有國王、大臣、教宗和教士，直來直往的或詭計多端的、強壯的或瘦弱的、善意的或惡意的，毫不例外地，也有女性，那就是龐巴杜（Pompadour）夫人。每個時期都有耶穌會士被拿來當作打壓的藉口或正當理由，像葡萄牙的馬拉格瑞達和法國的拉法葉；或被當作代罪羔羊，像西班牙的畢納德利和修會被解散時的總會長利斯。

現在，且讓我們把這些耶穌會士的事蹟從頭道來。

1. 里斯本 1759： 倒楣的馬拉格瑞達 (Gabriele Malagrida, 1689-1761)

馬拉格瑞達的不幸本可名列史冊，成為另一個聖人安琪達（Anchieta）；可惜他後來成了瘋子，更因詐欺罪遊街示眾，最後被送上絞架了此一生。彭波侯爵（Pombal）更藉口耶穌會製造了這麼一個怪胎，應該被消滅。

巴西使徒

後半輩子的不光彩事件雖然有傷馬拉格瑞達的名譽，但仍無法把他的名字從巴西偉大使徒名冊中抹去。

馬拉格瑞達從 1721 年到 1753 年，也就是從三十二歲到六十五歲這段時光，都在葡萄牙殖民地辛勤耕耘；只有在 1749 年到 1751 年中斷了約三年。這三十年又可分成兩個很不一樣的階段：第一階段是以馬蘭約隊長的身分走遍了整個亞馬遜森林；第二階段是創辦各種事業。

第一階段是傳統的、英勇的。他赤足穿越稠密的叢林，完成超過三千公里的路程。他的目的是向印第安人傳教，同時保護他們免受貪得無厭的葡萄牙殖民者剝削。

他在第二個階段也沒有忘記印第安人。不過，此時他認為如果他也照顧葡萄牙殖民者，說不定能改變他們的想法，讓印第安人的權利不致成為紙上文字，是另一種捍衛印第安人權利的形式。他的能力與熱情到處可見。他不放棄可以宣講的每分每秒，他慷慨激昂地四處宣講。他建立許多偉大的機構：醫院、學校、

神學院、庇護所、修道院、婦女之家等等，至今仍為世人津津樂道。

皇室之寵

1749年他中止了在巴西的工作，回到葡萄牙首都，向那些認同馬蘭約工作的權貴尋求幫助。他於1750年2月頂著聖人及奇蹟創造者的光環，帶著總是陪同他宣講的傳教區聖母（Our Lady of the Missions）像，到達里斯本。當國王喬五世（João V）得悉他抵達的消息，便派了皇家軍艦和護衛隊接他上岸，並直接將他送到皇宮。國王隆重地接見他，垂詢關於這個創造了許多奇蹟的、遠近聞名的聖母像，並下令護衛隊護送他到下榻的學院。

馬拉格瑞達立刻展開他的使徒工作，特別是帶領神操。

他的名聲遍及全首都，每個人都想聽他講道。他為耶穌會學院的學生講避靜。他經常與皇太后瑪莉安娜長談，他也為皇室帶領神操，並且在首都多個修道院及教堂講道。

他沒有忘記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請求國王保護他在巴西的工作。國王受他的善行感動，賜給他想得到的權力，以及一筆為數可觀的款項去開創新的事業。國王並決定為自己的善終做一次避靜，國王的年紀已經很大了，但仍勤發痛悔、勤做補贖。1750年7月31日晚上，國王在馬拉格瑞達神父的幫助下，獲得善終。

他在里斯本及周圍地區的牧靈工作應接不暇，也都很成功。1751年初他開始準備返回巴西。皇太后瑪莉安娜向他吐露，希望他在她臨終時重返葡萄牙，像幫助喬五世獲得善終一樣幫助她，馬拉格瑞達答應了她。1751年中他出發前往巴西，還沒有離開港口，就接到新國王若瑟一世（José I）的信，任命他為海外領地的皇家顧問。

彭波進場

財務問題解決了，馬拉格瑞達的困難卻沒有減少。事實上，他在路上就遇上了，彭波侯爵的陰影已開始籠罩他。彭波是新國王任命的首相。一個出身不高的貴族，如今爬到最高層。他的管理能力是出名的強，有效率、堅韌、甚至殘酷。有人說人們不是恨他就是怕他，但絕不會愛他。國王若瑟一世在他有力的控制下，對他唯命是從。

開始時，彭波與耶穌會的關係不錯，他對一些會士還很友善。現存四十五封由會士寫給他的，以及七十四封他寫給會士的信，多少證明耶穌會士對他曾經擁護與愛戴。不過當他獲得大權後，基於政治及宗教因素，情況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想建立一個現代化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教會得聽從政府的話，一如法國的模式。

彭波的一個兄弟福塔朵（Francisco Xavier de Mendonça Furtado）剛被任命為帕拉（Pará）及馬蘭約的總督，這次正好跟馬拉格瑞達同船，他們免不了閒聊。好幾次，首相的這位兄弟居然說新教國家比天主教國家繁榮進步，馬拉格瑞達聽了勃然大怒，狠狠地痛罵他一頓，讓這位新總督忘不了這筆帳。

馬拉格瑞達又開始工作。資源不缺，但是好像沒有一件事情是順利的。他想在馬蘭約首府聖路易蓋一所神學院，但是主教反對；他嘗試找別的教區合作，結果仍然一樣。其他計畫也遭到同樣命運，講道也不像從前那樣能引起聽眾的熱烈回響。他好像不再得到羣眾的支持，以前他們曾毫無條件支持他的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貝倫（Belém）來了一位新總督，是彭波繼母與前夫所生的

兒子，在新總督背後撐腰的是福塔朵。福塔朵執行首相的命令，要在巴西建立一個大帕拉商行，以平衡耶穌會士的活動及影響力，尤其要奪取他們在印第安部落的非宗教權力。這樣一來，殖民者就可以不理會皇家保護印第安人的立場，任意剝削他們而不必受到處罰。

這就是當權者敵視馬拉格瑞達的理由，可是他不知道。值得一提的是，這位義大利傳教士的性格與行事方法更升高這個衝擊。

風雲密布

當馬拉格瑞達接到皇太后瑪莉安娜來信的時候，他正在阿坎塔拉（Alcántara）講避靜。皇太后希望他陪她度過生命的最後幾年，為善終作準備。他回到貝倫，並於 1754 年 1 月乘船返國。他計畫再回巴西的，可是計畫沒實現。每件事都顯得不對勁，但是他還是沒有起疑。

皇太后見到他很開心，她的兒子——國王卻不。他毫不掩飾地以沉默接待馬拉格瑞達，這都是彭波在搞鬼。馬拉格瑞達不理會這種不友善的沉默，仍舊以他慣有的熱情從事牧靈工作，也常常拜訪皇太后。

一天，他從皇太后那邊出來，經過彭波身邊；因為他不認識彭波，所以沒有向他致意。拘泥於形式的首相攔住他，斥責他不懂禮貌。這位耶穌會士解釋說，他們才第一次見面，彭波便表明自己的首相身分，還暗示他的職位有多麼重要。

此時，馬拉格瑞達展露了他的雙重性格：一方面再三謙遜地道歉，卻同時表示對彭波兄弟的不滿。他認為福塔朵在執行馬蘭約總督職務時的態度實在惡劣，老百姓尤其不滿。他還放肆地加上一句：現任總督應該下臺，否則可能會遭到報復。

彭波回答說他會仔細考慮，然後轉身走開。

這正是一場戰爭的開端，而它的結局是馬拉格瑞達被除掉。掌握大權的首相遇見一個耶穌會士，而會士居然膽敢當面為一些無權過問的事，向他提出意見，豈不是過分了些。

皇太后的健康愈來愈差。一天，馬拉格瑞達神父趕到皇宮，設法安慰她，幫助她準備善終；正準備離開時，接到彭波獨斷的命令，不准他再踏進皇宮一步。在感到深受傷害之餘，他離開了里斯本，退隱到塞圖巴（Setubal）。憑著他驚人的適應能力，他再度投入使徒工作。1754年8月14日皇太后逝世時，他仍留在塞圖巴。是年底，他回到里斯本，重拾牧職工作。

1755年大地震

1755年11月1日，一次大地震把四分之三的里斯本夷為平地，皇家及許多貴族被迫遷居臨時住所。這一次，彭波展示了他的管理長才，極具效率地幫助受害者，並設置了三百座引人注目的斷頭臺，及時有效地結束了災難初期趁火打劫的混亂局面。他快速又有效率地進行重建，一個新的、更美麗的里斯本，終於從廢墟中矗立起來。

馬拉格瑞達也投身救災行列中。他不眠不休地援助受難者、幫助垂死者；但他同時在講道臺上，高聲斥責導致災難的種種罪行，呼籲民眾發痛悔、做補贖。他要求晉見國王，以他一貫直言不諱的作風，告訴國王，挽救災難的唯一辦法就是悔改，全國一起皈依回頭；而最好的補救方法，莫過於他早已向國王推薦過的神操。

彭波不同意他的說法。他發了一張傳單主張：地震是自然現象，與超自然無關。馬拉格瑞達除了在講道臺上抨擊這個說法

外，他還印了一份答辯書，分送給國王、王室，甚至彭波本人。

這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彭波發動兩波攻勢：首先，他要耶穌會長上暫時把馬拉格瑞達禁足在塞圖巴，遠離首都；同時，他策劃一個牽連更廣的打擊耶穌會的行動。

第一步是對付宮裡的五個耶穌會告解神父。1757 年 9 月 17 日，五個神父同時接到得馬上離開皇宮的命令，並且不得與皇室再有任何接觸。眾人對這樣的決定驚訝不已。於是謠言四起，紛傳驅逐耶穌會士是箭在弦上的事了。

驅逐開始

第一步，彭波於 1758 年 5 月 2 日獲得教宗本篤十四世的指派令，指派彭波的堂兄弟薩丹哈（Francisco de Saldanha）樞機，出任改革葡萄牙耶穌會的宗座視察。薩丹哈視察後，宣稱耶穌會士從事非法商業行為，因而有罪。彭波於是強迫里斯本的主教撤銷耶穌會士聽告解及宣講的職務。

9 月 3 日深夜，國王乘坐特謝拉（Pedro Teixeira）的馬車去會見情婦達佛拉（Távora）侯爵夫人，剛離開皇宮便遭射擊，當攻擊者發現車裡的人是國王時，一夥人便慌忙逃跑。兇手一直沒被抓到，也不知道誰是主謀。

對這個事件有多種說法：一說這次襲擊的主謀是阿維羅（Aveiro）公爵，因為才幾天之前，特謝拉做了對不起他的事，所以他要報復；一說是受辱的達佛拉侯爵報復國王；還有一說是彭波的陰謀，他雇用兇手嫁禍公爵和侯爵，但最終目標是耶穌會士。

國王囑咐彭波要找出兇手並加以嚴懲，三個月過去了卻毫無頭緒。11 月 11 日薩丹哈樞機命令馬拉格瑞達到里斯本來，並在

聖安東（San Antão）書院等候新的命令。13 日，阿維羅公爵、達佛拉侯爵以及他們的家人全被逮捕，罪名是襲擊國王的主謀。同一天，大批軍隊團團圍住里斯本耶穌會的七個會院。28 日傍晚，馬拉格瑞達出現在彭波面前，彭波質問他在那次襲擊中扮演何種角色，這位耶穌會士矢口否認有任何干係。

1759 年 1 月 11 日，一支特遣部隊來到書院，把他帶到貝倫位於太加斯（Tagus）河北岸的鍾奎拉（La Junqueira）監獄，其他九個最有名的耶穌會士也同時被捕。

馬拉格瑞達被捕的第二天，沒有經過任何審訊便被裁定有罪。其他被告：公爵、侯爵以及家人都於 1 月 13 日被處以死刑（註一）。至於馬拉格瑞達及其同會兄弟的命運，就大不相同了。

驅逐令

六天後，國王下令沒收耶穌會的一切財產。4 月 20 日，他知會教宗他正在準備驅逐令。1759 年 9 月 3 日，正是襲擊案發生一年後，驅逐令下來了。命令裡列舉了許多必須驅逐耶穌會士的理由，其中有：耶穌會士違背葡萄牙與西班牙的殖民地邊界條約，把超過三萬的印第安人從巴拉圭隔離村遷離；耶穌會士拒絕放棄在巴西印第安部落宗教事務以外的管理權；耶穌會士觸犯神職人員不可有商業行為的規定；耶穌會士日趨腐敗墮落；耶穌會士在海外中傷國王；在行刺事件中，耶穌會士至少要負道德責任。

9 月 17 日，一百三十三位耶穌會士從里斯本被押到太加斯。10 月 5 日，國王宣布褫奪他們的公民權，因為他們造反、賣國、敵對及挑釁政府。同一天，薩丹哈宣告他視察耶穌會之行失敗，因為耶穌會士拒絕改革，薩丹哈還警告信徒們要小心提防耶穌會士。

1759 年，葡萄牙耶穌會士有 1,698 人，789 人在葡國境內，其餘的在葡萄牙殖民地上。彭波和薩丹哈誘騙年輕的耶穌會士與耶穌會脫離關係，145 人中只有三個受騙。驅逐工作逐步進行；最後有 1,100 個會士去了教宗領土，70 個死於獄中，38 人流離失所，約 220 人被拘禁在葡萄牙各監獄裡。

這樣的驅逐手段，對傳教區的打擊是可以想見的。

毀了一個人

馬拉格瑞達這時的遭遇又如何呢？他正在鍾奎拉監獄的地牢裡苟延殘喘、日漸憔悴。關他的人不忘隨時查看他們的作為對這個可憐人的影響。

被隔離、毫無指望，又被自以為是的先知使命完全占據，馬拉格瑞達開始變得精神異常，常常以為聽到有人對他說話、看到異象、獲得啟示以及其他種種神祕經驗。他還用僅有的一些紙和一枝簡陋的筆，寫了兩篇滿紙荒唐、純屬虛構的文章，在在顯示他的景況堪憐。一篇的題目是：〈至聖瑪利亞之母、榮耀聖安納英勇又值得讚揚的一生。由聖婦、在至高聖母和她至聖聖子的協助、同意、合作下，口述而成〉。另一篇則以拉丁文寫成，題目是：〈反基督者的一生與他建立的帝國〉。

二者都充滿了荒謬的想像，在第一篇裡，他說聖安納是一個叫比潘德（Bipanter）的木匠和聖麗莎的女兒，聖麗莎還有另外一個女兒聖芭絲婷（Baptistine）；聖安納在母胎中就獲得能完全運用理智的恩寵，她的恩寵如此豐富，使她能過著如在修道院裡一般的獻身生活；她出生前就在聖三面前發了修道三願；他們家有二十個奴隸，十二個女的和八個男的，都是偉大的聖人，值得像古代聖祖般受人尊敬；聖安納與聖若亞敬（Joachim）成婚後，在

耶路撒冷興蓋孤兒院，天使們偽裝成木工參與建設，並拒領任何工資。

根據馬拉格瑞達的另一本小冊，那位反基督者可能於 1920 年在米蘭誕生，後來又說是 1999 年，父親是修道人，母親是修女；他將領洗並在阿拉伯建立王國，從而征服全世界。

他的手稿在 1760 年 12 月中旬的一次巡視中被發現。他們把它拿走，交給法官佩雷拉（Pedro Goncalves Cordeiro Pereira）。他把它轉呈宗教裁判所。

更可恥的是，有人暗示馬拉格瑞達常常利用午睡或黑夜時間自慰，這些人志在污辱他的名聲。

由於這兩本小冊子的內容事關宗教裁判所，葡萄牙議會下令在 1761 年 1 月 9 日，把馬拉格瑞達從一般監獄移送到里斯本的宗教裁判所，在那裡接受正式審判。

那時宗教裁判所的大法官是布拉干薩（D. José de Bragança），是國王的繼兄弟，十分反對彭波的操縱與統治，彭波就以自己的兄弟卡爾瓦奧（Paulo de Carvalho）取代了他。

偵訊立即開始，案件編號三十四。馬拉格瑞達堅持他的神祕經驗是真實的，兩本書的內容也毫不悖逆天主教信仰的真理。法庭卻不這樣想，他們催促馬拉格瑞達承認自己的錯誤，承認異象與顯現的說法是不實的。他們不認為那是正信宗教的表現；他們認為他是一個騙子，想冒充聖人、先知。法庭也的確以此判決他。

馬拉格瑞達在里斯本羅西（Rocio）廣場被吊死，隨即焚化。死刑於 9 月 20 日晚上開始執行，直到次日即 1761 年 9 月 21 日凌晨才結束，他的骨灰被灑到海上，以防民眾收集，作為聖人聖髑保存。

馬拉格瑞達被處死的消息傳遍全歐洲，引起公憤。這樣不明

不白地被處死，不但沒有毀損他的名聲，反而促成大家重建他的聲譽的決心。在巴西，他被尊為可敬的（**Venerable**）；在他的故鄉梅那究（**Menaggio**），人們為他冠上真福（**Blessed**）。梅那究位於義大利北部科摩（**Como**）湖邊。

2. 巴黎 1762： 拉法葉破產 (Antoine Lavalette, 1708-1767)

沒有一個國家曾像法國這樣強烈反對耶穌會士，所以有人以為彭波的作為一定會讓法國那些帶頭反對耶穌會的知識分子鼓掌歡呼。

事實卻非如此。他們指控彭波殘酷無情、手段粗糙又不合法；他們批評里斯本對耶穌會的控訴方式可笑、內涵荒誕又不合情理；他們指控耶穌會士違背會祖的精神；他們要求教宗同意這個說法；他們甚至忍受那個可恨的宗教裁判所。意見可真多！

不過有一件事倒是很明顯的：原來打擊耶穌會是如此輕而易舉。耶穌會士並不是不可征服的；反之，他們毫不抵抗，沒有任何會士挺身出來辯護。耶穌會的對頭因而食髓知味，他們只須靜候時機，而他們不用等太久。

危險的指派

我們可以說，教人拍案驚奇的拉法葉事件在 1753 年 5 月就已經開始，那時耶穌會總會長維斯康提（Ignazio Visconti）指派他繼吉倫（Guillaume Guillen）之後，成為馬丁尼克傳教區長上。馬丁尼克位於法屬安地列斯羣島上。

這個指派本來就不明智。總會長是因巴黎省會長的建議而做了這個決定，而巴黎省會長則是根據即將卸任的吉倫和他的諮議們的通知，把推薦人選向上呈報。依規定得提名三個候選人，拉法葉並不是吉倫及諮議們的第一人選；反之，他們提出種種反對

拉法葉的理由。讓我們看看其中幾項，他們還真有先見之明呢！

吉倫說：「拉法葉的確具有當長上的特質，特別在處理事情時的表現，既警覺又堅定。不過要他管理傳教區，恐怕只顧到人性及政治目的，會把世俗事務而不是心靈需要放在第一優先。他太自信，如果沒有一個精明的長上常常提醒他、約束他，他一定會嘗試一些新的冒險。」

其中一個諮議馬歇爾（François Marchal）表示：「他的性格尚未成熟。此外，他活力十足，有時會咬人；他浮躁，只有匹夫之勇。他精力太充沛了，腦子裡都是一些異想天開的計畫。」

可是人民選上他，他們才不管那些觀察者的說法。拉法葉於 1742 年來到馬丁尼克，三十二歲，剛受完訓練。1746 年，他又被指派為卡貝（Carbet）本堂，贏得上至總督、下至教區最小居民的愛戴。卡貝在首府聖伯鐸（Saint-Pierre）南邊。他魅力天成，不但對人有興趣，對島上的經濟也興趣盎然。他真是個天生的經營管理人。

事實上，吉倫神父於 1747 年就把傳教區交給他管理，而他也以出色的才幹、火般的活力管理它。不數年，他就成為島上名列首位的耶穌會士，大家都看好他一定會成為吉倫的繼承人。

人民的意見壓過當局的異議。

前景一片大好

當拉法葉接任為長上時，他沒有放棄原來財務和管理職位。一切權力都握在他手中，比在巴黎的省會長及在羅馬的總會長還大得多，總會長本是唯一一個職位大過他的人。實際上，也沒有人有這個本事插手他的事務。

他於 1747 年接手管理島務時，發現財務狀況實在糟糕，便

向諮議們報告此事。他們驚覺茲事體大，便交給他尚方寶劍，讓他放手改革，相信他不會逾越法規。

拉法葉開始修補這個滿是破洞的經濟體系。教區有一些待租的房子，只是破舊得很，沒有人願意租來住。拉法葉把它們改建得很體面，又在河邊蓋了十二棟新的；租金給他帶來一筆豐厚的收入。

初試啼聲大獲成功，讓拉法葉大受鼓舞。他野心變大，著手兩個更冒險的計畫：一個在鄰近的瓜達露佩（Guadeloupe）島，另一個在多米尼克（Dominique）島進行。

他是建商同時也是個農夫。土地如果沒有收成便成為消耗品，徒然浪費金錢，現在卻有糖、咖啡、豌豆和可可等豐富收成。

像其他農民一樣，他每年把大約四分之三的收成賣到法國去，由南特（Nantes）市、波爾多和馬賽的代理商經手，然後馬賽的代理商會把貨款交給傳教區在巴黎的財務薩賽（Dominique de Sacy）神父，薩賽負責用這筆錢付拉法葉送來的帳單。這些帳目都記在馬丁尼克聖伯鐸（Saint-Pierre-la-Martinique）會院的帳目下。這是非常重要的細節。

因為殖民地上許多想回法國的法國人，需要把錢轉回祖國，拉法葉樂意幫他們的忙。他在馬丁尼克收了他們的錢，然後給他們一張匯票，他們持此單據在巴黎兌換現金。拉法葉出於天性，樂意隨時幫助有需要的人。這樣的方式運作順暢，透過他匯錢到法國的人不斷增加，落在薩賽桌上的匯票數目也跟著像雨點般增加。終於有一天，薩賽再也應付不了這個沉重的工作，請求拉法葉把這個工作交給里昂士兄弟暨古夫爾公司（Messrs Lioncy Brothers and Gouffre）。這樣的安排從 1753 年開始。

拉法葉的聲望如日中天，大家公認他是殖民地上最有頭腦的

人，是風島（Isles of the Wind）最幸運的農夫。「從 1748 年到 1753 年，拉法葉的成功與他的膽識相稱。」祖利（Créteineau-Joly）表示。

第一次遇到困難

拉法葉也會樹敵。心懷不軌的人匿名指控他進行殖民地禁止的國外商業行為，海軍大臣胡業（Rouillé）伯爵要查辦此事。他在 1753 年 5 月 23 日寫了一封信給馬丁尼克的總督，向他查詢有關這方面的細節。總督的回覆說盡這位耶穌會士的好話，只是他的報告沒能完全說服這位大臣；胡業在 7 月 20 日要求總督遣送拉法葉回巴黎，讓他本人說明自己的作為。

在總督抗議後，拉法葉還是動了身，並於 1756 年 1 月抵達巴黎。不管是耶穌會的眾長上，還是拉法葉，還是馬丁尼克的總督，都沒法讓海軍大臣滿意。最後，經過多次漫長的討論，又與耶穌會總會長無數次書信往返後，大臣終於批准讓拉法葉回去。1756 年 5 月，拉法葉回到馬丁尼克。

指控拉法葉有不合法的商業行為雖然不實，不過，難道拉法葉沒有做過了頭，不夠謹慎嗎？他是否太過輕率？這些問題沒有答案。

及至回到馬丁尼克，他發現情況一團糟。前後三個颶風把他的蔗園摧毀淨盡，他蓋的房子也嚴重受損。不過，他並不因此而洩氣，一如往昔他又渾身是勁地開始工作；他修補該修補的、重建該重建的，把精神放在因離開而疏忽已久的莊稼上。

噩夢開始

在拉法葉努力修補已成的損害時，他又遭到新的打擊。英法

兩國在 1755 年 5 月中正式宣戰。不過，英國的敵意行動並不是從那一天才開始，在這之前他們已有一次劫持了正要駛入波爾多港的兩艘船。它們為拉法葉運載了價值六十萬里佛（livre）的貨物。

真是禍不單行。1756 年 2 月 19 日，里昂士兄弟暨古夫爾公司宣告破產。在此同時，拉法葉在多米尼克鄉村的農場也因傳染病折損了十分之一的勞動力，使得他損失兩萬里佛的收成，並且得停止大部分耕作。

他沒有因此被打敗。為了償還債務，他運了幾船貨物去歐洲。第一艘到達阿姆斯特丹港，第二艘到達卡迪斯（Cádiz）港，之後是十三艘掛了荷蘭旗的船，可惜在抵達阿姆斯特丹之前全部落入英國海盜手中。

在法國，里昂士公司破產引起拉法葉在波爾多、阿姆斯特丹和卡迪斯等地代理商的戒心，也讓他的債權人大為恐慌。拉法葉的長上們也起了警覺心，紛紛自問如何能躲過這一劫。

失控

接下來的六年證明事情已無法挽回，因為沒有人能控制拉法葉。1756 年 9 月開始，法國耶穌會的長上們不斷嘗試派遣充分授權的神父到馬丁尼克。他們先後提名了五位，只有最後的一位——馬什（de la Marche）神父——終於在 1762 年到達馬丁尼克島。

他們也向拉法葉本人下令：一、沒有法國會省的准許，絕對不可承攬任何工作；二、繳交一份詳細報告給巡察神父及羅馬長上們；三、必須嚴格遵守薩賽神父從巴黎給他的指示。

拉法葉當時都在做些什麼呢？他切斷與巴黎及羅馬的所有連

繫，獨斷獨行，終至損失重大，債臺高築。不過，他仍毫無警覺心。他過度信賴自己的能力，又輕忽傳教區同僚的勸告，勇氣十足地投入一個他從未從事過的行業：經商。

他設立了藍沖卡迪亞貿易公司（Ranchon, Cartier and Company）。透過該公司，瑪利加朗特（Marie-Galante）的莫魯暨里昂士（Moreau et Lioncy）公司、多米尼克的朱達（Isaac Juda）和格拉納達的查普伊斯（Chapuis），會在他的控制下互相配合。這是第一步。

他繼續出售田地裡的產品，或者用它們來交換歐洲貨物；他向鄰近島嶼購買大批商品以獲取利潤。他透過第三者做買賣；他們是多米尼克的朱達、荷蘭島上聖歐斯大（San Eustaquio）的康士坦斯（Constance）、瓜達露佩的華倫泰和聖伯鐸的親信德斯卡（Dutesca）。他用非常低廉的價錢向法屬諸島買進貨物，然後賣到荷屬島嶼，也常常運到荷蘭或卡迪斯出售。

一位馬丁尼克官員向法國海軍大臣報告了這件事，大臣下令立即制止這些活動。拉法葉的同門弟兄也開始懷疑他，他們覺察到拉法葉經常無故失蹤。他在進行商業活動的謠言四起；開始時模模糊糊，逐漸言之鑿鑿。事情揭發後證實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拉法葉在做大宗買賣。不過他小心翼翼地隱瞞了所有長上、欺騙他們和他的弟兄，小心不留下絲毫犯罪證據。

宣戰

在法國的耶穌會神父竭盡所能要遏止這場惡夢。傳教區財務薩賽神父開始為拉法葉償債，甚至動用法國耶穌會的基金。

1756年4月16日，奈維爾（Pierre-Claude Frey de Neville）神父被指定為省會長。他與幕僚決定，法國會省不應為傳教區償還

債務，因此要中止這項給付。這是合理的決定，只是事後證明是致命的決定。薩賽神父於 1757 年開始停止付款給馬丁尼克傳教區的債權人，把他們轉介到聖伯鐸會院，或勸他們等到戰爭結束以後再說。

剛開始，那些債權人雖然抱怨和抗議，但沒有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到了 1759 年 11 月 19 日，格魯（Grou）夫人和她的兒子路易士·格魯（Louis Grou），到巴黎領事館按鈴控告薩賽神父；1760 年 1 月 30 日，領事館判他們勝訴。判決書上說：「既然修會的管理隸屬在總會長管轄下，被告有連帶責任付款給原告；如果他們不履行，官方將依法強制執行。」判決書立即公布，還附帶了一篇對耶穌會很不友善的前言。他們的意圖很明顯：促使債權人提高警覺，並試圖影響公眾言論。此時楊森學派人士也加入戰場，誹謗中傷的文章氾濫整個法國。議會、政府、公眾言論——以及最有勢力的龐巴杜夫人，統統聯合起來反對耶穌會。

侯爵夫人與公爵

國王路易十五本來可以扮演保護耶穌會的角色，事實上他也嘗試了。但他有性格上的弱點。他受制於兩個人物，即龐巴杜侯爵夫人波森（Jeanne Antoinette Poisson, 1721-1764），和雪塞公爵（Etienne François de Choiseul, 1719-1785），也是善維爾（Sainville）伯爵。這兩人常常左右他，很多事他都得讓步。

法王路易十五自 1745 年起就公開承認龐巴杜夫人是他的情婦。她美麗、聰明、有企圖心，在宮中成了最有勢力的人物；不但在宮中，在上流社會裡也一樣。1751 年她結束了與國王的風流韻事，不過兩人仍維持朋友關係。她說她之所以仍留在他身邊，是因為「國王有我在身旁才會快樂，他的事業才會成功。我是唯

一會告訴他真相的人，這對國王很有用。」耶穌會的告解神父從前一直反對她與國王的曖昧關係，現在仍然反對她繼續流連宮中。這讓她永遠不能原諒耶穌會士，誓言報復。

雪塞公爵欠龐巴杜夫人一份人情，因為她推薦他出任駐羅馬及維也納大使，後來又讓他當上外事部大臣。當上大臣後，他發現只要得到龐巴杜夫人的默許，自己凡事都可以作主張。龐巴杜夫人也樂得利用他實現自己的陰謀，他則利用她影響國王。

雪塞崇拜「啟蒙哲學家」，又捍衛楊森學派人士。他跟這兩幫人馬以及議會都痛恨耶穌會士，不過，他不願意站在檯面上，寧願在幕後操縱。

國王與議會

耶穌會神父們可以向國王的諮議會，也可以向巴黎議會上訴。修會處理類似事件時，傾向向國王的諮議會上訴，因為它同情耶穌會，最少大家是這麼想。巴黎議會則擺明反對耶穌會，正如楊森學派人士一樣，誓言要消滅耶穌會。可是出乎眾人意料，1760年5月1日一次諮詢會議上，省會長決定向議會上訴。他一定在想：既然我方明顯有理，判決自然有利我方，而議會的判決會將耶穌會士從偏袒自家人的污名中救出來。這真是個要命的決定，這等於自投羅網，對方正等待著粉碎耶穌會的機會呢！

議會並不急著審查這個案子或做出判決，因為國王的諮議會是可以提出異議的，貝爾島的馬歇爾（Marshall of Belle-Isle）是諮議會的一員，他尊重耶穌會士，一定會為他們辯護，但他不幸於1761年1月26日去世，而雪塞公爵接任了他的位置。現在沒有什麼好怕的了。

一切布置就緒，重要大臣和龐巴杜夫人的支持愈來愈有力，

而國王更顯得勢單力薄，於是議會在 1761 年 4 月 17 日開始採取行動。那一天，議會命令耶穌會長上們遞交一份會憲到法庭，說要查核這個組織結構是否符合會憲精神。其實議會真正想做的，就是一旦確認領事館的判決，他們便可以利用它讓民眾相信，他們是握有充分證據才判定耶穌會士有罪。

第二天一大早，蒙蒂尼（de Montigny）神父把一份會憲交給議會。事情如此倉促，國王根本來不及干預，雖然他很想幫忙。5 月 8 日，議會宣布裁決書，判定總會長及耶穌會須付里昂士兄弟暨古夫爾公司一百五十萬兩千里佛，另加損害賠償、利息及其他花費共五萬里佛。

之後，議會便把拉法葉的債權人完全置之腦後。每個個案都用以攻擊耶穌會憲章、信條或工作。7 月 8 日，議會指派委員會研究耶穌會的倫理及教條。

有一陣子，路易十五好似要從他的冷漠走出來，可是議會中一些精明的議員很聰明地阻撓了他，他的權威又一次遭受打擊。

最後一擊

現在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撓議會派人士得寸進尺了。8 月 6 日，他們發布了兩項規定：一是宣稱凡是教宗針對耶穌會所頒發的訓諭或聲明都視為不正當；一是禁止耶穌會收錄新會士、關閉它的所有學校、焚燬耶穌會士著作的二十四本書，因為它們「違反基督徒的倫理原則」。

皇后、皇太子、整個皇室家族，以及大法官同聲抗議；主教們出面為耶穌會緩頰；國王也嚇呆了。大家試了各種妥協方法，例如，法國耶穌會聲明放棄「誅殺暴君」教條並接受四個「加利剛條款」（Gallican articles）；接受法國耶穌會士與耶穌會實質分

離的要求。上面第二個方法是雪塞公爵於 1762 年 1 月 16 日向羅舍舒亞（Rochechouart）樞機提出的，卻被立即否決，因為這會使耶穌會分裂。就在那時，教宗克勉十三世說了那句名言：「讓他們保持現狀，或乾脆消失。」

1762 年 4 月 1 日，巴黎議會下令關閉法國殖民地所有學院；同月 23 日，議會沒收了修會所有的動產與不動產；8 月 6 日，宣布解散耶穌會，並剝奪它所有的權利；所有耶穌會成員必須放棄他們的房舍，並發誓不再住在一起，獨居時也不會按照會規生活，不會與總會長、長上、長上指派的人或任何其他住在法國的耶穌會士保持通信。

拉法葉被送上被告席

當耶穌會在法國遭到致命的一擊時，馬什神父則在馬丁尼克企圖力挽狂瀾。

馬什神父直到 1762 年才抵達馬丁尼克，一路上可說多災多難。他於 1761 年 7 月 26 日從阿姆斯特丹乘船出發，當船駛近打算停靠的港口聖歐斯大時，不幸被英國海盜劫持，海盜復把船遺棄在拉安提瓜（La Antigua）島。最後，它從拉安提瓜沿聖歐斯大、瓜達露佩和多米尼克前進。馬什因此得與拉法葉在這些島上的代理人一一見面，從而獲得拉法葉交易的一手資料。經過漫長的航程後，馬什終於在 1762 年 3 月 23 日來到馬丁尼克。

抵達後，他馬上告訴拉法葉：「我不是懷著敵意而來，我只想做一個徹底的調查，把四處流竄的謠言弄個清楚。我希望這次查訪有助於恢復你的名譽。」

在抵達馬丁尼克當天，他獲悉有一條船將於四天後開往法國。第二天，他召集一個會議，參與者是另外七位神父，他想知

道他是否應該讓拉法葉坐第一條船回法國，還是要再緩一緩。

他先問與會神父，他們是否確知拉法葉熱中商業活動。除了瓦魯（Valoux）神父外，其餘的人都非常確定，瓦魯與拉法葉是朋友。之後，巡察拿出一些證據：華倫泰、康士坦斯和朱達的筆記及證詞，還有拉法葉本人的信件的一些節錄。瓦魯神父只得點頭承認。馬什接著詢問他們，是否應該馬上把拉法葉遣送回國。這真是一個既複雜又微妙的問題，經過長時間反覆討論後，一致同意趕快把他送回歐洲。

馬什差人把拉法葉請來，當著眾人的面告訴他，他應盡快坐船回歐洲。拉法葉看來並無不悅。

接下來是緊張的對話。

馬什問拉法葉，是否曾經有長上授權他從事商業交易？他回答：完全沒有。

又問：「你知道自己過於熱中經濟活動嗎？」

拉法葉做了一個巧妙的區分，說自己沒有從事「世俗的商業活動」。

巡察給他看了證據。

拉法葉說：「我不再否認我做過了。你們要我離開，我樂意照辦。」

質詢就這樣結束，拉法葉單獨留了下來。他向馬什抱怨，不應以公開審訊的方式羞辱他；馬什說這是執行任務唯一的正式方式。拉法葉又抱怨說沒有給他充足時間，讓他解釋他從事的許多複雜事務，這些事務必將被擱置。最後他說，如果准許他多留一陣子把事情處理掉，三個星期內他一定離開。馬什沒有反對。

終場

這個延宕是錯誤的，拉法葉利用這段時間密謀反擊。他組織羣眾示威、施壓，莫名其妙的謠言、曖昧不明的恐嚇，接二連三接踵而來，情勢變得對巡察很不利。馬什寫信給總督說，拉法葉既然在島上沒事可做，就沒有繼續留在島上的必要。他還認為自己應當承擔償還拉法葉債務的責任。然後，他告訴拉法葉，他必須執行教會法典中明訂對從事商業行為的牧職或會士的罰則。1762 年 4 月 25 日他遞送了判決書，判決書上說：拉法葉神父，背著長上，進行為教會法典及耶穌會禁止的商業活動。巡察剝奪他所有的管理權，並停止他的教權，直至耶穌會總會長宣布赦免為止。

拉法葉毫不反抗的接受了，他「充滿悔意」承認有罪；不過，這可能只是一個意外，而非經過深思熟慮後的意願。

被停止教權對他的打擊最大，他還有臉面對歐洲的弟兄嗎？這個想法促使他做了一個決定。他於 5 月 25 日通知馬什神父：他要離開耶穌會。26 日他動身前往聖歐斯大，從那裡坐船到阿姆斯特丹。

他在阿姆斯特丹收到總會長宣告把他從耶穌會開除的信。他在阿姆斯特丹住了幾年，開始時靠著馬什在馬丁尼克給他的一筆錢過活，後來靠年金。不過到 1763 年底，當傳教區的產業被充公後，年金也中止了。

同一年，他得知土魯斯議會也強迫耶穌會士宣誓，誓言與巴黎議會規定的相同。他遂移居土魯斯，並於 1764 年，按照為「願意恢復公民身分及公民權的前耶穌會士」所擬定的誓詞，宣了誓。

恢復公民身分後，他恢復原來的姓氏，從此自稱為瓦萊特

（Antoine Valette），住在賀希給（Rességuier）先生在楓塞格（Fontxaigues）路底的房子裡。人們常見到他由一個男僕陪著散步。1767年9月起，沒有人再見過他。他於同年12月13日逝世。

狐狸與豺狼

兩股勢力圖謀毀滅法國耶穌會士：楊森學派人士和啟蒙哲學家們。楊森學派公開進行，啟蒙派暗中使力。楊森學派得勝樂了啟蒙派。耶穌會士因傲慢而自食其果，像麻雀落入圈套。不過，鳥被逮著了，啟蒙派人士卻開始後悔了，因為楊森學派人士變得太有權了。伏爾泰在1762年11月3日寫信給夏洛泰（La Châlotaie）說：「躲過狐狸卻掉入狼羣中，對我又有什麼好處呢？」

狐狸現在變成溫馴的綿羊。不過，在短短二十年內，當年興風作浪的，如今卻收割「法國大革命旋風」：不但獲得自由、平等與博愛，同時也接收屠殺、恐怖與斷頭臺。

3. 馬德里 1767： 忠貞不二的畢納德利 (José Pignatelli, 1737-1811)

不尋常的喚醒

1767年4月2日晚上，當瓦萊特在土魯斯享受他的黃昏散步時，撒拉哥沙（Zaragoza）耶穌會學校的文法老師若瑟·畢納德利神父，則在熬夜寫一篇講道詞，那是他應市內一位教士之邀寫的。次日清晨，管家修士逐個房間喚醒會裡弟兄。他來到畢納德利房門口，敲他的門時，裡面應聲說：「好兄弟，拜託去求院長讓我多睡一會兒，好不好？」

「沒有時間再睡了，整個學校都被軍隊團團包圍住，你只須向窗外望一眼就看到了。」

他說得一點都不錯。坎塔布利亞（Cantabria）兩營步兵和一小隊騎兵在午夜時分來到學校，占據了所有向外的通路。五點整，皇家大臣重重敲打大門；門開了，他要求修士領他到院長的房間，他要傳達一項國王查理三世的命令。

命令指示：全體人員都得到餐廳集合，沒有一個例外。校園的鐘響了，所有人走出自己的房間，也有人到各處重複國王的命令：「到餐廳集合，到餐廳集合。」

全體人員到齊後，法官在助理及官兵的圍繞下，宣讀了驅逐令：

基於非常重要的原因，事關朕有維護人民服從、平靜和公道

的責任，以及縈繞朕心中種種急切、合理又不得已的理由，如今使用全能者賦予朕保護臣民、維護朕冠冕尊嚴的至高權力，朕決定驅逐在朕管轄下西班牙境內、西印度羣島、菲律賓羣島和其他相連島嶼上的耶穌會成員：包括神父與助手、發了初願的修士及願意追隨他們的初學生。在朕領域內耶穌會所有產業，亦都歸朕所有。

效率與保密

在撒拉哥沙發生的一切，同樣也在全西班牙其他一百二十多個耶穌會會院發生；同樣的時間、同樣的效率、同樣地保密、也同樣地布署了大批軍隊。受影響的耶穌會士在西班牙本土有 2,746 人，海外 2,630 人。

讓耶穌會士驚駭的目的完全達到了。耶穌會士知道自己被獵捕，但對迫在眉睫的命運，事先卻聽不到半點風聲。1 月 29 日，一個小小的諮議會同意了首席法官坎波瑪內斯（Campomanes）草擬的驅逐令；國王於 2 月 20 日在上面簽了字。耶穌會士開始受到不尋常的尊敬，阿蘭達伯爵截至目前為止，一直信守他對依迪亞機神父的請求，取消禁止耶穌會士在巴斯克各省向民眾傳教的禁令，且以出乎眾人意料的速度批准。他面貌慈愛又和藹可親，祈禱時更是謙虛又虔誠；大家都相信暴風雨已經過去，省會長們又信心滿滿地出門巡視自己的會省。其實他們被愚弄了。

深藏國王心中的種種理由

又有一個十足荒謬的指控瞄準耶穌會。事情的開始應從院長房間說起，他們在馬德里皇家書院院長的房間裡找到一本攻擊皇太后——耶穌會的忠實朋友——的小冊子，冊子的作者可能是葡

萄牙人，書中謠傳查理三世並不是菲利普五世的親生子，而是已故皇太后與阿爾貝羅尼（Alberoni）樞機兩人的私生子。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有一天，當大夥前往餐廳準備用晚餐時，看門的修士交給院長一捆紙，是一個訪客剛送來的。院長就請修士拿到他的房間去。他們還在用餐時，來了兩位法官，帶著一位公證人和多個目擊者。法官索取了所有房間的鑰匙，在整個房子作徹底的搜查，他們在院長房間裡找到那一捆紙，把它帶走了。那捆紙裡頭藏了那本下流的小冊子，還有一封模仿總會長利斯神父筆跡和簽名的信，信中有關於小冊子的指示。

這就不難明瞭國王為何耿耿於懷了。

雖然驅逐耶穌會士的官方決定如此倉促，它卻是醞釀了一段很長的時期，在查理三世統治那不勒斯時就開始了。那時滕努思（Tanucci）對他的影響極深。滕努思認為，國王的權利及責任在保衛他的領土，而耶穌會的勢力正威脅他的領土，所以必須將國家從危險的盲信組織中解救出來。

查理三世於 1759 年登上西班牙王位，當時就下定決心要驅逐耶穌會士，只要找到機會——比如一樁把反耶穌會的感情變成行動的戲劇性事件。1766 年的暴動就是一個機會。

西西里裔的艾士昆拉其（Esquilache）侯爵格里戈里奧（Leopoldo de Gregorio），是當時的財政部長。他的財經政策與外國出身，使得老百姓非常不歡迎他，糧食漲價更讓老百姓抓狂。他又頒布了一紙可笑的法令：不准百姓穿著傳統長斗篷或戴寬邊呢帽，而要戴法國假髮和三角帽。馬德里人氣瘋了，紛紛跑到街上抗議，把箭頭對準艾士昆拉其。他們襲擊他的住處，艾士昆拉其落荒而逃。國王也在暴動爆發前逃到阿蘭朱斯（Aranjuez）。事件發生時，有人看到耶穌會士在人羣中安撫老百姓。

事隔不久，有心人士把這次暴動歸咎於耶穌會反對國王。他們說：暴動不是因為民眾對艾士昆拉其和他的政策不滿，而是他們後面有一個危險組織在興風作浪。耶穌會開始被點名，傳說它處心積慮要換一個對它有利的政府。

不到一年，皇室諮議會就達成共識，要把耶穌會士驅逐出境。

伯爵與耶穌會

諮議會也決定委託阿蘭達伯爵波利亞（Pedro Pablo Abarca y Bolea）執行此事。伯爵是一個有鐵一般意志的軍官，後來被擢升為諮議會主席。他跟畢納德利神父有親戚關係，阿蘭達的女兒嫁給了畢納德利的姪兒。

若瑟·畢納德利 1737 年 12 月 27 日生於撒拉哥沙，父母雙方都是貴族，是最古老的那不勒斯及西班牙貴族後裔。父親是安東尼·畢納德利（Antonio Pignatelli），母親是芳濟加·蒙卡約（Francisca Moncayo）。這對顯赫的夫婦有八個孩子，最小的兩個是若瑟和尼古拉斯（Nicolás），都成了耶穌會士。母親於 1742 年，父親於 1746 年先後去世。最大的兒子若亞敬（Joaquín）繼承了母親的頭銜，成為福恩堤斯（Fuentes）伯爵。瑪利亞·芳濟加（María Francisca）——這個大家庭裡的唯一女兒——儼然成了兩個最小兄弟的母親。

畢納德利十五歲就加入耶穌會，在耶穌會士被驅逐時，他的長兄福恩堤斯伯爵是駐巴黎的大使。伯爵覺得應該向國王致歉，因為有兩個弟弟是耶穌會士。他寫信給國王說：「這是他們自己的決定，與我無關。不過，我可以把他們召回來，要他們好好反省自己的選擇。」

畢納德利的健康很差，經常吐血，1762 年在首祭上也吐過

血。學校因為他健康太差，所以只讓他教低年級的文法。不過他也做其他一些令人敬畏的工作，如幫助死刑犯，故有「絞架上死刑犯的神父」之稱。

放逐路上

4月3日，畢納德利與同伴們一整天都被關在餐廳及連接餐廳的通道裡，並在軍隊看守下度過一夜。第二天早晨，全體人員被押上一輛早在街上等候的馬車，準備到特魯埃爾（Teruel）去。一些好事的路人被警察隔離在一段安全距離外觀看。

一出城就遇到他們的學生。這些學生抄捷徑走在前面，他們藏在矮樹叢後躲過檢查，當車子接近時才跑出來與老師會面，揮淚送別。

畢納德利多年後回憶此事時表示：「在親戚朋友面前，我們還能故作堅強；可是面對學生們如此深厚的愛情，我們實在不能自己。」

一大批神父被武裝的衛隊押解著，這個景象讓在田裡工作的農夫以及沿途的村民都覺得非常驚訝。

一般說來，軍官們都會很尊敬神父，而且認為他們的部下也當如此，不過也有例外的。巴塞隆納皇家法院的一位法官洛里耶里（Don Miguel Lorieri），這次被指派為總指揮，負責安排撤離亞拉岡會省的532位耶穌會士。他對待這批會士可是非常嚴厲。他們在塔拉哥納（Tarragona）集合，準備在鄰近的薩洛（Salou）港口上船。他們住在初學院內，地方是很大，卻仍不夠用。洛里耶里不許他們到屋前平臺或花園裡，也不許使用一樓某些空間。他把他們關在一個小小的地方，方便士兵監視每一個人。他又按照4月19日接到的指示，詳細記下每個人的資料。畢納德利的

記錄卡上是這樣寫的：

「若瑟·畢納德利神父，生於撒拉哥沙，二十九歲，為安東尼·畢納德利與芳濟加·蒙卡約婚生子。安東尼·畢納德利生於那不勒斯，為神聖羅馬帝國親王；芳濟加·蒙卡約為福恩堤斯女伯爵、哥斯哥朱拉暨摩拉（Coscojuela and de Mora）女侯爵，生於巴塞隆納。神父在修會十三年，習哲學三年，神學四年，已發三願。不久前在撒拉哥沙教授一年級文法。他是神父。1767年4月21日在塔拉哥納會院簽到。」署名：若瑟·畢納德利，耶穌會士——洛里耶里——曼那荷姆沙（Menahermosa）——雷蒙·法比列咯斯（Ramón Fábregas），法院書記。

4月28日傍晚五點時分，洛里耶里在餐廳集合了全體會士。洛里耶里穿著法官的長袍，向全體宣讀國王的驅逐令。經過這個正式儀式後，他們就可以出發了。翌日傍晚他們被帶到薩洛，30日分別登上十三艘商船，另有三艘皇家海軍軍艦護航，巴塞洛（Antonio Barceló）船長是總指揮。5月1日，旗艦發出啟航信號——一聲炮響，船隊揚帆出發。（註二）

同會兄弟的護守天使

畢納德利一開始就扮演他扮演了一生的角色：堅定同會弟兄。亞拉岡會省那時做了一個不尋常的處置，就是賦與畢納德利特殊權力，要他擔負全力處理緊急狀況時的任務。畢納德利為人冷靜、愉快有禮、有氣質又和藹可親，無疑是流放中兄弟們的支柱與助力。海上的空氣和航行的不適，恰恰治好了他的病痛。他變得健康又強壯。他跟船長交朋友，船長常邀請他共餐，並准許他上別的船去安慰同伴。

這支小小的船隊經過馬約卡（Majorca）時，從巴利亞利（Ba-

learic) 羣島來的耶穌會士與他們會合；5月4日，他們朝席維塔維奇(Civitavecchia)前進；第三天遇到強風，只好回頭到馬約卡港暫避；9日風浪平息，船隊重新啟航，經過科西嘉與撒丁尼亞(Sardinia)中間的波尼法(Boniface)海峽；13日，席維塔維奇在望，那是教宗領土的港市。他們天真地認為，這下可以毫無困難地上岸啦！可惜他們錯了。

教宗克勉十三世聽到西班牙下令驅逐耶穌會士，並得悉被驅逐的會士將被送到他的國土上時，他的反應是：對前面一個消息，他表示遺憾；對第二個，他直接拒絕了。這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但他不接受既成的事實。不能上岸的消息傳到席維塔維奇市長那裡，他便下令把港口旁邊防禦工事上的大砲瞄準船隊，阻止它們靠岸。被流放的會士們只能遠遠地欣賞米開朗基羅設計的宏偉城堡。5月18日，天還沒亮，旗艦點燃一支火把代替一般的鳴砲，宣布船隊啟航。

「船民」

此後大約有一年的時間，他們成了真正的船民：到處被人拒絕，沒有人願意庇護他們。他們只好擠在貨船裡，從一個港口流浪到另一個港口。

第二十三日，船到了科西嘉的巴士提亞(Bastia)，一個受法國軍隊保護的熱那亞領地。巴士提亞總督馬博夫(Marbeuf)第一次接到准許他們上岸的命令時，堅決拒絕從命，直到又有新的命令下來才放行。巴士提亞局勢不穩，幾棟堪住的房屋擠滿了人，物資奇缺。船民們仍得留在船上，只是可以把船停泊在小小的港口裡，身處酷熱、污穢、跳蚤和鼠羣中。二十天後，馬博夫動了慈悲心，有限度地准許他們上岸。耶穌會士終於可以在早上

出來舉行感恩祭，晚上出來在岸邊及附近散步。他們被關在發臭的船艙裡已經有四十天了。

當西班牙其他會省的耶穌會士來到時，空間缺乏的問題更為嚴重。托利多會省的 516 個會士，於 5 月 20 日來到席維塔維奇；跟著是安德露西亞會省於 30 日、卡斯蒂利亞會省於 6 月 14 日來到，他們都被打回票，往巴士提亞航去。

來的人那麼多，讓馬博夫很生氣，不過他後來獲准把耶穌會士從巴士提亞轉送到阿亞丘（Ajaccio）、卡爾維（Calvi）和艾格尤拉（Algajola）等地安置。在巴士提亞港困了四十八天後，7 月 8 日日落前不久，巴塞洛的船隊在大批羣眾注目下，航向大海。由於巴塞洛的個性猶豫不決，不能決定該在卡爾維還是其他地方靠岸，於是他們在海上漂泊了好幾天；在經過與其他三支小船隊的指揮商量後，他選擇了阿亞丘。他們於是月 27 日抵達阿亞丘。（不久後，拿破崙於 8 月 15 日在該地誕生。）

他們找到的住所還不算太壞，不過他們在阿亞丘沒有停留太久。科西嘉人憎恨被熱那亞統治、繼續被法國軍隊管轄，於是，在德·寶利（De Paoli）將軍帶領下叛變。德·寶利將軍竭力保護耶穌會士，不過情勢不穩，戰爭一觸即發。在熱那亞的西班牙大使給巴塞洛船長一紙命令表明，如果耶穌會士不能留在阿亞丘，他可以把他們撤走，送到波尼法（Bonifacio），那邊能容納多少人就留下多少人，其餘的則送到熱那亞，到了那邊再看著辦。

8 月 25 日，巴塞洛不再遲疑，集合了亞拉岡會省的會士，告訴他們準備馬上離開。當天晚上他們從阿亞丘出發，並於次日相同時間抵達約六十哩外的波尼法。這支小小的船隊在慣例的歡呼後，下錨停泊。

一俟找到所謂的住所後，大家便陸續上岸，那時還不到 8 月

28 日。房子如此破爛，巴塞洛船長見了都忍不住掉淚，並公開宣稱說：他會把他們留在這樣的環境裡，實在是情不得已，因為這是上級的命令。1767 年 11 月 4 日，巴塞洛船長領著他的船回轉西班牙，把他的貨物——耶穌會士——留在波尼法。

熱那亞因為無力控制科西嘉人，便於 1768 年 3 月 15 日把島的權利售予路易十五；8 月 15 日是科西嘉島正式歸屬法國的日子。25 日法國大臣通知耶穌會士：他接到命令要再一次移動他們，接他們的船隻已經從托隆（Toulon）開出。

550 個從亞拉岡會省來的會士於 9 月 8 日分別乘坐五艘船離開波尼法。他們分別於 14 和 15 日到達卡爾維，與六艘載著超過 600 位卡斯蒂利亞會省會士、三艘載著 450 位安德露西亞會省會士的船會合。這樣子，他們成了一支有 1,600 人，十三艘船的船隊。托利多會省會士以後會在阿亞丘與他們會合。19 日船隊出發前往熱那亞，然後仍舊採用既成事實的策略把會士們分成小組，從熱那亞移送到一個在義大利境內離熱那亞不遠的小港口塞斯特里（Sestri），並按照指示馬上把他們移送到邊界的帕爾馬（Parma）公國，再從帕爾馬進入教宗國。一旦進入教宗國，教宗除了准許他們留下來外，還能怎樣？

9 月 30 日，亞拉岡會省會士第一批離開。

福恩堤斯伯爵採取行動

外事部大臣格里馬爾迪（Grimaldi）於 4 月 2 日，正式通知畢納德利神父的長兄福恩堤斯伯爵耶穌會士被驅逐的消息。伯爵當時很惶恐，直到 17 日才反應過來，隨即向國王表達他的悲痛與忠誠。同時按照「我必定服從」的嚴格規定，順從地把他寫給駐羅馬的西班牙大使以及兩個耶穌會弟弟的信函送交格里馬爾

迪，這樣，「閣下可以稟告王上臣的書信內容，王上亦可隨意處理它們。如王上同意臣寫信予舍弟，請示下。臣願勸導他們要理性，亦盼望知道他們的身體狀況。臣和舍弟將透過駐羅馬的大使、官方代理人傳遞信件。」

國王慷慨准許所求，伯爵的順命服從獲得讚許。福恩堤斯伯爵，西班牙駐巴黎的大使，與兩個弟弟之間的連繫隨即展開。

畢納德利兄弟在 1767 年 6 月底或 7 月初接到伯爵的第一封信，那時他們仍在巴士提亞。伯爵在信中勸他們離開耶穌會，許諾將向教宗請求把他們轉到別的修會，並求國王准許他們返回西班牙。伯爵也明白告訴他們：「我是不許與你們直接通信的，雖然我們是親兄弟。我要把信交給王上的大臣格里馬爾迪大人，先獲得大人的允許，而且在王上過目准許後，大人再把信給你們；大人可能把信交給駐羅馬大使阿普魯（Azpuru）蒙席，他會設法把信送到你們手中。」

這兩個弟弟在 7 月 8 日回了信，斷然拒絕大哥的提議。這封回信循著他們哥哥來信的同一路線，但方式卻不同：從巴士提亞到羅馬，到阿普魯手中；阿普魯交給在馬德里的格里馬爾迪，格里馬爾迪給羅達（Roda），羅達給阿蘭達，阿蘭達把信交到負責監督整個驅逐耶穌會士作業的特別委員會詳加審查；等到這個高高在上的委員會終於放行，才會把信交給收信人。

福恩堤斯伯爵不想再勸兩個弟弟了，但他並不因此而覺得難受。此後他運用影響力，設法讓兩個弟弟獲得好一點的待遇，也用金錢支助他們。1768 年 2 月 12 日他寫了一封信給另一個弟弟雷蒙（Canon Don Ramon）說：「我接到兩個弟弟 12 月 16 日的來信，他們正在波尼法，過得不錯。皮皮（Pepe）告訴我，他的身體從來沒有這麼強壯過，不過他倒沒提半句其他的情形。我將安

排王上的幾位專員幫助他們，王上已經答應我這事，我也寫了信給他們。」皮皮是若瑟·畢納德利的小名。

事實上，在巴士提亞，馬博夫伯爵準備遵從法國宮廷的指示，寬待皮皮及尼古拉斯二人，但兩人婉拒了他的好意。在混沌不明的情勢下，畢納德利扮演了省會長的角色，兼管找住所、養牛、找魚貨諸事。當他到塞斯特里為同伴找住所時，市長大方地提供自己的房子，畢納德利拒絕了，寧願住到當地醫院裡。兄弟倆只有在需要改善同伴的困境時，才會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畢納德利這個名字似乎處處通行。

一千六百人行軍

這支耶穌會士軍隊要通過一條唯一的、需要翻山越嶺的路，才能從塞斯特里到達帕爾馬公國。其實那不算是一條路。走完令人愉悅的平原後，前面就是無邊無際的山脈，山勢開始逐漸上升，直走亞平寧山脈（Apennines）。一路上只有狹窄崎嶇的石子小徑，又常常被陡峭的峽谷切斷。這 1,600 個趕路的耶穌會士分成幾隊，大部分衣衫襤褸，穿著像雜牌軍，乘坐不同種類的牲畜，大部分是瘦弱的、腳步仍算穩健的驢子。

畢納德利兩兄弟與第一批人在 1768 年 10 月 8 日離開塞斯特里。他們進入帕爾馬公國領土後，警察想拿走神父們的行李；不過一聽到有畢納德利神父在人羣當中，便打消了主意。其中一個趕忙通知當局，市長親自來見畢納德利，並向他致歉。

於是他們又可以重新踏上旅途。經過瑞吉歐（Reggio）和摩德納（Modena），到達教宗的領土波隆納。他們決定在費拉拉（Ferrara）安頓下來，那邊的聖座代表是畢納德利的堂兄弟。

這兩兄弟總是走在別人的前頭。他們第一個拜會的是聖座代

表：他們的堂兄弟方濟·瑪利亞·畢納德利。代表冷淡地接見他倆，竭力符合他的身分和情境。他小心地不做出任何動作或說出任何話語，讓別人解讀為他在教宗土地上接納西班牙耶穌會士。市長的態度就和藹多了，他答應幫他們找房子。畢納德利神父也不閒著，11月底就把亞拉岡會省的兄弟在費拉拉安頓妥當。

經過一番努力，終於如總會長之願，把同一會省的會士都安置在同一地方。卡斯蒂利亞會省及墨西哥大部分會士在波隆納附近；智利的在伊莫拉（Imola）；巴拉圭及其他會省的部分會士在法恩扎（Faenza）；托利多的在佛力（Forlì）；安德露西亞的在里米尼（Rimini）；哥倫比亞波哥大和厄瓜多爾基多（Quito）的在安孔納（Ancona）；亞拉岡的在費拉拉。總共是 5,376 人。

雖然西班牙皇室不斷抗議，教宗國仍是耶穌會士理所當然的歸屬。不過，皇室應該感到滿意，因為驅逐耶穌會士的任務算是完成了。

不，只能算是部分完成。還剩下最後一個目標，就是由教宗廢除耶穌會。

4. 羅馬 1773：

溫良的利斯

(Lorenzo Ricci, 1703-1775)

狼羣中的羔羊

1758 年 5 月 21 日，在風聲鶴唳、烏雲密布中，耶穌會全體大會選出利斯為總會長。他會是那個時刻的適當人選嗎？

「我會認為他是太平盛世時的好掌舵人，卻絕不會是風雨飄搖中的好舵手。非常時期需要非常手腕，需要絕不退讓的異常勇氣。」這是利斯一位好朋友柯多拉（Giulio Cordara）的想法。

利斯的另一位朋友德曼里尼（Tommaso Termanini）卻不這麼想。他認為：「利斯個性溫順忍耐、和易近人，行事透明、純真不假，天性有一點害羞保守，正好與敵人在外界宣傳的耶穌會及他的形象相反。」

有一點兩個人倒是意見一致：利斯是一隻被狼羣逼在角落裡的羔羊。他正像聖經所說的：「我打發你們像綿羊進入狼羣中。」當外界對耶穌會的迫害達到高峰、當耶穌會被控奸詐自大時，卻是一個謙卑單純的人帶領著它。

如果他缺乏鬥志，無疑是因為他缺少管理經驗。他一直在羅馬學院教授神學，又先後是羅馬修道院及羅馬學院的靈修指導神師。1755 年 12 月，剛當選的總會長仙度里昂（Luigi Centurione）指派他為耶穌會祕書長。利斯雖自稱不適任，不過仍然接受了，搬到當時是總會長住處的耶穌堂。

總會長的十字架

仙度里昂於 1757 年秋天去世，修會要選出繼任者。開始似乎沒有人想到利斯會出線；德國參贊林德納（Balthasar Lindner）是最可能的人選，可是他體弱多病。大家把注意力轉到副總會長帝蒙尼（Antonio Timoni）身上，可是他年歲已大，有六十七歲了。利斯是唯一的選擇了。

當利斯發現這個危機，就跑到耶穌堂的一個閣樓上祈禱，乞求天主拿走這個超過他能負荷的重擔。第一回合投票時，他的得票數比其他人都多，但未達到所需的絕對多數；第二回合時，八十七票中他得了六十三票，當選了。雖然心中極為矛盾，他還是接受了。他很清楚加爾瓦略山在前面等著。

當選後，他第一次針對耶穌會的缺點發表強烈聲明：「幾乎各階層的社會人士，特別是修道人，會對耶穌會起反感，都是因為我們的一些著作措辭驕傲自大。我們對別人不尊重，又狂妄自誇，不懂得謙虛。」這個大動作不禁讓人懷疑傳言他膽小如鼠是個謊言。他指責耶穌會士「集體驕傲」，真是正中要害。

另一些表態也顯示他並不默許耶穌會這些過犯。一次一位有名望的神父作內部勸諫，內容充斥稱讚耶穌會的浮誇之詞。利斯很生氣，把講稿從神父手中奪了過來，當場撕毀，並教訓他說：「這是你的勸諫應得的待遇。會規規定，我們的勸諫應著墨在服從、合一以及其他宗教德行上；主題應有助於會士靈修精進，而不是彼此在背上搔搔癢，假裝我們是聖人，無可指責。」

他是率直的人，否則來自敵人的沉重壓力和他自身的脾氣會讓他表現忍耐溫順，而不是積極反抗。他的確缺乏主耶穌推崇的蛇的機警，與普遍認定耶穌會士具有的狡猾性格不合。

利斯的加爾瓦略山

在利斯當總會長期間，各式各樣災難如脫韁野馬、排山倒海衝著耶穌會而來。他看到耶穌會士先後從葡萄牙、法國、西班牙、那不勒斯和帕爾馬公國給趕了出來。枝葉被斬下，主幹亦將傾倒，教宗對修會的壓制不遠了。

在巴黎的雪塞公爵出了一個點子：要波旁各王國一致行動，逼迫教宗克勉十三世下手廢除耶穌會。「賣給耶穌會」的教宗不屈服，他晚年為此受了不少苦。教宗的兩個城市，貝內文托（Benevento）和龐帝科佛（Pontecorvo），被那不勒斯的軍隊占領；亞味儂和維聶辛（Venaissin）又被法國人占走。1769年1月間，在一連串安排好的火爆會面中，西班牙、那不勒斯和法國等大使，蠻橫地命令教宗順從他們主子的緊急要求。教宗斷然拒絕，他寧願把雙手砍掉也不要壓制耶穌會。在一次與法國大使杜卑得（Marquis D'Aubeterre）侯爵會面後數天，這個頑強的鬥士在2月2日晚上，不幸死於心臟病。

接著下來是選舉新教宗的樞密會議，那是有史以來最不名譽中的一次。政治勢力毫不知恥地介入這次選舉，他們的條件不用說，擺明是要新教宗承諾廢除耶穌會。5月19日新教宗選出來了，是方濟會士甘加尼里（Lorenzo Ganganelli）樞機，稱號為克勉十四世。克勉十四世並沒明確答應，更沒有書面聲明他會廢除耶穌會；他只是暗示他會。

德曼里尼說：「耶穌會士獲知甘加尼里當選後，莫不感到涼了半截。當選舉結果在聖伯多祿大教堂陽臺公布時，現場許多人高喊：『幹掉耶穌會！』」但也有人懷念新任教宗在米蘭、波隆納和羅馬當神學教授時對耶穌會士所展現的友誼，自我安慰地認為

情況不會變得那麼糟。」

在這晦暗不明的氣氛中，大家都在等待一些揭開他的想法的信號，他也沒有讓大家等太久。

利斯與其他修會的總會長按照慣例前往拜見新任教宗，並向他介紹耶穌會。克勉冷淡回應，說會為耶穌會祈禱。這是五年半來利斯唯一一次晉見克勉十四世；他曾兩次要求謁見討論一些緊迫的事情，可是徒勞無功。

其他信號跟著來了，有斥責有嚴懲。例如，耶穌會轄下的所有機構，包括有名的羅馬修道院——利斯曾在那裡當過教授和指導神師——都遭宗座視察。這是準備驅逐耶穌會的詭計。德曼里尼認為這些視察是為廢除耶穌會鋪路，其他的人則把這些制裁行動解讀為克勉十四世企圖延宕或轉移波旁王室的目標。當然他失敗了，耶穌會的敵人準備作最後一擊。

日期近了

甘加尼里天生猶豫不決。當選為教宗後，他知道自己不光是波旁王朝的教宗，同時也是其他許多國家的教宗，而耶穌會在那些國家裡甚得人望，廢除耶穌會將意味著災難來臨。他要求國王多點耐心，給他時間。法國駐羅馬的大使伯尼斯（de Bernis）樞機很快發現，克勉在他必須跨越的壕溝前遲疑太久。

1769年11月30日，教宗採取了折衷的一步。他給查理三世寫了一封信，告訴國王他願意尊重國王的「職責」；他正在收集資料，打算草擬一份「雙方已同意的手諭」，這樣他可以正當地「採用陛下建議的聰明手段，以驅逐那些擾人不已的耶穌會士。」

克勉仍在運用拖延戰術。波旁王室和它的葡萄牙同盟決定用最後一招，迫使教宗躍過壕溝。當年因態度蠻橫無理，令人不能

忍受，被已故教宗克勉十三世趕出羅馬的葡萄牙大使艾瑪達（Almada）又回來了；能幹有活力的莫尼諾（Moñino）取代了辦事沒效率的阿普魯蒙席為西班牙大使。西班牙人與法國人分工合作：西班牙人扮黑臉，執著不讓半步；法國人扮白臉，勸教宗讓西班牙人一步。此外，伯尼斯爭取到教宗的告解神師布坦皮（Innocenzo Buontempi）的合作，布坦皮也是教宗的私人祕書和諮議。根據一位耶穌會編年史編者的說法，布坦皮是「教宗唯一的朋友」。伯尼斯常常把握機會與布坦皮交談，設法說服他，甚至賄賂他，還寫黑函恐嚇他，說要揭發他與教宗的一個親戚比士奇（Victoria Bischi）先生的關係。

莫尼諾於 1772 年 11 月 27 日發動最後一擊，布坦皮害怕不已。兩天後，當莫尼諾謁見教宗時，發現教宗的態度轉變，終被說服要解散耶穌會。12 月 15 日，布坦皮前往拜訪莫尼諾，建議他找塞拉達（Francisco Javier Zelada）蒙席草擬消滅（耶穌會）詔書。對此莫尼諾卻有所保留，因為塞拉達是耶穌會學校校友。不過他也沒有反對，他害怕再延宕的話，就會失去獲勝的機會。用來打動塞拉達的方法至為明顯，大家都知道塞拉達正為債所苦。

消滅耶穌會文告

有效率的大使一點也不冒險。在謁見教宗前把文件的重點都安排妥當，還準備了一份草稿（至今仍保留著）交給塞拉達。

這是一份結構巧妙的文稿。開場白引用聖經說明只是「種植與建造」是不夠的，有時還必須「根除或拆毀」，以表示作者的悲痛無奈。接下來是敘述部分，強調耶穌會一直是社會不和與意見衝突的主因，暗示耶穌會是麻煩製造者、不受約束、目中無人又叛逆成性。在這一段裡有一句決定性的話：「毀滅、消除耶穌

會。」總而言之，耶穌會沒有經過宣判就被消滅了。

我們可以預期塞拉達會採用莫尼諾的草稿，他還把作者捧上天呢！12 月 28 日，他把草稿拿給教宗看；教宗做了幾個小小的批註。1773 年 1 月 4 日，最後定稿放在克勉的桌上，他花了整整一個月閱讀、修改它。

2 月 6 日，西班牙大使抱怨教宗拖太久，並慫恿那不勒斯和法國的大使一起來表達不滿。教宗給他一份草稿抄本，請他寄到馬德里，由西班牙國王本人與法國、維也納、里斯本和那不勒斯各皇室溝通（利斯從他的家鄉佛羅倫斯大公國那裡得到消息）。各方反應不錯，甚至奧地利瑪莉（Maria Teresa）皇后也不反對，還希望藉此機會讓她的女兒瑪莉·安東尼（Marie Antoinette）與法國皇太子的婚事進行更順利。不過她也說，她不會容許教宗不限制地處置耶穌會的人員與產業。

她的簡短說明讓情況有了變化，事情又耽擱下來。5 月 18 日，教宗把修改過的文稿交給教廷特殊文書院祕書尼格龍尼（Negroni）樞機，請他把文稿改成文告樣式，以避免某些教宗害怕遇到的困難。

莫尼諾在西班牙大使館裡設了一個祕密的印刷所，他正迫不及待等著印這份文告。6 月 5 日他晉見教宗，教宗答應等尼格龍尼樞機把正本送來，就會盡快簽准。尼格龍尼於 6 月 7 日把正本送過來了。克勉細細地研讀了它，作了三點修正，但沒有在上面簽名。不過，莫尼諾和伯尼斯以為他簽了，便各自向政府通報。

莫尼諾於 7 月 22 日寫了一封恐嚇信給布坦皮。他說，耶穌會一天不被消滅，新的教廷大使就不會為馬德里接受，亞味農與貝內文托兩地也不會交還教廷。

最後通牒起了作用。布坦皮趕到莫尼諾那裡，告訴他可以先

把文告印出來送到馬德里。印刷於 7 月 24 日開始，28 日結束。莫尼諾把第一份交給布坦皮，請他「放到聖父腳下」。文告上面的簽署日期是 7 月 21 日，這是他和布坦皮協商的結果。

教宗可是保留著文告的原本，直到 8 月 12 日才把它拿出來交給尼格龍尼樞機，要他付印時加上日期，為 7 月 21 日。

草稿及文告上都沒有教宗的署名；只是在草稿上有表示認可的慣用字母 L，那是教宗的洗名樂倫（Lorenzo）的第一個字母。

教宗於 8 月 13 日成立一個文告執行委員會，委員會包括五位樞機和兩位諮議。全體委員答應不會向耶穌會洩漏半句。8 月 16 日是指定把文告付諸實行的日子。

有了這個輝煌成就，西班牙政府對有功人員自然報以重賞。塞拉達於 4 月晉升為樞機，獲賜兩個頭銜和八千金幣，他用這些錢償還了部分債務。至於布坦皮則獲得每年一千五百金幣的終身養老金；莫尼諾則被封為佛羅里達布蘭卡（Floridablanca）公爵，晉身貴族階層。

入獄

一切都在極機密中進行。耶穌會在 7 月 31 日慶祝會祖依納爵瞻禮，氣氛是不如從前隆重盛大。8 月 15 日，利斯接受了五個會士的終身願；16 日晚上約八時左右，文告執行人瑪才多尼奧（Macedonio）與阿爾法尼（Alfani）兩位蒙席，在兵士的護衛下出現在會院門前，他們要面見耶穌會總會長、參贊和祕書。一位公證人宣讀了宗座解散耶穌會文告，瑪才多尼奧詢問總會長是否接受。利斯表示，教宗的任何處置，對他來說都是神聖的，不須他同意，他尊重天主的安排。

第二天，8 月 17 日傍晚，有人通知利斯不可以住在已經不屬

於他的房子裡，並把他帶到英國書院。他在那裡接受第一次審訊，審訊由安德瑞帝（Andreotti）先生主持。安德瑞帝是蒙特西托里奧（Montecitorio）法院的犯罪學專家。另外還有一位公證人馬利亞尼（Mariani）先生。兩人都是誠實君子，他們領域中的佼佼者。

他們問了利斯許多問題。其中一個是：有否指定死後代理總會長人選？利斯回答說有，不過已經把字條毀掉，因為解散耶穌會一事使它變得毫無意義。那麼，選了誰呢？利斯考慮要不要說出來，因為他不曾向任何人透露過，即使是當事人；而且這是會內事務，跟法庭無關。可是他們逼問他，他只好坦白道出那是德國參贊龍白（Ignatius Rombergh）神父。結果龍白也被關到英國書院裡。

9月23日，利斯被移到教廷監獄聖天使堡（Castel Sant'Angelo）。另外五位參贊、耶穌會祕書、幾位曾經為耶穌會執筆辯護或可能為文辯護的神父也和他關在一起。

利斯被關的牢房還不賴，不過唯一的窗戶被封死了。開始時伙食豐富，只是很快就減了半，而且總是又冷又無味，使他的胃非常難受。冬天時，房間裡沒有生火，他冷得直發抖，牙齒不停打顫根本不能咬東西。一個身配刺刀的警衛整天在旁監視著他。

他被完全隔絕。雖然有馬利阿尼（Francesco Mariani）修士作伴，可是修士被禁止告訴他任何有關外界的消息，即使堡內的所見所聞也不能告訴他；參與彌撒時，也不可以和其他囚犯交談。有人問他身上有沒有錢，他說沒有，他們竟然毫無忌憚地在他身上胡亂搜索。

受審

審問持續進行，可是速度奇慢，一副能拖則拖的樣子。每次審問都只問三或四個問題，兩次審問總要隔個八天、十天、甚至二十天的。利斯請求加速審問，因為他把答案都準備好了，簡單明瞭，花不了多少時間的。但是，人家根本不理會他。

他小心地把所有問題與答案記著，並寫下來再三閱讀，記牢後，再把字條毀掉。他希望真相能大白，好保住耶穌會的好名聲。他找到一個合乎條件的人，就是塞吉（Luigi Segui）神父。塞吉是薩丁尼亞人，聰明伶俐。他從皮德蒙特來到羅馬，想找機會與利斯神父碰頭。

利斯神父被捕、被關在牢裡、被祕密審訊一事傳揚開來以後，塞吉神父十分忿怒。根據文告執行人之一阿爾法尼神父的說法：「根據審訊所得的極小部分結果，就足夠判囚犯被活活燒死的罪了。」阿多班特里尼（Aldobrandini）侯爵問他的親戚特拉吉道（Trajetto）樞機：囚犯們當受如此嚴厲的懲罰嗎？特拉吉道樞機回答說：「是的，侯爵閣下。他們的罪惡如此深重，我們的嚴厲比較起來，實在是太寬厚，太寬厚了！」奧斯定會總會長對整個祕密任務非常了解，裝作很惋惜的說：「我不知道仁慈的聖父將如何決定，我只知道這些人都該被定死罪。」

審問是為了要定這個前總會長的罪。利斯把偵訊的問題做了一份完整的記錄，總共有二十個問題，但沒有一個扯到犯罪，反而全部偏向與犯罪無關。兩個與犯罪一事比較接近的問題是：「是否事先得知解散行動？」和「有否把錢或物品藏在耶穌堂的隱密地方，或者授權別人這樣做？」利斯的回答是：「一無所知，只是聽到謠傳。」和「既沒有把錢藏起來，更沒有什麼藏寶

的地方。」

審訊完了後，好心的安德瑞帝離開一陣子。幾天後他回來了；有人告訴他，上次的審訊一無所獲，結果等於零。這無異把他當作一個一無是處的法官，令他感到非常困惑。一切又得從頭再起。這一次經過二或三次開庭才完成，問題與答案跟第一次絲毫無差，唯一的變化是每次詢問前及詢問後的禮節，以及最後的誓詞。

利斯要知道被囚禁的原因，可是不得要領。不過，安德瑞帝這樣跟他說：

「只要知道自己不是因犯了罪而被囚禁，你內心就可以感到平安；你可以從我從未問及你任何有關犯罪情節這一點，就可以明白。」

兩則死亡消息

克勉十四世於 1774 年 9 月 22 日逝世。聖天使堡的守衛企圖對囚犯隱瞞這個消息，不過沒有成功。一個犯人從一個值班兵士那裡得知；另一個則從打水婦人處聽到；然後所有人都因為聽到根據習慣敲起的喪鐘而知道了。喪鐘的聲音實在很大，恐怕連聾子都聽得到。有人嘗試向他們另作解釋：喪鐘是為法國國王敲響的，他在 5 月 10 日去世了。不熟識羅馬風俗習慣的陌生人可能會被矇騙，可是要騙那些明白人，門都沒有！利斯對這樣解釋的人說：「我知道我該相信什麼。我清楚我們的規矩，還有它的意義。」

克勉十四世的死亡可以編成小說。原因有二：一、他在 1774 年 9 月去世，正合華倫丹奴（Vallentano）一位婦人班慈（Bernardina Benzi）的預言；二、有人散播謠言說，教宗是被耶穌會的人

毒死的。雷佐尼可（Camarlengo Carlo Rezzonico）樞機試圖找出事實真相，請了多位醫生詳細檢查，他們一致認為教宗是死於敗血症。

碧岳六世於 1775 年 2 月 15 日被選出，繼克勉十四世為新一任教宗。這次樞密會議歷時四個月又十天，經二百六十五次投票。西、法等國仍沿用上一次的陰謀，而這次的口號是：新教宗不可以「否定過去既定的決策」，也就是說，不可以恢復才被廢除的耶穌會。

不管如何，碧岳六世表示要馬上釋放利斯，但吉羅（Giraud）樞機勸他，釋放不應「發自慈悲，而應出於正義」，應該經由把他關進牢裡的同一個調查團辦理此事。

教廷態度的轉變並沒有為關在聖天使堡的囚犯的生活條件帶來任何改善，反而變得更壞。利斯送了一份請願書給新的教宗，向他陳述事實。他主張自己完全清白，請求給他一紙判決書，告訴他被囚禁的理由，要不就還他自由。這份請願書沒有到達教宗手裡；它被攔截下來，因為它會讓執行文告的委員會成員蒙上污點。這些人認為利斯罪有應得，應死在聖天使堡裡。

1775 年 9 月，牢裡最後一批參贊被釋放出獄，只剩下將要死在獄中的利斯。11 月 13 日那天，寒風颳起，利斯著涼得了重感冒；第二天他病倒了；19 日在獄卒、他的祕書兼同伴奧蘭迪（Orlandi）修士、警官皮安撒（Corporal Pianazza）、二等兵埃貝爾（Ebel）、帕奇（Pach）、普舍爾（Pulcher）、艾格曼（Egremann）、披達詩（Pitarci）、李卜亞（Rebua）、比昂希尼（Bianchini）、費里（Ferri）、普利摩（Primo）和匹維利尼（Pivilini）、獄卒的手下卡米洛（Camillo）和比得魯秀（Pietruccio）等人前領了臨終聖體；其中卡米洛和比得魯秀兩人陪同神父把聖體

送到病人牢房。

在領聖體前，利斯作了動人的自清辯白，並表示信靠天主的仁慈公道。他事先已經把辯白書寫好，原文至今仍保存著。他於五天後辭世，時間是 1775 年 11 月 24 日，近午夜時分。

歷史性的追悼辭與墓誌銘

碧岳六世實在痛苦，因為一切已準備就緒，就等著釋放利斯了。委員會的人向他建議盡快祕密地埋葬利斯，不必有任何儀式。教宗不同意，他也不許殯葬彌撒就在聖天使堡的教堂，而要在佛羅倫斯的「國家」教堂聖喬凡尼（S. Giovanni dei Fiorentini）大教堂舉行，因為利斯是佛羅倫斯人，而且葬禮場面要莊嚴隆重。委員會諸公還想說服他，至少不要開棺供人瞻仰遺容，這樣就不會有蜂擁而至的好奇民眾。教宗把這個建議也否決了：

「不可以，我不希望別人說我在堡裡處決了他，在他死後又意圖隱瞞事實。」

於是在 25 日傍晚，利斯遺體被移送到離聖天使堡不遠的聖喬凡尼教堂，停放在那裡直到 26 日上午，供人瞻仰。26 日是主日，正好聖伯多祿大殿有列真福品的盛大儀式，許多觀禮者順道到聖喬凡尼教堂瞻仰利斯的遺容。

殯葬彌撒確實非常莊嚴隆重，追悼辭更是可圈可點。德曼里尼形容「這是近年來最美妙動人的一篇講詞」。一位道明會士也這麼認為。這篇追悼辭被印了又印，由一位布雷斯勞（Breslau）的耶穌會士到處分送。布雷斯勞是解散令效力未及的地方。（註三）

利斯曾表示希望被葬在耶穌堂，與他的前輩們在一起。那天晚上，他的靈柩在三輛馬車跟隨下，被運送到耶穌堂。

嚴重挫折耶穌會的打擊行動早在中國展開，掃蕩耶穌會的第

一聲號角在中國已先響起，歐洲的回應算是慢了一步。所以，滅絕耶穌會的墓誌銘應該到中國去尋找，在基督教世界最邊緣的、耶穌會傳教活動所及的地方去找。這樣一個墓誌銘是在 1835 年由法國遣使會士孟振生（Martial Mouly）主教，在北京城郊一所房子的牆上發現的。孟主教看了碑文後，忍不住熱淚盈眶。碑文是這樣寫著的：

因主耶穌之名，
阿們。
曾經長久屹立不搖，
終究禁不起一次又一次的
狂風暴雨，
頹然倒下。
旅人呀！

請停下來，讀它一讀。

請花幾分鐘，想一想人生的無常。這裡躺著的是多位有名的耶穌會法國傳教士。當年會士們以純潔無私的心遠走他鄉，傳播福音、教導人們敬拜真神。他們在辛苦勞累中，努力超越人性的軟弱而仿效耶穌。他們就是以耶穌的名為名，幫助近人，過著有德行的生活；所作所為都是為了眾生，因而贏得眾生。兩個多世紀以來，它歷經繁榮，為教會帶來不少殉道者及信仰堅貞者。我，錢德明（Joseph-Marie Amiot），偕同同一修會的法國傳教士，在中國大清帝國的庇護下，運用我們嫻熟的藝術與科學，使天國福音得以廣傳。在充斥假神的皇宮裡，我們法國教會散發著莊嚴的真光。我們眾人在這墓園裡，懷著哀痛逾恆的心情，為我們摯愛的弟兄，豎立了這塊紀念碑。

羅馬 1773：溫良的利斯

旅人呀！走吧！
繼續你的旅程。
為死者慶幸，為生者哭泣，
為生者死者祈禱。
驚嘆吧！
靜靜地。

主曆 1774 年 10 月 14 日，乾隆 20 年陰曆 9 月 10 日。

註一：行刑的現場很悲慘。他們在貝倫廣場豎起一座十八英尺高的高臺，一大早就有軍隊及羣眾圍攏在四周。第一批上去的是阿維羅公爵的僕人。他們被綁在一個角落裡活活燒死。然後是達佛拉男爵夫人。她衣不蔽體，一根繩索套在脖子上，但仍不失莊嚴鎮靜。一個行刑人想輕輕地撩起她的裙子，好綁住她的腳，她卻斥責他：「住手！不要忘記我是誰。即使要殺我也別想碰我。」那人趕緊跪下求饒。她脫下戴著的戒指，遞給他說：「拿去吧！這是我唯一的東西了。好了，做你該做的事吧！」她跪下，彎腰把脖子擱在架子上，領受了那致命的一擊。跟著是她的丈夫和子女（最小的還不到二十歲）、女婿，還有幾個僕人，他們經過百般凌虐才被處死。最後是阿維羅公爵。他被綁在一個輪子上，身體用破布覆蓋著。他被賜不必死，不過遭受長時間的酷刑拷打，痛苦的嘶

噓聲響徹整個廣場。最後，執刑人在刑具上放了一把火，轉眼間一切都焚燒淨盡。輪子、斷頭臺、屍體都被丟到太加斯河裡。

註二：每個耶穌會省的會士都有指定登船的地方：卡斯蒂利亞會省的在桑坦德；安達露西亞的在弗龍特拉（Frontera）的赫雷斯（Jerez）；托利多的在卡塔赫納；亞拉岡的在塔拉哥納。

註三：里斯葬禮上的追悼辭在 1776 年出現許多版本，都是從德文翻譯成義大利文。根據德曼里尼的說法，文章的第一段與喬凡尼教堂道明會神父所用的一樣，其風格及遣辭用字是典型的義大利式，所以應該不是源自德文。此外，追悼辭可能是集體創作，靈感來自死者的遺稿，而且是由一位耶穌會士而不是道明會士執筆，因為朗誦人說作者曾是里斯的屬下。追悼辭以感謝收留被驅逐的耶穌會士的國王為結束，是要誤導政府當局，讓他們相信追悼辭來自普魯士。

參考資料：

VARIOUS AUTHORS: *La figura storica e l'opera sociale e religiosa di P. Gabriele Malagrida S.J. nel Brasile e nel Portogallo del settecento* (Como, 1996) .

ROCHEMONTEIX, Camille de: *Le Père Antoine Lavalette à la Martinique* (Paris, 1907) .

SAINT-PRIEST, Cte. Alexis de: *Histoire de la chute des jésuites* (Paris, 1846) .

EGIDO, Teófanos: *La expulsión de los jesuitas de España* (*Historia de la Iglesia en España*, dirigida por Ricardo García-Villoslada, Madrid 1979) .

MARCH, José M.: *El restaurador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Beato José Pignatelli y su tiempo*, vol.1º (Barcelona, 1935) .

TERMANINI, Tomaso: *Vita del R. P. Lorenzo Ricci* (Unpublished. Romano: Jesuit Archives, Vita 91) .

CORDARA, Giulio: *De suppressione Societatis Iesu*, 2 vols. (Padova, 1923-

1925) .

CARAYON, Auguste: *Le Père Ricci et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1773*, in *Documents inédits concernant la Compagnie de Jésus XVII* (Poitiers, 1869) .

DE ALDAMA, Antonio: *Cómo se escribió el Breve "Dominus ac Redemptor"*, Quaderni CIS, *Spiritualità Ignaziana, Conferenze 1972-1973* (Rome, 1973) .

Orazione funebre recitata in Breslavia nei funerali di Lorenzo Ricci ultimo Generale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celebrati nella chiesa della stessa Compagnia. Seconda edizione. MDCCLXXVI.



III
冬眠

「必須根除耶穌會！」不過，耶穌會並沒有被完全根絕。有一枝幹仍留下來，它發芽、成長，慢慢又發展成一棵大樹，回復當年曾有過的興盛。

那當然是一個偶然的歷史背景使然，不過更重要的是埋在地底的頑強生命力；它只不過在冬眠，一有機會便冒出新芽，不折不扣地再現它的生命力。它又重生了。

這一段歷史的主要人物是兩位俄羅斯君王，他們支持那些大難不死者；再來就是兩位耶穌會省會長，他們超越重重障礙，努力把船駛進港口。

1. 寒冬餘生： 契尼維茲

(Stanislaw Czerniewicz, 1728-1785)

女沙皇

凱薩琳二世 (Catherine II, 1729-1796) 出身德國家庭，本名為蘇菲亞 (Sophia Frederica Amalia von Anhalt Zerst)。她被選為彼得大公爵夫人後，便致力學習俄文，浸淫俄羅斯文化，信奉東正教，並取聖名為凱薩琳娜 (Catherina Aleksievna)。她完全認同她的新祖國；成為女沙皇統治俄羅斯後，她讓俄羅斯向西方開放，並大力推動教育。雖然是婦道人家（或許正因為是婦道人家），她可是用鐵腕統治國家，推行政策時更是冷酷無情。

1772 年 9 月，奧地利、普魯士與俄羅斯三分波蘭帝國，凱薩琳占領了它的東部，也就是白俄羅斯。白俄有九十萬天主教徒，東方禮儀及拉丁禮儀都有；另有 201 個耶穌會士。同年 12 月 3 日，她不顧教宗的權威，自行成立一個涵蓋整個俄羅斯的拉丁禮儀教區；次年 5 月 23 日，復指定西斯坦斯維茲 (Stanislaw Sies-trzencewicz) 為第一位主教。

女王在波蘭還沒被瓜分前就認識一些耶穌會士。梅雅 (Christian Mayor) 神父是國際知名的天文及地理學家，1769 年在聖彼得堡曾是女王的座上客。1772 年秋末，三位波洛茨克 (Polotsk) 學院的耶穌會代表來到皇宮，聆聽女王的聖諭。由於耶穌會士對教育貢獻良多，凱薩琳早就改變態度，對他們尊敬有加，並要保護他們。這是她在第一次會面中對他們的承諾。

1773 年 10 月，解散耶穌會文告頒布後兩個月，凱薩琳頒布詔令，公開自己保護境內耶穌會士的決心。她同時宣布，凡越過俄羅斯邊界的耶穌會士，都可以獲准進入俄國。這位為俄羅斯「啟蒙」的女沙皇，野心勃勃要以教育提升俄羅斯的國力。她要利用耶穌會士的學識達成計畫，這是她經常舉出樂於收留耶穌會士的理由。

契尼維茲

女王的決定讓被保護的耶穌會士內心掙扎不已。根據監督文告執行的樞機主教委員會的決定，解散耶穌會士的命令必須先予以公布，然後由每個教區的主教執行。立陶宛與白俄羅斯（在凱薩琳的統治下）的主教則命令教區內的耶穌會士不得擅自離開崗位。

耶穌會士們知道，要文告付諸實行，必須先有主教的正式頒布令，但是很多人屈從於教宗的意願，不等主教下令就離開耶穌會。契尼維茲就是在這樣的情景下登場。

「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既活潑又冷靜，自信又自制，固執又有禮，敏於行動又知所進退。」英格洛（Inglot）表示。從 1759 年到 1768 年，契尼維茲一直擔任波蘭參贊科力奇（Kaorl Korycki）神父的祕書，1769 年起則轉任波洛茨克學院院長。

1773 年 10 月 25 日，馬洛維亞（Mazovia）省會長指派他為俄羅斯統治下的會省的代理省會長。他上任後，即面臨一個非常嚴重的情況：會省裡許多會士已經變節，主教們維持現狀的決定讓出走的事件多少有些節制，但還是層出不窮。1773 年 12 月，契尼維茲被迫驅逐了二十六個會士，次年又驅逐了二十七個，理由是「背叛罪證確鑿」。

基本問題在於他們必須顧慮教宗的意願嗎？即使解散令還沒有合法公布；那麼，他們該離開耶穌會呢，還是在合法的情形下，留下來？

新上任的代理省會長為此召開了一次諮詢會議，結論是應該維持原狀，因為文告還沒有正式頒布，所以離開修會是不合法的。這樣做並沒有背叛教宗，事實上，契尼維茲曾多次嘗試透過不同管道，想從政府那裡取得實施教宗解散令的准許；可是女王殿下不准，並且要他放棄這個想法。現在他只好朝向將他們的處境合法化的方向努力了。

從容忍到默許

對驅逐耶穌會士一事，從教宗以降，教會各層級的態度都很曖昧。譬如說，在 1774 年 6 月 22 日，文告執行委員會主席柯西尼（Corsini）樞機，寫了一封信給白俄羅斯的主教，催促他實施教宗的指示，卻在同一信中准許他任用耶穌會士。甚至有人說，克勉十四世曾私下致函女王，同意讓耶穌會士繼續留在白俄羅斯為教會服務。契尼維茲於是這樣定位他的職責：「教宗不可能不知道文告在白俄羅斯一直沒有執行，可是他從未告訴過我們他希望我們怎樣做，我們只好把他的沉默解讀為應該維持現狀，直至接到新的指示為止。」

當碧岳六世於 1775 年 2 月 15 日被選為新教宗時，契尼維茲認為走另一小步的時機到了。10 月 15 日，他遵循從聖天使堡出來的前波蘭參贊的勸告，透過熟識的雷佐尼可樞機晉見教宗，請求教宗讓他們知道，他希望他們怎麼做；如果維持現狀，就請他准許他們接受從其他國家來的前耶穌會士為新成員。他得到的答案卻是莫測高深的。事實上，由於（西班牙）查理三世個人強烈

反對耶穌會，也不可能有別的答案。答案雖沒有表示明顯讓步，卻暗示了默許。雷佐尼可的助理，一個前耶穌會士，寫信給契尼維茲時分析說：這是一個「高明的答案」，少說少錯呀！

契尼維茲在 1776 年體認到，光靠他現有的 145 個會士的人力，不足以應付會省的工作。建立新的初學院是首要之務，那卻意味著改變現狀。這一次他沒有去找教宗，而直接去找女王；她很支持他的想法，並把這個想法推薦給白俄羅斯主教。

羅馬正好也完全授權西斯坦斯維茲，讓他全權管理他轄下廣大教區的會士，並「把耶穌會士看好」。不可測的教會好像又在玩把戲。出乎所有人的預料，西斯坦斯維茲利用他的新職權，在 1779 年 7 月 11 日准許耶穌會成立初學院。

消息傳遍了整個歐洲。「真丟臉！」國務卿帕拉維西尼（Palavicini）樞機大聲抗議，教廷大使要求撤銷此議。凱薩琳二世再一次穩住了局面，願意肩負全部責任，並聲稱已授權給主教。

初學院於 1780 年 2 月 2 日隆重揭幕，有 4 個初學生。很快又增加了 6 個，以前出會的耶穌會士的入學申請書開始從全歐洲各角落像雪片般飛來。限於空間缺乏，以及氣氛仍緊張，契尼維茲不得不限制錄取人數。

按修會常規需定期召開修會大會。這一次大會在 1782 年 10 月 11 到 18 日舉行。契尼維茲在會中向大家說明耶穌會在白俄羅斯的現況，以及在這種不合常規的情況下採取這種對策的合理性。10 月 17 日他被選為終身代理總會長，執行總會長的職務，直到修會復興選出新總會長為止。

各種使徒工作開始步入「常規」。他們推動教育與宣講工作，在耶穌會的堂區裡，也在一般平民傳教的工作中；在白俄羅斯，也遍及廣袤俄羅斯帝國的南邊和東邊。

明顯同意

凱薩琳二世還有許多事情要與教廷商量，便於 1783 年 3 月派遣前耶穌會士賓尼斯拉斯基（Jan Benislawski）到羅馬進行洽商。其中一個要求是讓耶穌會士在白俄羅斯合法化。碧岳六世口頭同意了，連續三次說：「好！好！好！」明顯表示他很高興地接受了。

得到教宗的同意後，在白俄羅斯的耶穌會不再只是一個會省或副會省，而是有自己的管理層級與結構的獨立個體，雖然當時他們只有 178 人。

契尼維茲在 1785 年 6 月 20 日去世。繼任者先後為：蘭基維茲（Gabriel Lenkiewicz, 1785-1798），嘉萊（Franciszek Kareu, 1799-1802），和格魯勃（Gabriel Gruber, 1802-1805）。

凱薩琳亦於 1796 年 11 月 17 日去世，她的兒子保羅一世繼承王位。保羅為人高深莫測，且個性矛盾，又恨他的母親，所以大家都很擔心他會改變凱薩琳對耶穌會士友善的態度，一如他為了表示反對母親而改變了許多她當年的政策一樣。

1797 年新的教廷大使里特（Lorenzo Litta）掌管教廷大使館，並向俄羅斯國王呈遞到任國書。他本來是反對耶穌會的，後來卻改變態度，請求教宗馬上復興俄羅斯耶穌會，作為復興全世界耶穌會的第一步。

碧岳六世當時已從羅馬逃亡到佛羅倫斯，而且抱病在身。他的祕書馬洛帝（Giuseppe Marotti）找機會把陳情書遞上，並在 1799 年 3 月 2 日正式告訴里特：俄國沙皇可以向教宗申請承認他國內的耶穌會。

這兩個明確的動作卻只是口頭上的同意，正規的法律程序是

不足夠的，還需要書面的正式同意書。不過，事情已漸露曙光。

耶穌會士、總主教、沙皇

困難又突如其來。大體而言，沙皇是延續著女沙皇的宗教政策的。不過他在加冕前，在 1797 年 2 月 26 日，已做了一個實質的改變。他設立了天主教部門，是處理教區事務的最高權威。這個部門將附屬於早已存在的正義學會（College of Justice），該學會由一新教徒海金（Charles Henry Heyking）男爵領導。西斯坦斯維茲不能接受這樣的依存關係，極力反對；他終於爭取到天主教部門完全獨立，而他也成為該部門的主席。

還不僅如此。〈俄羅斯帝國境內羅馬大公會教堂與修道院管理辦法細則〉於 1798 年 11 月 14 日頒布後，所有修會都將置於主教權力管轄下，主教有權指派修會長上。此時需要一個堅決又有技巧的人為修會爭取豁免權。這個人就是格魯勃。

格魯勃是維也納耶穌會士，於 1786 年在波洛茨克重新加入耶穌會。他是數學家、畫家、內科醫生、牙醫、建築師和音樂家。他第一次與保羅一世會面是在 1797 年，保羅那時正巡視各省，來到耶穌會在奧沙（Orsza）的學校。格魯勃陪他到處參觀。他的幹練與純真有禮，令國王印象深刻。修會選舉時，嘉萊神父被選為代理總會長，格魯勃則是被選出的四個參贊之一。他被派駐守聖彼得堡，而不是留在波洛茨克與總會長在一起。箇中用意甚明，就是希望有一個能幹的人在京城辦事。格魯勃並不向外尋求接近國王的管道，他不能隨便相信別人；不過他的正直與獨立贏得了國王的喜愛，認為他是上上之才。他又全心追隨修會的理想、忠於長上，國王甚為中意。

與國王接近後，他的樸素與才華贏得國王的喜愛——他甚至

為國王調製可口的「維也納式」巧克力，國王好像還挺欣賞的呢！

事情此後有了驚人的發展。總主教西斯坦斯維茲因失寵而引退，教區事務的管理與天主教會部門主席一職由助理賓尼斯拉斯基代理。1798 年訂定的規則於 1800 年 12 月 11 日經由一個條款修正；該條款的名稱為：〈國王陛下關於羅馬大公教會教士認同要點〉。它恢復了修會的全部豁免權。

保羅短暫統治俄國期間，天主教會獲得復興。他不干預教會的事務；也不像他的母親凱薩琳二世把所有政策都指向俄國的獨立自治。他對碧岳六世的心意非常真誠，這是有事實可以證明的：當他得知碧岳將被逐出法國，便邀請他到俄國來。他也竭力促進天主教與東正教復合。有一次他對格魯勃說：「我可是懷著一個天主教徒的心呢！」這個充滿矛盾的人可沒有半句虛言。

宗座同意文告

直到 1799 年 6 月，格魯勃才敢建議沙皇向教宗要求正式同意復興俄國耶穌會。保羅接受這個建議，只是碧岳六世在那年 8 月 20 日夜間去世了。繼任者為碧岳七世，於 1800 年 3 月 14 日選出。耶穌會的復興問題在樞密會議中被提出，只是未有定案，留待新教宗決定。

格魯勃技巧地採取步驟。俄國國王請他統籌立陶宛、保度利亞（Podolia）和沃利尼亞（Volinia）等地的教育工作。他接受這個委託，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要先得到復興耶穌會的正式准許，這也是人力來源的保證。

保羅於 1800 年 8 月 23 日寫了一封簡短的私人信函給碧岳七世，請求「聖座正式批准」俄羅斯帝國耶穌會的存在權。在答應這個請求之前，教宗作了最後一次嘗試，爭取西班牙國王查理四

世（1788-1808）的默許，查理拒絕他的要求。碧岳七世便不再理會他，自行在 1801 年 3 月 7 日頒布了〈大公信仰〉（*Catholicae Fidei*）文告，正式承認耶穌會在俄羅斯的存在權。

教會正式同意耶穌會存在於俄羅斯，但不是同意它是一個新的修會。這個動作有兩個後果：一是申請加入耶穌會的信函如雪片般飛來；一是大大激發了傳教的動力。憑著這股內外互動的力量，耶穌會在白俄羅斯領受很多，同時也付出很多。

格魯勃一直享有沙皇的寵愛。他不是沒有遇到過困難，不過都能機智地一一克服。前景看來一片光明。可惜的是，1801 年 3 月 23 日晚上，沙皇被謀殺，一切成果又毀於一旦。

2. 血洗法國

大火

耶穌會被解散的時期正好與法國大革命（1789-1799）及拿破崙戰爭（1800-1814）同期。或說：當初如果沒有解散耶穌會，也許就不會發生法國大革命，歷史就會重寫。這只是馬後砲，是沒有意義的。不過，如果說解散耶穌會後，使得本來可以緩和與分散火山爆發威力的力量消失，卻多少有一點道理。

法國大革命的確是一次火山爆發，它開啟了現代民主，它帶來自由時代，可是它又造成多少死亡與動亂！

我們關心的是其中兩次動亂：一次是「小恐怖」，發生在1792年的夏秋兩季，被拘留在巴黎各監獄中的犯人遭大屠殺；另一次是「大恐怖」，發生於1793年9月到1794年8月，造成547名教士在羅契夫（Rochefort）兩條廢船中被虐待致死或餓死。

1792年9月的殉道者

兩個同時發生的事件引發了那次小恐怖：首先是很多法國神職拒絕宣誓服從〈宗教人員民事組織法案〉，接著是奧地利政府威脅叛民說，如果法國王室生命有危險，他們將毀滅巴黎。此說刺激了好戰者，不受控制的羣眾占領了街頭，企圖消滅他們心目中的革命敵人。

在巴黎，公社或稱地方自治會奪得了大權，於8月11日下令逮捕所有可疑人士，包括那些不肯宣誓的「頑固」教士。在鄉

鎮地方，許多教士選擇自我放逐；在巴黎的教士則被監禁在比賽特爾（Bicêtre）、夏特雷（Châtelet）、巴黎古監獄（La Conciergerie）、軍營、隱修院、聖費明（St Firmin）神學院，以及聖日耳曼的大修道院裡。

奧地利人要入侵的謠言開始散播時，即引起城裡居民極大的恐慌。又有謠言說監獄裡的囚犯準備暴動，暴民便擁進監獄，處決了數百囚犯。其中四分之三的受害者，約 1,100 人到 1,400 人的確是道道地地的罪犯，但是也有許多教士，只因為他們不願意宣誓服從〈宗教人員民事組織法案〉，而無辜犧牲了。

前耶穌會士

其中 23 個是前耶穌會士。他們在 1762 年壓制耶穌會風潮發生後便歸屬不同的教區；及至克勉十四世 1773 年解散耶穌會，他們就成了教區神職的一員。邦諾（Jacques-Jules Bonaud）成了里昂的副總會長；德爾福（Jacques Delfaud），是三級會議（États Généraux）的神職代表之一；迪代伊（Vareile-Duteil），成為聖瑪利（Saint-Merry）堂的公禱司鐸。至於其他的人，都有不同的新身分：修道院的告解或神修指導神師、本堂神父、教會機構的長上或有聲望的佈道家。

這二十三人當中，十四人死在巴黎隱修院，七人在聖費明神學院，一人在軍營的監牢，另一個則在聖日耳曼大修道院中。

死於日耳曼大修道院的是郎方（Alexandre-Charles-Marie Lanfant），曾擔任國王的講道神父，所以最有名氣。他是激進共和黨人（Sans-Culottes）最想要的人，也是我們擁有其去世前一些資料的一個人。我們可以用他的故事來了解其他命運相同者的遭遇。

因為他是有名的佈道家，所以有機會來到維也納，在這裡講了三個將臨期和三個四旬期道理（1767-1769）。1774 年他被指派為凡爾賽宮的講道神父，從此之後，大家都知道他是「國王的常任講師」，而他也很成功地扮演這個角色。

狄德洛（Diderot）在聖蘇比士（St. Sulpice）聽過一次郎方的講道後對艾林伯（d'Alembert）說：「這樣精采的講道，讓人很難不相信。」

這位前皇室講道神父在 1790 年 11 月 25 日寫道：「我看守牧場上羊羣的日子將要結束了。」他已得到消息：凡是拒絕宣誓的神父將喪失領取生活費的權利，不過，他並不曾因此而感到不安，也沒有鬆動他絕不讓步的決定。

1791 年 2 月 2 日，情勢愈來愈糟，他仍持續為已移居杜樂麗（Tuileries）的國王講道。他每次進出皇宮都被激進共和黨軍隊密切監視，但郎方也不打算躲避。

殉教之路

這一年郎方不能再在國王面前講四旬期道理了，因為只有宣誓過的神父才能講道。他不想宣誓，國王也不希望講道神父作這樣的宣誓。不過有人告發他說，他聽了國王的告解，且為國王送了復活節的聖體——報紙上是這麼說的。郎方只是國王的講道神父，一般人卻以為他是國王的告解神師，這樣的猜測是不對的。可是郎方是個名人，光提一下他的名字就會讓暴民興奮上半天。

當發現有人要對付自己，他便打算離開巴黎，卻又覺得此舉危險而放棄，而選擇不斷變換住處。後因國王企圖逃跑，使得 8 月上半月月的社會秩序更為混亂，郎方的處境更為艱難。他找到一個新的住處，是一個書籍裝訂商樂瑞奇（Leriche）的房子，位

於陰暗偏僻的古幣街（Vieille-Monnaie street）。

有一天——接近要命的 1792 年 8 月 10 日的一天，是天意吧！他碰到一個名叫孟尼（Monnel）的神父，把他給認出來了。孟尼神父是宣誓過的，所以可以自由活動，與新政權也有接觸。

孟尼神父對他說：「不要害怕！」要他放心。

郎方神父回了他一句沒有說完的句子：「仰望上主的人……」聖詠的原句大概是：「仰望上主的人總不驚慌失措。」

郎方在 8 月 29 日晚上被捕。《宇宙監控報》（*Le Moniteur Universel*）在 31 日的頭版登了這樣一段：「郎方神父，國王的告解神父，被逮。」他先被帶到公社或稱地方自治會處，再被送到聖日耳曼大修道院。犯人們被安置到多個不同的地方：隱修士的舊餐廳；曾是工匠同業組織小堂的廳堂；大修道院的舊監獄；以及附屬監獄的小教堂，上面有一個閣樓。郎方和另一個教士合用一個可以直通閣樓的房間。

9 月 2 日，革命軍頭梅亞（Maillard）領著一夥揮舞著刀槍棍棒和石塊的老百姓，穿過大街小巷，吆喝大家加入作戰隊伍。

有人問：「到邊界上去嗎？」他們以為敵人打過來了。

但接到的命令是：「去打監獄！」

「哪些個？」

「隱修院的、大修道院的！」

孟尼已安排好了如何去救郎方。他跑到公社找到其中兩個頭子，班尼斯（Panis）和薛剛（Sergent），要到一紙命令：「把郎方神父帶到安全的地方！」孟尼拿著字條趕到大修道院，把字條交給梅亞。梅亞領著那一大夥兇神惡煞已準備好行動。

第二天，9 月 3 日清晨四點，孟尼遇見那書籍裝訂商樂瑞奇。

樂瑞奇說：「我知道你很關心郎方神父，那些暴民正想要他

的命。昨晚已經有很多神父被殺死了，聽說很快就會輪到郎方神父。」

「他還在大修道院嗎？」

「還在，他還在那裡。那羣人想要他的頭，誓死不讓他離開，除非是為了處決他。」

孟尼忠於自己的諾言，馬上又跑到公社找那兩個頭子，要到新的釋放令。他把釋放令交給大修道院的看守，然後在外面等著。一個小時後，他看見郎方舉步維艱地走出來。孟尼尾隨著他，直到看不見他為止。那時大約是下午一點鐘到兩點鐘的光景。

正是此刻，賴密特（Lhermite）先生從他位於布斯（Buci）街上的文具店看到郎方被一羣人圍著，大家都為他被釋而慶幸不已。此時來了一羣流氓，喝問眾人是否看見一個剛從牢裡逃出的教士。一位朋友由於高興歡呼而不慎洩露了郎方的行蹤，那羣暴民便把他抓住，帶回大修道院。

不過郎方並不是死於3日和4日發生的大屠殺中，他們遵守了班尼斯和薛剛的命令沒有殺死他。他是在5日那天被殺的。那天監獄的門大開，他被一羣婦女認了出來，是她們把他殺了。監獄的一本登錄簿這樣記載著：「郎方先生經人民審判後於5日立即處決。」

羅契夫港口的廢船

「大恐怖」靜靜地臨近。1793年1月18日，原名路易·卡佩托（Louis Capeto）的路易十六被判死刑，並於三天後被送上斷頭臺。跟著被處決的、不那麼顯赫的人愈來愈多：1793年9月110人；10月180人；11月500人；12月3,380人；1794年1月3,500人；2月人數下降為800人；3月600人；4月又上升為1,100

人；6月則有 1,300 人。

新的獵僧侶行動也安排妥當。1793 年 2 月 14 日，國民公會表示，每抓到一個教士，就可以得到一百鎊獎金。1794 年 1 月 25 日，治安委員會命令將所有被判放逐的教士遞解到波爾多及羅契夫港口。教士們先在地方官的官邸集合，然後一批接一批出發到他們的目的地去。

護送的士兵一路上對他們都很客氣，小心地把過夜的地方打掃乾淨，又幫助那些年邁的犯人。他們守夜鬆懈，犯人要趁機逃跑並不困難。有一個士兵就曾給他負責護送的一隊暗示，可是沒有一個人逃走。

被送到羅契夫的囚犯分別被關在監獄、修道院、醫院以及兩艘停泊在港口的小船上。4 月 11 日，第一批離開監獄的被移送一艘下錨在河口名為雙和號的船上，該船由市民拉利（Laly）指揮。5 月 1 日，拉利向上級報告說，他的船已經收容了四百個被逐出境的人，不能再收了。餘下的人只好擠在第二艘名為華盛頓的船上，此船歸市民吉爾柏（Gilbert）指揮。待犯人都上了船，兩條船便起錨啟航，到了艾士島（isle of Aix）附近便停了下來。所謂放逐只是虛晃一招，掌權者根本沒有意思把他們放逐到任何地方，而且英國的封鎖政策也使得他們無處可去。

囚犯像生活在地獄裡。這兩條船本是用來運送奴隸，滿適合載人的。可是現在有很大的差別：運送奴隸時，要緊的是把一個人健康強壯地運抵目的地，現在動機不同，情況自然不一樣。現在的犯人不像昔日的奴隸可以在船艙外活動，他們被關在船艙裡，空間十分擁擠，每天從清晨五點起就生活在燃燒焦油所產生的熏人煙霧裡，空氣令人窒息；食物差，包括長滿蟲的野生豆子；飲用水發臭，發黑如墨還滿是小蟲。很快地，蝨子橫行，斑

疹傷寒在他們中間流行起來——種種不幸接踵而來，加在這些可憐人身上。

有 226 人因受不了而死亡，埋葬死人的恐怖工作得快快展開。他們並沒有為死者穿上壽衣，只是把他們赤條條地放在船上，送到艾士島上的一個港灣去。

島上居民提出抗議，政府當局起了戒心。那兩條船只得駛回查倫泰（Charente）河口，在瑪丹（Madame）島附近下錨。在那裡，一所可以容納百人的醫院成立了。

兩位耶穌會士

這些囚犯中有兩位是耶穌會士：安倍（Joseph Imbert, 1719-1794）和柯蒂（Jean-Nicolas Cordier, 1710-1794）。安倍隸屬茂林斯（Moulins）教區，當主教們被逐出法國時，他被任命為副總會長，於 1793 年 6 月 9 日被捕，名列亞利爾（Allier）行政區 80 個教士名單之首。亞利爾是第一個把區域內教士送到羅契夫的行政區。

他有一個古怪的創舉讓他在教士同伴中備受歡迎。他寫了一首〈教士的馬賽進行曲〉。歌詞綜合了教士們的理想，曲調則是採用了馬賽進行曲的調子。

1794 年 4 月 13 日，一行人抵達羅契夫，安倍隨即被分派到雙和號船上。雖然歲月磨人，他仍保持樂觀善良。他是第一批感染到斑疹傷寒症中的一個，並於 6 月 9 日去世，葬在艾士島。

柯蒂是全力反對〈宗教人員民事組織法案〉的人，於 1793 年 10 月 28 日被捕。他雖然又老又病，但也未能使他免於此難。11 月 21 日，從地方自治會來了一位官員查封了柯蒂在凡爾登（Verdun）的小屋。1794 年 4 月 15 日，柯蒂是第四批從繆思（La Me-

use) 送來的教士中的一個；6 月 19 日，經過徹底搜身後，被安置在華盛頓號上。

吉爾柏船長不准柯蒂帶一條手帕、一件換洗襯衫，甚至把他倚靠的手杖也拿走。他把柯蒂一邊推進船艙時，一邊叫罵：「你這個賊，你在拉旺代 (La Vendée) 跟著愛國者後面跑時，可並不需要這手杖呀！」(柯蒂當時並不在場——但那又有什麼重要呢！)

船長邊謾罵著，邊用他的劍推著柯蒂前進。

這位老邁的耶穌會士於 9 月 30 日，在瑪丹島上去世。

3. 義大利插曲： 畢納德利復興耶穌會

畢納德利教區神父

畢納德利神父試著在費拉拉安頓時，我們撇下了他。現在，解散令實施了，他不再是畢納德利神父，而是畢納德利教區神父了。他有時可以自稱為「神聖羅馬帝國」親王。他的哥哥福恩堤斯伯爵已經離開巴黎大使館，因為在那邊花費太大，又要自掏腰包。不過，他仍然給弟弟皮皮和尼古拉斯送點生活費。1773 年秋天，兩位神父在波隆納安頓下來。該城的西班牙代表佛南度上校（Fernando Coronel）把他倆迎到家中住。

其實佛南度上校是一個間諜，而不是什麼好心的主人。他準備隨時向上級報告客人不小心洩漏的一言一行；陪伴或服侍兩位教士的僕人也一樣。這樣的軟禁生活為時不長，上校在 12 月 21 日去世，畢納德利兄弟就搬到一位政委佛加達（Pedro Forcada）家，佛加達對兩人的態度也不見得比較好。哥哥若瑟投身神功與研究裡，他的藏書慢慢增加，就買了一個小房子來收藏，並向昔日的耶穌會夥伴們開放。他也喜愛藝術，通曉畫作，收藏了不少好畫。

不過，他和弟弟間開始發生不愉快。尼古拉斯是一個迷人的年輕傢伙，就是頭腦簡單。他也有了自己的屋子，並過著奢侈揮霍的生活。他開始負債，家人想就近管束他，便要若瑟控制他的開支。他們的哥哥福恩堤斯伯爵已於 1776 年 5 月去世。尼古拉斯的債主開始騷擾若瑟，要他為尼古拉斯還債，若瑟力有未逮，便於 1782 年決定不再管這個事。

事情可是愈來愈糟。1785 年 7 月 28 日晚上，馬德里法院下令逮捕尼古拉斯並把他關在烏爾班諾堡（Forte Urbano），1789 年 8 月 20 日才把他釋放。他非常生氣，還想把「神聖羅馬帝國」親王的頭銜轉讓給一個一起尋歡作樂的男僕。

情勢改變

1783 年 2 月賓尼斯拉斯基在往羅馬途中經過費拉拉，跟住在那裡的前耶穌會士們會面。他向他們報告耶穌會在白俄羅斯的現狀，那邊的會士對修會被批准復興及修會的成長都抱著很大的希望。賓尼斯拉斯基詳細又可靠的消息，澄清了以前種種模糊不清的謠言，也激勵許多人要向「寒冷」邁進，至少也得加入殘存的耶穌會。他們聚集在一起重發了終身願，這樣他們就成了俄羅斯耶穌會的一員，雖然法規上不被承認。

這個會士身分有什麼價值呢？在被放逐的前耶穌會士中看法各異。一些人認為這是不必要的步驟，因為解散令本來就是無效的；另外一些人則對這樣一個無形的身分不滿意，他們希望得到教宗批准的明確表示。畢納德利神父決定不加入他們，他靜待時機至 1797 年。

情況開始改變。那些一直不敢說話的人，現在提高分貝為耶穌會辯護，要求恢復耶穌會。他們說，解散耶穌會沒有半點好處，只帶來許多壞處。

第一個採取行動的是帕爾馬公爵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1768 年時他還是一個青少年，他的首相遜歐（du Tillot）總管一切，2 月 7 日的晚上，170 名耶穌會士被以西班牙的卑賤方式驅離他的小公國。在 1788 年查理三世去世、1792 年莫尼諾被剷除後，他開始有自己的想法。他邀請耶穌會士住到周圍的城市裡，復於

1792年9月10日委託他們開辦學院。1793年5月1日，他向碧岳六世請求批准他所做的一切；教宗私下同意了他的請求。為了能與舊的耶穌會銜接，他打算把白俄羅斯「正牌的」耶穌會士找來，遂於7月23日寫了一封信向女沙皇要人。1794年2月8日來了三人，其中之一是梅沙拉弟（Antonio Messerati），經授權建立副會省，另一位潘尼松尼（Luigi Panizzoni）則被任命為初學導師。

這個小小的核心小組，與幾個前耶穌會士聯合起來後，陣容就不小了。未來的總會長佛迪斯（Luigi Fortis）是當中一個。他們推動的工作也日有進展：一所宿舍、三所學校，也在教堂裡講道。

拿破崙的軍隊於1796年6月19日進駐波隆納，拿破崙本人亦於次日抵達，耶穌會的工作隨即受到嚴重干擾。代表聖座的樞機主教與副代表都被罷黜成為戰俘。不過，市政府仍在議院手中，他們保證會保護西班牙流亡者，並為了法國共和與馬德里宮廷之間的友誼，會保護西班牙的官員。然而，為了易於辨別，避免引起糾紛，他們要求西班牙人佩戴紅色的玫瑰花形飾物。即使在這樣混亂的情況下，畢納德利神父還是拒絕返回西班牙，因為他要保護姪女的子女。他的姪女是維拉赫慕沙公爵夫人（Duchess of Villahermosa）

帕爾馬副省會長梅沙拉弟於1796年12月17日去世，由潘尼松尼繼任。潘尼松尼指派畢納德利神父接初學導師一職；還委託他另一個重任，就是嘗試與那不勒斯接觸，讓耶穌會士重返那不勒斯王國。畢納德利神父是那不勒斯國王與王后的朋友，也熟識那邊的狀況。

出發往那不勒斯前，畢納德利神父做了八天避靜，並按照傳

統方式重發三願，於 1797 年 7 月 6 日正式成為俄羅斯耶穌會士。

帕爾馬的實驗並不長久。根據 1801 年 2 月 9 日訂立的〈魯內維勒和約〉（*treat of Lunéville*），這個小公國將歸屬法國。公爵去世後不久，拿破崙於 1802 年 10 月 8 日就把帕爾馬交到荷西（*Don José*）手中。

錯誤的解決方法

畢納德利前往帕爾馬就任初學導師前某天，一個穿著耶穌會會服、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來見神父。年輕人名叫巴卡納瑞（*Niccolò Paccanari*），來自特利騰（*Trent*）的波高狄華蘇甘納（*Borgo di Valsugana*）。他本是教宗軍隊裡的一名士兵，因曾經歷強烈的宗教經驗而加入附屬於羅馬聖依納爵教堂的卡拉維達小聖堂（*Cara-vita Oratory*）。該堂在耶穌會士的指導下，進行一些傳統的使徒活動。巴卡納瑞計畫成立一個與耶穌會相同的團體，因他感到內心有一股力量驅使他去領導這樣的一個團體。他花了十五個月在理瑞多（*Loreto*）和亞西西（*Assis*）準備自己，並於 1797 年 8 月 15 日成立耶穌信德會（*Society of the Faith of Jesus*），巴卡納瑞被選為會長，會員們都宣了誓。會規就是耶穌會的會章，會服採用解散前義大利耶穌會士的式樣。

巴卡納瑞到處招募跟隨者，而畢納德利是他最想優先吸收的權威人士中的一個，可是沒有成功。看著目前各方試圖恢復耶穌會的努力，畢納德利覺得巴卡納瑞的構想是錯誤的。不過他沒有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只問這個可能的創辦人，他和他的人如何了解、實行耶穌會的會憲。當巴卡納瑞回答完這問題後，畢納德利神父下了一個結論，就是，他們不是耶穌會士，也永遠不會成為耶穌會士。

儘管如此，被稱為巴卡納瑞派的耶穌信德會的確興旺了一陣子，後來還合併了另外一個性質與它相似的、在比利時艾根荷芬（Eegenhoven）成立的聖心會（Society of the Sacred Heart），即使聖心會有五十個會員，而耶穌信德會只有十九個。巴卡納瑞當時就像颶風一樣威猛。

另外一個具有同樣目標的團體，是由前耶穌會士皮寇（Pierre-Joseph Picot de Clorivière）於 1791 年 2 月 2 日在法國建立的耶穌聖心司鐸會（Society of Priests of the Heart of Jesus）。它於 1801 年 1 月 19 日獲得碧岳七世批准，可惜被政府解散後，沒能再復興起來。

巴卡納瑞一生充滿傳奇，下場卻淒慘。他獲得奧地利的女大公瑪莉安娜（Archduchess Mariana）的資助，於 1800 年得以晉鐸。瑪莉安娜當時加入了耶穌信德會的女分會：「耶穌之愛」（Beloved of Jesus）。1808 年聖職部傳喚了他，說他行為不檢，判他監禁十年，不得行使教士職。他被關在聖天使堡裡，翌年被苗禮士（Miollis）釋放，1810 年再度被關。當時苗禮士以拿破崙的名義占領了羅馬。1811 年，人們在臺伯河裡發現巴卡納瑞的無頭屍體。

和解

1804 年 2 月 27 日，有人送口信給畢納德利神父，說他在威尼斯的弟弟尼古拉斯病重。自從費拉拉被法軍占領後，這個任性的弟弟就實現自己的夢，到水都落腳。那些毀了他的猶太高利貸正在那邊等他。他又回到老路上：道德不犯錯，生活卻奢侈、失常無序。

尼古拉斯沒有料到會再見到哥哥。皮皮沒有通知、沒有敲門

就衝進弟弟的房間。他跪倒在地，眼中滿是淚水，伸出雙臂，好像他就是罪人，開始向弟弟請求寬恕。

尼古拉斯也一樣。他流著眼淚，努力向哥哥靠近要擁抱他。皮皮卻不移動，只是抱著弟弟的雙腿，繼續求他寬恕。最後他跪行到床頭那邊，兄弟倆抱頭痛哭。

畢納德利神父回到他投宿的旅舍已經是午夜時分了。三天後他住到弟弟家裡。二十天後的一天，尼古拉斯清楚告訴哥哥，說他覺得很舒服，跟著就在皮皮的懷抱裡去世了。

畢納德利神父沒有插手殯葬禮的事，他讓一個前耶穌會士去操心，那人嫻熟這類事情。不過他沒有忽略支付殯葬費用，也還清了弟弟生前的債務，同時不忘給弟弟兩個僕人遣散費。錢從哪裡來？那不難猜。最可能是他姊姊阿席拉伯爵夫人（Countess of Acerra），和姪女維拉赫慕沙公爵夫人的匯款。

義大利省會長

在俄羅斯帝國的耶穌會正式獲准恢復，使得逐步全面復興耶穌會變得大有可能，其中一步是局部復興義大利耶穌會。1802年1月22日，格魯勃當選為代理總會長。幾個月後，他派遣安吉奧利尼神父（Gaetano Angiolini），以總會長代表的身分前往羅馬安排這件事。不過這個任命是不能公開的。他們對外說，安吉奧利尼到羅馬是為了接受龔薩格樞機（Cardinal Luigi Valenti Gonzaga, 1725-1808）致贈耶穌會的豐富藏書。

安吉奧利尼攜帶了兩封格魯勃的親筆信：一封給潘尼松尼，要解除他省會長的職務；另一封給畢納德利神父，任命他為省會長。

當耶穌會士重返那不勒斯一事再現生機時，安吉奧利尼仍留

在羅馬。那不勒斯與兩西西里王國的國王斐迪南四世，是查理三世的兒子。（就是那位在 1767 年、正值十六歲時，受大臣滕努思的教唆，簽署了驅逐耶穌會士的命令的查理三世。）斐迪南與畢納德利神父接觸，要求他派人推動王國內的教育工作；畢納德利神父則除了要求要得到教廷的許可外，還加上一個條件，就是耶穌會的復興。國王就把安吉奧利尼召來。

這裡面有兩個難題。首先，國王希望耶穌會士就像教區教士一樣，受主教及政府管轄。第二個難題涉及程序問題，碧岳七世與國務卿剛沙飛（Consalvi）要求每個想召回耶穌會士的國王，自行向教廷提出申請，因為他們曾要求驅逐耶穌會士。斐迪南走了另一條路；他請身為那不勒斯人的貝爾費德瑞樞機（Cardinal Marino Carafa di Belvedere）以那不勒斯的名義寫信向教宗請求。不過教廷告訴他們得按正常程序，就是由國王正式提出申請。由於這樣做會引起西班牙的反對，斐迪南是不能忽視的。教廷的答覆不是拒絕，但已足夠讓那不勒斯煩惱。接著下來是長時間的沉寂。

耶穌會在兩西西里王國的復興

安吉奧利尼吞了餌，接受了斐迪南的條件。他寫信向省會長畢納德利要人。畢納德利給他的回覆和他給國王的並無二致：如果要耶穌會士到那不勒斯，就要做真正的耶穌會士，而不是假裝成耶穌會士實質卻是教區教士；其次，要設法獲得教宗的批准。結果，畢納德利沒有把安吉奧利尼要的人送去，而是自己去了那不勒斯。

他對外供稱是去探望又老又病的姊姊，阿席拉伯爵夫人；事實上，是要解決耶穌會復興的問題。

當他發現那不勒斯當局想採用俄羅斯模式，使耶穌會成為一獨立的團體時，便大力抗議，威脅著要中斷協商，返回帕爾馬。那不勒斯宮廷讓了步。兩個月後，碧岳七世在 7 月 30 日簽署了恢復耶穌會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傳教的文告。

8 月 15 日，耶穌會士接管了老耶穌堂，不過莊嚴的進堂儀式則在 12 月 3 日舉行，那時耶穌會士在城裡的傳教成果已經相當豐碩。國王與王后、整個王室、三個樞機主教和八十個耶穌會士都出席了。一個超過二十五人的合唱團唱了整臺彌撒，伴奏的有五十人；並請卑塞爾（Giovanni Paisiello）特別為這次盛會寫了〈感謝天主〉（*Te Deum*）曲。卑塞爾是當時的音樂大師，曾於 1776 年至 1784 年間在聖彼得堡擔任凱薩琳女王合唱團的指揮。

前那不勒斯會省 168 個倖存的會士裡，有 135 個在 1804 到 1805 年間，重新加入耶穌會。1806 年，會士人數上探 181 人：其中 124 人來自前那不勒斯會省，57 人分別來自威尼斯、羅馬、亞拉岡、卡斯蒂利亞、巴西和巴拉圭。他們馬上投入耶穌會士傳統的工作：聽告解、講道、教授要理、拜訪病人、入監牧靈，以及傳教和辦退省。畢納德利急著為各學院複製培育準則（*Ratio Studiorum*）以及修會當遵守的規則。

既然西西里是那不勒斯王國的一部分，人們自然而然地想到也應復興那裡的耶穌會。在缺席 37 年後，當年的倖存者在安吉奧利尼的領導下，又回到島上。那是 1805 年 4 月 30 日。直到 1806 年，他們與那不勒斯共同組成一個會省，畢納德利為省會長。

1806 年拿破崙入侵那不勒斯，才開始的榮景又告幻滅。拿破崙於 2 月 15 日占領了那不勒斯，並於 7 月 3 日下令驅逐耶穌會士。四天之後畢納德利領著 30 個會士出走羅馬；在西西里的會士則與安吉奧利尼留在原地，安吉奧利尼成為執行代理省會長。

安吉奧利尼案

前面只是簡單的描述，實際情況複雜得多，全是拜那個總會長代表安吉奧利尼所賜！兩個權力不清的主事者同時存在會把情況弄得很複雜。還好畢納德利老練又謙遜，才得免於一劫。

再也找不到差異更大的兩種性格了。一個是西班牙貴族：小心謹慎，寧願觀察傾聽而不願多說；當他必須踏出一步時，必先求安穩；他不喜歡裝腔作勢。一個是義大利人：愛現、粗心、求快；任性又自欺，從不肯後退一步，也不承認自己會犯錯；他只會責怪自己的假想敵。安吉奧利尼本該保密，不讓任何人知道自己的使命的，可是他讓自己在維也納露臉，穿著耶穌會士會服，更大聲嚷嚷。到了羅馬，他又跑到耶穌堂住宿，那真是存心挑釁。逼得教宗和國務卿必須出面干涉，勸他遷到奎里納爾（Quirinale）的聖安德（Sant'Andrea）。

當教宗任命他為復興那不勒斯耶穌會命令執行人的時候，他以為這是一步棋，是暗中授權他在省會長畢納德利之上治理新會省。及至讓他管理西西里的會士時，他又認為這是一個不經正常管道指派的命令，於是像專制君王般治理那些會士。傳來的抱怨聲愈來愈多，畢納德利總是避免產生正面衝突。1807年9月15日，總會長布爾佐佐斯基（Brzozowski）指派魯福（Saverio Ruffo）為西西里省會長，不過仍保留了安吉奧利尼總會長代表的職務。布爾佐佐斯基在1810年要調走他，但安吉奧利尼信誓旦旦說，教宗曾命他為宗座代表及終身長上。那是耶穌會的最高權威。

安吉奧利尼不斷向教宗請求、抱怨。不多久，碧岳七世就向世人解釋，為何他做了這樣的指派，以及安吉奧利尼的權限所在。

「我的代表？好吧，我只是要他執行復興令，因為當時耶穌

會總會長不能來，又沒有其他人可以委託。我無意讓他的權限超過總會長所授予的總會長代表的權限。如今目的已經達成，他的使命也就結束了。」

放逐羅馬

1806 年 7 月 9 日黃昏，畢納德利被逐出那不勒斯，來到羅馬，住到一家名叫「匝加利亞」的小旅館裡。該旅館位於靠近西班牙廣場（Piazza di Spagna）的康多提大道（Via dei Condotti）。他稍事休息，之後直奔奎里納爾的聖安德；在聖體櫃前及聖達義（St. Stanislaus）祭臺前祈禱片刻後，他求見教宗。教宗馬上接見他。

畢納德利跪下，哭著哭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等到可以說話了，才嗚咽著道：「聖父，您可以猜到我為什麼要來，因為您一定知道耶穌會在那那不勒斯發生的一切了。」

教宗深深感動，告訴他歡迎他們來梵蒂岡服務。不過，教宗又說：「你們的會祖當年並沒有指定會士要穿跟教士不同的服裝。所以，我們希望你們能拿掉你們的衣領。」（註一）

不用多說，畢納德利懂得小心翼翼，設法不引起別人的注意。他搬到一家普通的小旅館裡，不露出他是修會長上的任何痕跡。八天後，一羣初學生來到羅馬，他就跟他們住到羅馬學院「一間狹窄、陰暗的房間裡。房間的光線被連接羅馬學院與卡拉維達小聖堂的拱門擋住。」

要供養七十多個流亡到羅馬的那那不勒斯會省會士著實不容易。「身處異教徒之地」的省會長——畢納德利喜歡這樣稱呼自己——既沒錢也沒有辦法賺錢。他們當中的西班牙人早就失去了西班牙政府的補助，西班牙國王也重申他的決心，絕不給重新加

入那不勒斯耶穌會的前耶穌會士一分一毫。

畢納德利相信天主會照顧，因為祂餵養空中的飛鳥，讓田裡百合花衣著華麗，所以極力主張神職人員應有報酬。他還尋找最需要幫助的神職人員：受到照顧較少的、不愛表現的和收入最少的。可是外界的援助仍舊缺乏。

他的姪女維拉赫慕沙公爵夫人伸出了援手。當她得悉那不勒斯驅逐耶穌會士一事後，便向畢納德利打聽與他同住的西班牙籍會士人數，然後按時送來相當於西班牙政府補助金的金額。

終於有人開始邀請他們工作了。不久後畢納德利的人在底佛利（Tivoli）歐維托（Orvieto）學院主持一個神學院，並且向羅馬近郊農村的老百姓宣講。

善導堂

教宗把門打開一點點，這些前耶穌會士便開始向大家表示自己是耶穌會士。當他們講道或宣讀誦詞時，都會在傳單上寫上「由耶穌會主辦」等字樣。

第二步就是組織團體。1807年2月，畢納德利在卡德羅（Cardello）街上租了一間小小的、荒廢的、靠近圓形大劇場的屋子。這是個很受歡迎的區域，附近還有一座幾乎荒廢的小教堂，代理樞機把它交給畢納德利使用。該堂古稱聖潘大里歐（San Pantaleone），今名善導，因為裡面供奉了一尊聖母態像（註二）。畢納德利於2月13日取得房子的鑰匙，3月3日就和羅馬學院的夥伴搬了過去。

他自己選了一個最接近大街的小房間；鄰居的吵鬧聲、行人的叫喊聲、還有車馬的嘈雜聲，聲聲入耳。畢納德利就在這個小房間裡度過他生命的最後四年。

房子和小堂很快都充滿了人氣。房子呢，是因為年輕的會士在畢納德利領導下做第三年培育；小堂則是因為常有信徒來敬禮參拜。教士與平信徒都來向這個崇高純潔、溫文有禮的西班牙紳士求教。拜訪他的人絡繹不絕。教宗也很尊敬他，常常問及他。傳說教宗正在考慮將他升為樞機主教。

拿破崙占領羅馬

那是個紛擾的時代。拿破崙逐漸稱霸歐洲，他的軍隊終於進入教宗國。1808年2月2日，苗禮士將軍領了六千部隊進入羅馬，攻下了聖天使堡；翌年1月12日，他要求西班牙駐羅馬大使把居住在教宗國的西班牙人名冊交給他。這些人必須宣誓效忠西班牙的新國王拿破崙。但是善導堂的住客沒有在領使館登記，所以沒有被騷擾。不過，法國人是不會放過他們的。

1809年6月10日，羅馬正式歸屬法國。教廷的旗子降了下來，三色旗在聖天使堡上空飄揚，跟著禮砲響起，宣告教宗的俗世權利告終。此後，羅馬人剩下的武器只有消極的抵抗和尖酸的笑話了。

7月6日，拉代（Radet）將軍在奎里納爾逮捕了碧岳七世，把他囚禁在沙沃納（Savona），1812年轉到楓丹白露宮（Fontainebleau）囚禁。

四天後，一個官員在善導堂出現，要他們捐款維持人民衛隊，這是新政府的規定。畢納德利去向苗禮士說情，獲得了豁免。1810年4月17日，所有宗教團體都因一紙公文被解散。拿破崙在公文上寫著：「我打算在今夏完成解散羅馬國內所有形式的修會，包括男的和女的。」5月下旬，驅逐令開始執行。到了6月，4,600個修道人士被逐出羅馬。

畢納德利採取了特別預防措施。他避免用省會長、院長、神父等名稱，而以閣下（Don）取代，這是對一般教區教士的稱謂；他開始穿著像教區神父。他們也提防不明人士設狡猾的陷阱捉拿他們。

事實上，警察加強對他們盯梢、問話與搜索，憲兵與奸細也頻頻出現。這些人有時突然衝進屋裡，畢納德利會冷靜地接待他們，不露出半點驚慌神色；他禮貌地回答他們的問題，直到他們滿意地離開。

永不會空的箱子

那個人一無所有卻隨時幫助每一個人。盧恩（Luengo）在日記中記述：「他從那不勒斯和西班牙領不到半毛錢退休金，也沒有租金收入，也好久沒有從他的有錢親戚那邊獲得任何支援，可是他總是能妥當地安排三個會院的人——羅馬的、歐維托的和底佛利的——甚至一些外邊的人。」那本日記成為那段時期耶穌會歷史的一手資料。「他公開地也私下地幫助各式各樣的人。最令人好奇的是，每講到幫助別人，他總是胸有成竹，相信自己一定有辦法。真的有人曾告訴我，常有無名人士或不為人知的管道，給他大筆捐款。」

畢納德利於 1808 年 9 月 10 日給住在費拉拉的阿瓦瑞茲（Antonio Alvarez）寫信時說：「如果這一百西班牙銀元（duro）不敷你目前所需，請馬上通知我。」他要阿瓦瑞茲把這筆錢送給需款孔急的「老會省及其他會省，因為我們是一體的」。他與每個在羅馬被捕的西班牙耶穌會士會面，並給每人四個西班牙銀元。

不僅如此，他的愛心還推及被拿破崙放逐的眾樞機主教，其中幾個和耶穌會並不交好，但又有什麼關係，畢納德利並不記

恨。格雷哥利（de Gregorio）樞機先被軟禁在自己的屋子裡，後來才被放逐。畢納德利從前與他甚少接觸，此刻還是探訪了他三次。主教敘述說：「他走近我，在別人不注意的情況下，塞了一大把錢幣在我手中。我從重量就知道那是金幣。」

他甚至還援助了教宗。他在得知教宗經濟拮据後，便把家裡所有的錢，一千葡元，拜託德士百（Despuig）樞機帶給教宗。碧岳七世只接受了五百元。

民間謠傳錢到了畢納德利的手，就會倍數增加。畢納德利有一個小箱子，他在裡面放一百葡元，每天的家用及救濟金就從那裡頭支付。奇怪的是，箱子裡的數目從不會減少。大家就說：「只要畢納德利神父的一百元安然無恙在箱子裡，我們就沒有什麼好擔心的了。」

有一次，他問格拉士（Grassi）修士：「大家都怎樣說我呢？」格拉士修士是他在波隆納時的同伴。

修士顯得有一點為難，只是很簡單的回答他：「他們說你太慷慨了，我也是這麼想。」

「你或其他人曾缺少過什麼東西嗎？」

「從來沒有過。」

「你們真是小氣鬼啊！來，看一看！」他要修士看一下他書桌的一個抽屜。

「你瞧！」

抽屜裡有一堆金幣，修士估計有數百萬葡元。

最後的愛德行動

1811年的追思亡者日，也就是畢納德利死前的兩週，他拄著柺杖，由格拉士修士攙扶著，要在住家附近的巷道走動一下。他

交給格拉士修士一把銀幣，準備施捨給遇到的窮苦人。

修士坦白陳述：「當時我有一點小氣，每次只給一點點，神父就會再三提醒：『老兄，多一點，多一點。』然後他把錢拿過去，大方地施捨，滿臉滿足的神情。」

回頭時，在離家只有幾步路的地方，他們遇見一位名叫德·西沙（De Cesare）的紳士，他住在百里宮巷（Pernicone alley），現在是身無分文的人。眼見神父出手大方，德·西沙便靠近神父，輕聲請他幫個小忙。神父抓著他的手，領他進入自己的房間，不聲不響地幫了他。

畢納德利的健康一直都不好，如今更是體力不支；食物使他噁心，又經常吐血。他的醫生艾吉第（Egidi）也不知道應該給他開什麼處方。每個人都希望他能活著復興耶穌會，那日子看來也近了，只是天主要把他接回去，時間是 1811 年 11 月 15 日下午六點半。

4. 俄國的春天： 格魯勃

(Gabriel Gruber, 1740-1805)

總會長格魯勃

1801 年教宗碧岳七世頒布《大公信仰》文告，耶穌會在俄羅斯的地位得以確立，格魯勃是此事之後被選出的第二任總會長。他於 1802 年 10 月 22 日當選後，便展望增加耶穌會的人力，擴充耶穌會的活動。

就人力方面看，打從 1800 年開始，來到白俄羅斯老資格的前耶穌會士人數日趨減少，而在西歐各地要求入會的人卻突然增加一大批。1803 到 1805 年間有 105 位，其中 28 位成為會士。如此一來，俄羅斯耶穌會可稱得上真正的國際性了。1820 年時，307 個已知其國籍的耶穌會士裡，其中 142 個為俄羅斯人、42 個德國人、33 個立陶宛人、24 個法國人、21 個波蘭人、一個波西米亞人、一個達爾馬西亞人（Dalmatian）、一個英國人、一個荷蘭人和一個葡萄牙人。

人員增加了，使徒工作也跟著擴大。首要是教育，這也是耶穌會在俄羅斯存在的主要因素。他們有八所學校學院，其中較突出的是在聖彼得堡的「貴族學院」（1803-1815），較古老的波洛茨克（1773-1820）、狄尼堡（Dyneburg, 1773-1811）、奧沙（1773-1820）和維特比斯克（Witebsk, 1773-1820）等校。學校的課程一流，注重科學與現代語言，特別是法語和德語。從 1802 年開始，通用語言是俄文，而不是拉丁文了。

牧民工作有兩個方向：一是經營耶穌會教堂，一是向平民傳教。更重要的是，在 1801 年教宗承認俄羅斯耶穌會前夕，耶穌會已經把觸角伸向俄羅斯帝國最偏遠地方：1803 年到達薩拉托夫（Saratov）照顧所謂的伏爾加日爾曼人（Volga Germans），他們是昔日應凱薩琳二世的邀請到該地開墾的一批人（註三）；1804 年到里加（Riga）；1805 年到亞美尼亞的阿斯特拉罕（Astrakhan）；1806 年到莫茲多克（Mozdok）；1811 年到西伯利亞的依庫克（Irkuck）及奧德薩（Odessa）；1813 年到莫斯科；1815 年到西伯利亞的托木斯克（Tomsk）。投身以上工作的耶穌會士有 72 人。

到中國傳教一直是格魯勃的最大心願，即使在俄羅斯多年也從未死心。在耶穌會被解散前，他以一位神學家的身分待在奧地利。由於他精於數學，大家便認為他可以步武利瑪竇和湯若望後塵。為了更充實自己，他又修習了內科、外科、物理和化學，更努力學習音樂、繪圖與繪畫。

耶穌會被解散後，原來法國耶穌會士在北京管轄的區域便沒人可用了。凱薩琳二世作了周詳的計畫，要把「她的」耶穌會士送到那邊，取代法國耶穌會士。這樣做可以幫助她與中國建立良好關係。格魯勃那時剛抵達波洛茨克，成為執行這個計畫的人選。他應召前往聖彼得堡，不過沒有得到足夠的信任，所以並沒有被告知這個野心勃勃的計畫。這個計畫在四個月後被擱置下來。1792 年 5 月，俄國女沙皇看到英國開始與中國清朝通商，心有不甘，考慮把計畫付諸實行，於是計畫又重新被提出。這一次，格魯勃仍然是人選之一，不過，不同於上一次的是，他們把計畫告訴了他。只是，這個計畫第二次流產了。

在格魯勃總會長任內，這個計畫第三次復活了。三個耶穌會

士於 1805 年 1 月 14 日離開波洛茨克，經聖彼得堡、斯德哥爾摩、哥本哈根和倫敦，於 9 月 28 日到達里斯本。他們等傳信部的准許等了兩年，可是沒有等到。美夢終究難以成真。

準備全面復興耶穌會

把所有想加入的前耶穌會士集中到俄羅斯，是既不可能又不明智的事；從局部復興達成全面復興比較可行。格魯勃於 1803 年，懷著這樣的遠見，踏出重要的一步。他先讓世界上各地方的耶穌會士，都有可能重新加入耶穌會，不一定要到俄羅斯。很多人都這樣做了，只是沒有法律效力。格魯勃現在要想辦法讓這些人得到合法的承認。

策略之一，是派遣安吉奧利尼到羅馬協商帕爾馬與那不勒斯復興事宜。格魯勃可能選錯了人，不過要進入羅馬的來賓接待室，又有誰比一個義大利人更合適呢？

英國耶穌會士是第一批重新加入的，雖然英國耶穌會還未正式被批准復興。其中一位會士，就是列日英國學院前院長威廉·斯特里克蘭（William Strickland）。他於 1801 年 8 月 7 日寫信給當時仍是聖彼得堡學院院長的格魯勃，表達他想結集六十個耶穌會士參與俄羅斯耶穌會的意願。格魯勃分別與總會長嘉萊神父及教宗祕書接洽。幾乎同時，國務卿剛沙飛在一封致聖彼得堡教廷代表的信中，宣告要大開門戶：「1801 年 3 月的宗座文告只在俄羅斯區域有效，意指俄羅斯耶穌會不許在俄羅斯境外建立會院，但不表示住在英國或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不能加入俄羅斯的耶穌會。」

格魯勃在 1802 年當選為總會長後，就著手組織英國老會省。1803 年 3 月 1 日他任命了省會長，同年 9 月 27 日位於史東荷斯

特（Stonyhurst）的初學院也開始運作，有 13 位初學生。問題來了。宗座代牧不承認在英國的俄羅斯耶穌會士，只把他們當教區教士看待。有一段時間，羅馬作了讓步。不過，1813 年 12 月 24 日——當時碧岳七世被囚禁在楓丹白露宮——維也納的教廷大使宣布他們是合法的俄羅斯耶穌會士。

在美國的前耶穌會士也學英國耶穌會士的榜樣，最積極的可算是卡洛（John Carroll, 1735-1815）了。卡洛是美國的第一位主教，也是位於華盛頓特區喬治城大學的創辦人。當大家得知俄羅斯耶穌會在 1801 年 3 月正式復興，一些前會士便要求卡洛把大家聚集起來。卡洛就寫信給格魯勃，格魯勃准許了。格魯勃又指示招收新會士，並授權卡洛指派一個長上。事實上，當時加入的人並不多，只有 5 個人決定加入，另外 10 個前耶穌會士離開了。

1806 年初，格魯勃死後，他的繼承人布爾佐佐斯基派了三個人到美國。有了這些生力軍，加上碧岳七世的認可，卡洛於是年 10 月 10 日在喬治城成立初學院，有初學生 10 人。

荷蘭是另一個積極參與的中心，由方廷尼（Henri Fonteyne）帶動。方廷尼在耶穌會被解散那年是一位神學家。1786 年秋，在獲得碧岳六世口頭同意後三個月，他到了俄羅斯，重發加入耶穌會的誓願。後來因健康理由，使他不得不回到祖國，不過他一直跟俄羅斯的長上們保持聯繫，並讓其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前耶穌會士也與他們接觸。

1804 年，格魯勃重新接受阿姆斯特丹可利堡（Krijtberg）的教區神父貝克斯（Adam Beckers），以及他的同伴格魯能（Heinrich Groenen）。他在 1803 年 12 月 13 日寫的一封信裡，表示接受貝克斯加入耶穌會、授權他接受望會生，並指示他有關接受前耶穌會士的一些規範。

從 1804 到 1810 年，前往白俄的比利時及荷蘭望會生有 18 人。

新兵與老將

在來到狄尼堡初學院的望會生和前耶穌會士的一羣人中，有一個即將創造歷史的年輕荷蘭人，和一個已經創造了歷史的年長德國人。他們就是羅堂（Jan Philip Roothaan, 1785-1853）和艾卡特（Anselm Eckart, 1721-1809）。羅堂將成為傑出的總會長，而艾卡特則曾在巴西傳教，並在彭波的土牢裡度過十八年。艾卡特如今雖已老邁，但仍然雄心勃勃準備為耶穌會重振旗鼓。他於 1803 年抵達狄尼堡，並成為初學導師的助理；而那位年輕的阿姆斯特丹人於 1804 年 6 月 30 日，從里加乘馬車到達初學院，在大門前下了車。

羅堂是從阿姆斯特丹乘坐貨輪西伯號（Jacobus Zeeper）來到里加的，同船的還有兩位比利時神父；他加入耶穌會的聖召是因可利堡堂區神父的榜樣促成。他有幾個朋友進了教區修道院，他則靜候進入耶穌會的時機；貝克斯神父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裡告訴他，俄羅斯耶穌會要收初學生。艾卡特不在意自己八十二高齡，勇敢前往俄國；羅堂也同樣憑著勇氣，於十八歲時到了俄國。

羅堂帶著貝克斯神父及雷內普（David van Lennep）教授稱譽有加的推薦書來到狄尼堡。雷內普教授不是天主教徒，但對耶穌會沒有偏見。他在信中寫道：「羅堂先生在我們雅典學院（Athe-neum Illustre）上了四年課，教授們非常欣賞他，都捨不得讓他離開。」

狄尼堡的初學生約有 60 人，分別來自波蘭、俄國、立陶宛、比利時和義大利。羅堂是第一個從荷蘭來的。他在艾卡特領導下做了一次大避靜。第一年終了時，也就是在 1805 年 7 月 28 日，

他領受了剪髮禮和小品。1806 年 6 月 21 日發了初願。

在俄國戰亂中受訓練

發願後，羅堂隨即與他初學時的波蘭友伴在附屬的學校裡，教授古典語言及法文。學校與初學院是一棟綜合建築。

1809 年 8 月，試教結束後，他被派到波洛茨克攻讀神學。波洛茨克是耶穌會在俄國境內最古老、最重要的中心。首先，省會長駐在那裡，然後，在耶穌會被解散期間，總會行政中心也移到那裡，波洛茨克學院比狄尼堡學院大。羅堂向家人報告說：「在冬天，有 30 個僕人專門負責看顧爐火，由兩個修士監督他們。圖書館內有 50 萬冊圖書，還在增加中。」

羅堂快要修完神學時，總會長布爾佐佐斯基獲得國王的准許，設立了大學級的波洛茨克專科學院，羅堂被指派為希臘文及希伯來文老師。可是他得考慮先完成神學課程，及晉鐸一事。那是 1812 年初，是決定命運的一年。那一年，拿破崙揮軍 61 萬 2 千人，戰馬 30 萬匹，直搗俄國本土。那是歐洲史上從未有過的規模。

羅堂在 1 月 23 日至 27 日間領了小品。6 月 24 日，拿破崙軍隊越過尼曼河（Niemen River）。波洛茨克位於軍隊前進的路上，於是學院被占領了，會士們也被逼疏散。7 月 7 日，羅堂從學校撤離，馬上便被難民、戰俘以及迷路的士兵所淹沒。8 月 17 日，俄國軍隊在波洛茨克吃了一個大敗仗，法國軍隊繼續朝莫斯科推進。9 月 14 日，法國軍隊攻入莫斯科。

羅堂與約 20 個耶穌會士過了兩個月的亡命生涯，之後，他被打發前往一個離狄尼堡不遠的村莊普薩（Pusza）。普薩在前線，但不在大路上。初學院與文學院暫時安置在一個他人提供的

產業裡，羅堂是六個文學生的教務主任，似乎也是全科教授。

普薩臨時會院有一棟「主建築」，周圍還有幾間屋子。無論是主建築或是周邊的屋子，只能以「悽慘」一詞形容；尤其是那幾間屋子，牆上有大大的洞，到處是蝙蝠、老鼠、大大小小的昆蟲，而且冷得不得了。初學院使用主建築大樓，文學生就安置在周圍的屋子裡。

同年（1812）11月，拿破崙撤退，不過羅堂仍與文學生留在普薩，直到1816年8月。

命令改了

格魯勃的朋友保羅一世，於1801年3月23日的晚上被刺殺身亡，他的兒子亞歷山大一世繼位。謀殺保羅一世似是得到亞歷山大一世的默許。

亞歷山大於1797年認識格魯勃，那時他還是一個孩子，與他的兄弟一起到奧沙訪問。他對此行印象良好，大家對他的熱烈歡迎讓他印象深刻。不過，接近他的人對他有很嚴重的偏見，他又天生好猜疑，長此下來，的確造成致命傷。

格魯勃察覺這一切，他知道自己處境危險。新沙皇甚具管理天分，只是個性複雜，充滿矛盾，總是在熱中與強烈反對兩頭擺盪。

亞歷山大與格魯勃的關係不錯。為了回報格魯勃祝賀他登基，他簽署了一份文件，保證維持耶穌會在凱薩琳二世及保羅一世時擁有的地位。他對耶穌會士友善，並抵抗家庭教師拉·哈伯（Frédéric-César de La Harpe, 1754-1838）對耶穌會的攻擊。拉·哈伯反對耶穌會，他給耶穌會貼標籤，說它是「惡魔的發明」，是有史以來最邪惡的組織。

一點點的風吹草動都會讓沙皇把寵愛變為排斥。

改變發生在格魯勃死後。1805年4月7日晚上，格魯勃慘死在一場火災中：當時大火很快就被撲滅，但格魯勃因驚慌又吸入過多濃煙而導致強烈氣喘，不多久就在同會弟兄的懷裡去世。大家因他的突然死亡而驚嚇不已，並陷入極度哀傷中。

繼他之後，於1805年9月14日在波洛茨克舉行的第五屆全體大會中，布爾佐佐斯基被選為總會長。如果沙皇改變政策，就該由他來處理新情況了。

這個時刻說來就來。受到拿破崙攻打俄國的震撼，亞歷山大開始閱讀聖經，並傾全力支持俄國聖經協會（Russian Bible Society）。這個協會在1813年成立。負責外來宗教的高立辛（Aleksandr Nicolayevich Golitzyn）親王，是布爾佐佐斯基的朋友，也同樣熱心此事。他想借用耶穌會的聲望，請求布爾佐佐斯基推廣這個運動。布爾佐佐斯基不知如何是好，教會對於把聖經翻譯成為流行語言的態度，從1557年就沒有改變過；這是他所知的唯一立場。他於是請求親王原諒，宣稱若沒有得到教廷的同意，耶穌會是不可以擅自翻譯聖經的。

高立辛堅持，布爾佐佐斯基也不讓步。這樣他得罪了政府的一個重要官員。他既孤立又無助，沒有任何人能保護他。1814年3月3日，布爾佐佐斯基悲痛地表示：「高立辛親王已不是原來的他了。」

驅逐耶穌會是早晚的事了。導火線是幾個年輕貴族皈依天主教，其中一個就是高立辛的姪子。於是官方有了正當的理由。1815年12月20日，也就是俄國曆的1816年1月1日，當局發布了命令，要把耶穌會士逐出首都及聖彼得堡。次日晚上，所有會士被護送到波洛茨克。

耶穌會士留在帝國其他地方的命運就這樣被決定。布爾佐佐斯基在 1820 年 2 月 5 日去世。亞歷山大一世在他去世後，於 3 月 13 日——俄國曆 25 日——簽署了驅逐令。

就在此時……

楓丹白露宮的囚徒

拿破崙跟碧岳七世玩貓抓老鼠的遊戲：他聽任教宗抗議、堅持自己的要求，卻又把圈子圍起來，對教宗予取予求。1809 年 7 月 10 日，他把教宗監禁在熱那亞附近的沙沃納，教宗則以拒絕批准拿破崙提名的主教作為報復。1812 年 6 月，拿破崙在俄國戰場初獲全勝後，就把教宗關在楓丹白露宮。

教宗被關在楓丹白露宮的那一段時間，有前國務卿帕卡（Bar-tolomeo Pacca）陪著。後來帕卡告訴我們他們被關時的一些談話：「只因為一個修會把教育及傳教工作做得好而去壓制它，對教會和社會所造成的傷害實在太大。我們常常談到這事。」

軍事上的失敗，改變了拿破崙的想法；他釋放了教宗。碧岳七世於 1814 年 5 月 24 日重回羅馬。

帕卡回想起他和教宗在楓丹白露宮時的談話，不過他也有顧慮。「以人的政策來說，復興耶穌會可能是欠成熟的決定；以當時的情勢，更可能既輕率又冒險。」

雖然有這些顧慮，不過在他們回到羅馬一個月後，也就是在 6 月底，他還是提醒教宗：

「聖父，我們是不是應該再一次想一想耶穌會的事了？」

出乎他意料，教宗回答乾脆：

「我們要恢復耶穌會，而且在下個聖依納爵瞻禮生效。」

最後一次延宕

但是教廷官僚讓教宗的決定煞了車。總是會發生一般不可避免的延宕！

贊同耶穌會的李塔（Lorenzo Litta）樞機，準備了一份草稿，力挺耶穌會，直言應撤銷解散令。

此舉招致狄·伯多祿（Michele Di Pietro）樞機的不悅。在壓制耶穌會時，他參了一腳，現在又被教宗任命為復興耶穌會執行委員會的一員。狄·伯多祿於是交出另一篇草稿，可是其他樞機都不滿意，他們認為文中太吝於承認耶穌會的功績，取消〈主及救贖主〉文告（*Dominus ac Redemptor*）的口氣也不夠強。

碧岳七世在兩組人馬間取得妥協。他堅持恢復耶穌會的實質部分，卻對形式讓步，把狄·伯多祿的草稿做了一點修改。

這還不是碰到的唯一困難。我們的朋友安吉奧利尼突然出面了。他是總會長代表，認為復興耶穌會的詔書理當交給他。7月28日他遞交了一份備忘錄給教宗，碧岳不予以理會。

樞機們的爭論、安吉奧利尼最後關頭的要求，都讓復興耶穌會的詔書不能在聖依納爵瞻禮日及時頒布。

終於來臨

8月7日早晨，聖依納爵瞻禮後八天，碧岳七世從奎里納爾宮到耶穌堂。那只是短短五百公尺的路而已，卻是漫長又艱辛。打從他在1800年3月14日被選為教宗那一天開始，便下定決心要復興耶穌會，而不是另創一個與耶穌會相似的修會。經歷拿破崙占領、放逐，到後來拿破崙的謙恭卑下，教宗總是靜靜地、堅忍不拔地要達成這個目標。現在，在羅馬人的歡呼中，他做到了。

那時在羅馬城內所有的樞機主教，還有近一百位倖存的耶穌會士，齊聚在耶穌堂內等待他。他在聖依納爵祭臺前舉行了感恩祭後，大夥移師到聖母會小堂（Sodality's chapel）。其利斯戴弟（Cristaldi）蒙席在那裡宣讀了〈普世教會之不安〉（*Sollicitudo Omnium Ecclesiarum*）詔書，教宗把詔書交到省會長潘尼松尼手中，潘尼松尼代表總會長布爾佐佐斯基接受了詔書。之後教宗分別接見了每一位年華老去的倖存會士，慈愛地跟每個人說了話。

西班牙國王，查理四世——另一個被拿破崙愚弄的可憐人——和他的妻子馬利亞·露易莎（Maria Luisa of Parma）於6月18日被放逐，此刻正在羅馬。王后悄悄地在一間閣樓上參與彌撒，國王則不敢出席。他怎敢在此露臉呢？他的父親查理三世曾殘酷無情地支持消滅耶穌會，又毫不妥協地堅決否決它的復興。

過了幾天，查理微服拜訪耶穌堂。住在羅馬的西班牙耶穌會士都趕來歡迎他。查理發現，他曾害怕、憎恨的耶穌會士，原來都是一些無害的、不記恨的大孩子。

註一：耶穌會士不似其他教士穿戴絲質或毛質的稱為 collarino 的肩帶，而是戴一個內襯白布的高領。

註二：建築物至今仍在，還保持得很好。一塊石碑說明這曾是獻給善導聖母及潘大里歐與樂修（Blaise）兩位聖人的教堂。不過，它現在不再是教堂，而是一所收容中心，由金邦尼傳教會（Comboni Missionaries）神父管理。

註三：凱薩琳二世在一則 1763 年 7 月 22 日頒發的命令裡，邀請外國人到俄國開墾。一大批德國人因此在靠近薩拉托夫的窩瓦河（Volga）兩岸屯墾。他們當中三分之一是天主教徒。在被人遺忘多年後，耶穌會士於 1802 年 12 月 11 日，應邀去為他們服務。十二個神父被送到那裡。1931 年到 1941 年間，史達林又強迫他們的後代遷移到西伯利亞。他們與原來的波蘭天主教徒現在成了俄國天主教徒的核心。

參考資料：

INGLOT, Marek: *La Compagnia di Gesù nell'impero russo (1772-1820) e la sua parte nella restaurazione generale de la Compagnia* (Rome, 1997) .

PIERLING, Paul: *Gabriel Gruber et les Jésuites réfugiés en Russie* (Meudon, 199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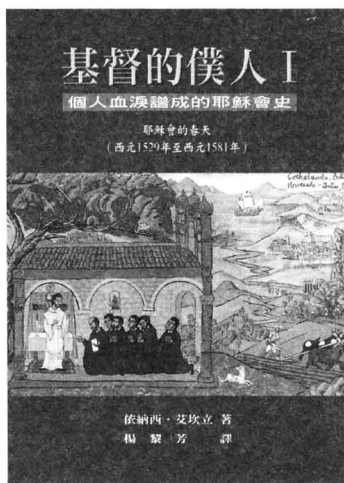
FOUQUERAY, Henri: *Un groupe des Martyrs de Septembre 1792: Vingt-trois anciens Jésuites* (Paris, 1926) .

Roman Congregation for the Causes of Saints: *Positio* of the Servants of God Jean-Baptiste Souzy and 63 companion martyrs.

MARCH, José M.: *El restaurador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José Pignatelli y su tiempo*, vol.2º (Barcelona, 1936) .

LIGTHART, C.J.: *The Return of the Jesuits* (London, 1978) .

INGLOT, Marek: *Alessandro I di Russia, Frédéric-César de La Harpe e i Gesuiti*, "Fede e Libertà. Scritti in onore di p. Giacomo Martina s.j., a cura di M. Guasco-A. Monticone-P. Stella" (Brescia, 1998) .



基督的僕人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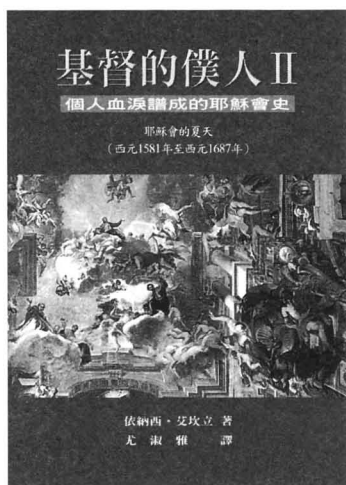
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耶穌會的春天
(西元1529年至西元1581年)

本部耶穌會史共分四冊，涵蓋一百多位具代表性的耶穌會士；而本書則為其中第一冊，內容由耶穌會創會寫起，是欣欣向榮的耶穌會的春天時期。

在耶穌會四百多年的歷史巨畫當中，繪著各式各樣的人物：有聖人與學者、傳教士與殉道者、知識分子與探險家、巴洛克式音樂家以及創意十足的英國詩人，也有不遵從會規者、廷臣、神視者、闖禍的不智管理者以及從酗酒惡習中起死回生的流行歌手，都在此巨畫中占有一席之地。

本書作者不只提供宏觀的角度，也鉅細靡遺地捕捉現實生活中的每個鏡頭，深入刻畫出一幅真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基督的僕人II

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耶穌會的夏天
(西元1581年至西元1687年)

本書為《基督的僕人——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的第二冊，這段時期是耶穌會的黃金世紀，是聖教廣揚的輝煌夏天。海外傳教網絡遍及全球，遠從日本、東印度、非洲，到達拉丁美洲。

活力充沛的宣教，意謂著無數血淚的付出。耶穌會會士在全球前仆後繼地宣揚福音，用他們的血肉之軀見證基督的大愛；耶穌會名列聖人與真福的184位會士當中，即有多達144位屬於這個時期。

無畏的勇者，因著基督的愛，傳教心火，始終熾熱；他們克服重重難關，在世界各個不同的種族中穿梭宣講，雖然有許多人因此而悲壯殉道，但在他們的身後都種下了真理的幼苗，等待有朝一日開出絢麗的花朵。

基本訂戶新辦法

爲了滿足讀者們不同的需求，基本訂戶有了新的辦法讓您選擇：A. 全面訂閱光啓新書；B. 僅訂閱神學類的新書；C. 只選擇神學類以外的新書，如靈修、人物傳記、心靈小品等等。

光啓文化每月固定有新書出版，國內訂戶請先預付新台幣三千元以上，國外訂戶預付美金二百元以上，我們會逐月扣款，當餘額不足時再主動通知您，您不但不需要每月跑郵局，更不必爲繳送帳款而煩惱，「人在家中坐」，卻可以享受「書從光啓來」的方便！

列印下列表格填妥後傳真至光啓文化，我們將有專人爲您服務！再次謝謝您的支持！

基本訂戶資料

年 月 日

基本訂戶辦法：

1. 國內預付NT \$3,000以上，國外預付US\$200以上，逐月扣款寄書。

2. 基本訂戶有三種選擇，請勾選：

☐ (A) 全面訂閱每月出版的新書，一年約二十餘本

☐ (B) 只訂閱每月出版神學類的新書，一年約十本

☐ (C) 只訂閱每月出版非神學類的新書，一年約十餘本

3. 基本訂戶享有的優惠：

訂戶A享有光啓文化出版之新書及所有本版書籍定價之七五折優惠
(不含代理書、特價書、非書籍類及教材類)

訂戶B、C享有光啓文化出版之新書及所有本版書籍定價之八折優惠
(不含代理書、特價書、非書籍類及教材類)

姓 名		E-mail			
聯絡電話		手機		傳真	
寄書地址					
付款方式	<input type="checkbox"/> 劃撥預付 \$ _____ <input type="checkbox"/> 信用卡預付 \$ _____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_____				
統一編號 (個人發票免填)					
劃撥帳號：0768999-1 戶名：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10688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33巷20號A棟					

(洽詢電話：02-2740 2022 Ext. 526，傳真：02-2740 1314)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基督的僕人：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 依納西·艾坎立 (Ignacio Echániz) 著；楊黎芳，尤淑雅，張佩英譯，-- 初版 --
臺北市：光啓文化，2006〔民95〕面；公分
第1冊：spring 1529-1581；第2冊：summer 1581-1687；第3冊：autumn-winter 1687-1773-1814

譯自：Passion and Glory: A flesh-and-blood history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Volume I, II, III

ISBN 978-957-546-556-8 (第1冊：平裝)

ISBN 978-957-546-573-5 (第2冊：平裝)

ISBN 978-957-546-591-9 (第3冊：平裝)

1. 耶穌會-歷史

248.85

95000481

基督的僕人III

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2007年5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依納西·艾坎立 (Ignacio Echániz)

譯者：張佩英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鄭再發

出版者：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688)敦化南路一段233巷20號A棟

電話：(02)2740 2022

傳真：(02)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94號

發行者：鮑立德

E-mail：kcg@kcg.org.tw

中文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170號3樓之3

電話：(02)2367 3627

定價：200元

光啓書號 209026-3

ISBN 978-957-546-591-9



自耶穌會誕生以來，歷經一百多年的蓬勃發展，無數會士的投入與付出，無論是在教會或者人類的歷史上，都留下不可磨滅的足跡，但渺小的人類終究抵擋不住時空的變化，是盛極而衰的必然，還是人為的輕忽與操作，耶穌會仍逃無可逃地邁向蕭瑟的秋日 and 閉鎖的寒冬！

在本書中，仍舊是透過一個個的個人去掃描整個時代的演變；在動盪的背景裡，令人敬重的人格依然存在；愚蠢、迷失的靈魂也絕不缺席，他們共同編織了這一段令人不忍卒睹的混亂，也埋下將來再生的種子。

回顧歷史是為師法前人、再創未來，曾有的苦難正是勇敢奮起的原動力，一頁頁的血淚也正孕育了日後的燦爛，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